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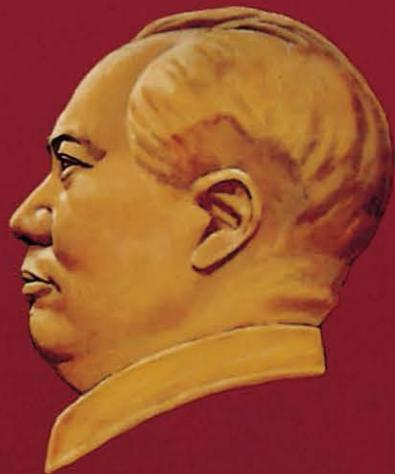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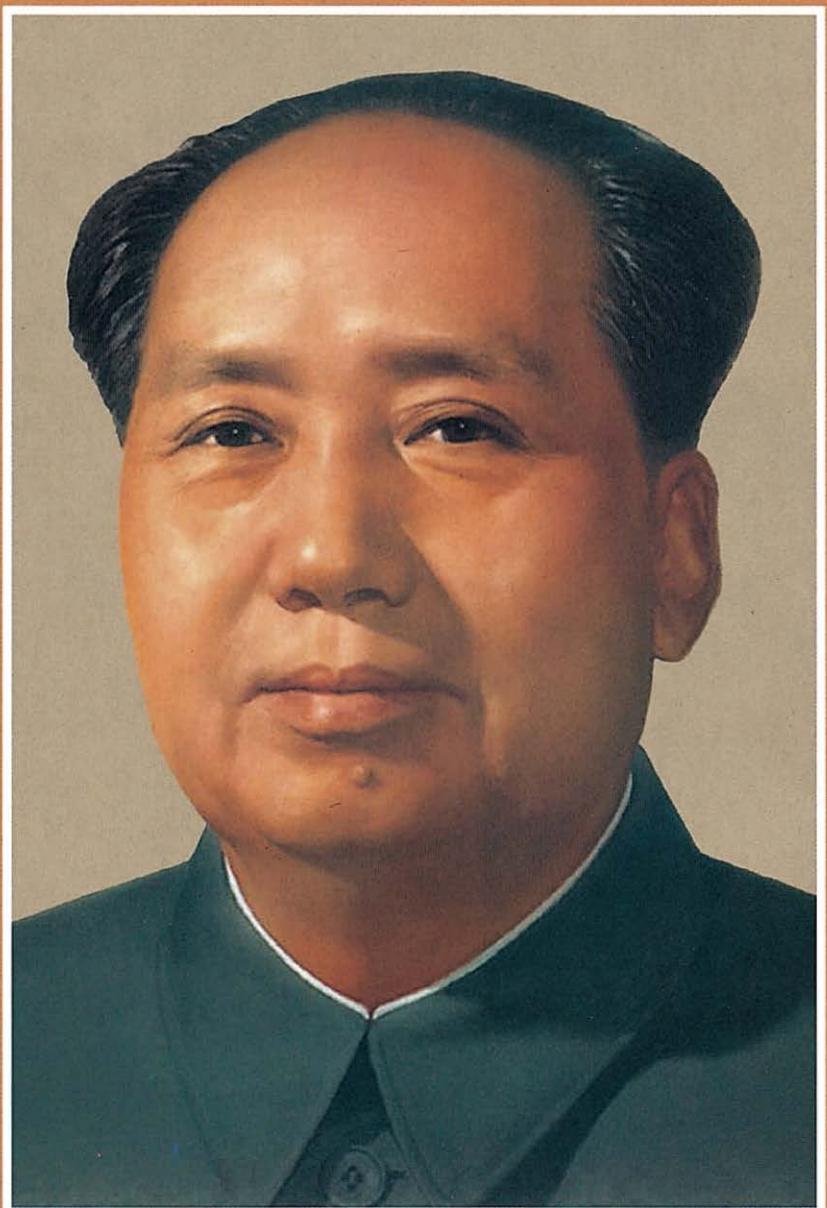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坚决打击入侵海南岛上空的美机	1
(1965年4月9日)	
对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	2
(1965年4月13日)	
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代表时的指示	4
(1965年4月21日)	
关于反空降和战略战术问题	5
(1965年4月28日)	
对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要的批语	6
(1965年4月29日)	
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	7
(1965年4月)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9
(1965年5月8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11
(1965年5月11日、12日)	
对关于第二次核试验试爆时间的报告和新闻公报稿的批语	15
(1965年5月12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电报	16
(1965年5月15日、20日)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五寿辰的电报	19
(1965年5月18日)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23
(1965年5月)	
对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指示纪要的批语	36
(1965年5月25日)	
念奴娇·井冈山	37
(1965年5月)	
为《山西农民》题写报头	39
(1965年5月)	
为郭国群题词	41
(1965年5月)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42
(1965年5月30日)	
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内部材料上的批语	43
(1965年6月2日)	
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材料上的批语	44
(1965年6月7日)	
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	46
(1965年6月9日)	
对《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的批语	47
(1965年6月11日)	
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48
(1965年6月16日)	
给章士钊的信	51
(1965年6月26日)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54
(1965年6月26日)	
对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	56
(1965年6月29日、7月10日)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	58
(1965年7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	59
(1965年7月10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稿的批语	61
(1965年7月11日)	
对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62
(1965年7月12日、15日)	
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锻炼的指示	64
(1965年7月15日)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	67
(1965年7月18日)	
给郭沫若的信	69
(1965年7月18日)	
给章士钊的信	72
(1965年7月18日)	
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名	75
(1965年7月18日)	
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	76
(1965年7月18日)	
对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北九个材料的报告的批语	77
(1965年7月19日)	

和医务人员的谈话	80
(1965年7月19日)	
给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的题词	82
(1965年7月20日)	
在全国公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84
(1965年7月20日)	
给陈毅的信	85
(1965年7月21日)	
给华罗庚的信	90
(1965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92
(1965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电报	94
(1965年7月25日)	
对首批援越高炮部队开赴越南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96
(1965年7月25日)	
给于立群的信	97
(1965年7月26日)	
和李宗仁及其夫人的谈话	101
(1965年7月27日)	
关于毛泽民出生年月的批语	103
(1965年7月27日)	
对中央转发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报告的通知的批语	104
(1965年7月29日)	
对一篇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的批语	106
(1965年7月)	

对《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的批语.....	107
(1965年8月1日)	
关于查找杜牧全集的便条.....	108
(1965年8月1日)	
对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09
(1965年8月2日)	
在接见汇报卫生工作同志时的谈话.....	110
(1965年8月2日)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	116
(1965年8月3日)	
给康生的信.....	123
(1965年8月5日)	
打仗主要靠自己创造经验.....	125
(1965年8月5日)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	131
(1965年8月8日)	
关于找韩昌黎全集的便条.....	136
(1965年8月10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137
(1965年8月14日)	
给李先念的信.....	139
(1965年8月15日)	
对击沉国民党军“剑门”“章江”两舰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	140
(1965年8月15日)	
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	141
(1965年8月17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45
(1965年8月22日)	
对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的批语	147
(1965年8月24日)	
为钟学坤题词	150
(1965年8月30日)	
在中组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上 加写的话	152
(1965年8月)	
为《西藏日报》题写报头	154
(1965年8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155
(1965年9月1日)	
对胡乔木二十七首诗词稿的批语	157
(1965年9月5日、15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162
(1965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64
(1965年9月8日)	
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166
(1965年9月14日)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	167
(1965年9月15日)	
为《空军报》题写报头	169
(1965年9月15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时的谈话	171
(1965年9月18日)	
在外交部给印度政府的复照稿上的批语	172
(1965年9月19日)	
对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174
(1965年9月24日)	
给邓颖超的信	176
(1965年9月25日)	
念奴娇·鸟儿问答	178
(1965年秋)	
对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名单(草案)的批语	181
(1965年9月30日)	
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	182
(1965年9月)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	183
(1965年9月)	
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	184
(1965年10月1日)	
对外交部关于陈毅出访五国概况汇报的批语	192
(1965年10月)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4
(1965年10月6日)	
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	196
(1965年10月10日)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200
(1965年10月20日)	

对总政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 的批语	203
(1965年10月28日)	
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204
(1965年10月30日)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205
(1965年10月)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的电报	207
(1965年11月6日)	
对林彪所提五项原则的批语	209
(1965年11月20日)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	210
(1965年11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214
(1965年11月28日)	
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的批语	216
(1965年11月)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	218
(1965年11月)	
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220
(1965年11月)	
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222
(1965年11月)	
为《郑州晚报》题写报头	223
(1965年11月)	
批判罗瑞卿	224
(1965年12月2日)	

给陈伯达的信	225
(1965年12月2日)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	226
(1965年12月2日)	
反对折中主义	227
(1965年12月2日)	
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232
(1965年12月2日、7日)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	235
(1965年12月14日)	
关于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语	236
(1965年12月18日)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238
(1965年12月21日)	
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	244
(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电报	246
(1965年12月31日)	
在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四期上的批语	248
(1965年)	
关于礼宾工作的指示	250
(1965年)	
重读《长冈乡调查》时写的批注	252
(1965年)	
七律·洪都	254
(1965年)	

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头	255
(1965年)	
卜算子·悼艾地同志	257
(1965年12月)	
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的批注	258
(1965年)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265
(1966年1月10日)	
给章士钊的信	267
(1966年1月12日)	
给周世钊的信	269
(1966年1月29日)	
对有关《海瑞罢官》问题七个材料的批语	270
(1966年2月5日)	
为焦裕禄题词*	271
(1966年2月7日)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	272
(1966年2月6日、12日)	
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	274
(1966年2月8日)	
和毛远新的谈话	275
(1966年2月18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	277
(1966年2月19日)	
诱敌深入要做两手准备	280
(1966年2月21日、22日)	

为罗丽华题词	282
(1966年2月24日)	
对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发言稿的批语	284
(1966年2月、4月)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286
(1966年3月12日)	
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290
(1966年3月12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92
(1966年3月20日)	
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	303
(1966年3月)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的批语和修改	304
(1966年3月、4月)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311
(1966年3月、4月)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316
(1966年4月14日)	
对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词中一段话的批注	318
(1966年4月14日)	
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319
(1966年4月23日)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320
(1966年4月)	

对《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修改和批语	327
(1966年4月)	
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	329
(1966年4月)	
对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的指示	330
(1966年4月)	
中国是否会出修正主义	332
(1966年4月)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333
(1966年5月5日)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335
(1966年5月7日、14日)	
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	342
(1966年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加写的几段话	343
(1966年5月16日)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的批语和批注	346
(1966年5月17日)	
关于同意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批语	349
(1966年5月30日)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大字报的批语	350
(1966年6月1日)	
在杭州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	354
(1966年6月10日)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365
(1966年6月30日)	
七律·有所思	367
(1966年6月)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	371
(1966年)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建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稿的批语	372
(1966年7月2日)	
给江青的信	376
(1966年7月8日)	
对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380
(1966年7月10日)	
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话	381
(1966年7月10日)	
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	382
(1966年7月12日)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	383
(1966年7月16日)	
工作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	397
(1966年7月21日)	
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	402
(1966年7月22日)	
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	405
(1966年7月)	

对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批语	406
(1966年7月、8月)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414
(1966年7月25日、8月4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416
(1966年7月31日、8月1日)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418
(1966年7月)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	420
(1966年7月)	
关于打人问题	421
(1966年8月1日)	
不许镇压学生运动	422
(1966年8月4日)	
炮打司令部	425
(1966年8月5日)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	436
(1966年8月5日)	
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437
(1966年8月5日、9日、11日)	
对李达来信的批语	442
(1966年8月10日)	
在中央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	443
(1966年8月10日)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445
(1966年8月12日)	

对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请示报告的批语………	448
(1966年8月15日)	
给刘少奇的信………	449
(1966年8月15日)	
对林彪三篇讲话稿的批语………	450
(1966年8月16日)	
为北京大学校刊题名………	451
(1966年8月16日)	
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的谈话………	452
(1966年8月18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北大附中红卫兵谈话纪要………	486
(1966年8月18日)	
革命要靠自己………	488
(1966年)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	493
(1966年8月20日)	
对薄一波来信的批语………	495
(1966年8月21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96
(1966年8月23日)	
对谢富治关于公安部机关精简设想的批语………	497
(1966年8月26日)	
关于传阅文件问题的批语………	498
(1966年8月26日)	
在李富春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499
(1966年8月28日)	

对关锋、戚本禹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500

(1966年8月28日)

在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来信上的批语……………502

(1966年8月30日)

坚决打击入侵海南岛上空的美机^[1]

(1965年4月9日)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驻青岛的那个师调去海南岛没有？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

[1] 1965年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9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坚决打击美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将海南岛地区的海军航空兵改由空军统一指挥。周恩来审阅修改这一报告后，杨成武即呈交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对该报告的答复。

对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 指示稿的批语^[1]

(1965年4月13日)

已阅，同意。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5年4月10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4月9日修改稿）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指示稿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指示稿还对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和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事项提出了要求。中共中央4月14日以中发〔65〕208号文件将这个指示发至县团级党委。



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

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 代表时的指示

(1965年4月21日)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跟敌人。就是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关于反空降和战略战术问题^[1]

(1965年4月28日)

一

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这种空降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后方，配合正面的进攻。空降的兵力不会很多，一个地区无非是一、二个师，或者一个小的集团。所以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二

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总之，要打歼灭战，总要打死人，抓到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汇报作战问题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 情况摘报的批语

(1965年4月29日)

江青：

此件^[1]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我今日离此^[2]去别地爬山。又及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5年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五十八号登载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要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报告：1964年棉花生产在上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预计可收购3100万担，比1963年增加1000万担，超过了1957年度（2700万担）的水平。由于棉花收购增多，供应上比较主动。今年安排供应纺纱用棉2438万担，可纺纱630万件，比上一年度增加41%。絮棉平均每人供应四点九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二两。国家储备200万担外，周转库存比原计划增加210万担。拟从1964年度收购的棉花中拿出200万担，作为战略储备。还打算从1965年度新棉中再拿出100万担作为战略储备，要求在1965年年底全部入库。

[2] 指武汉市。

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1]

(1965年4月)

—

劳改犯办了很多事情，要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没有几个贪污分子不行，这样大的国家没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行。

他们可有才能！没有才能，反革命干什么？在一定条件下他能做很多事，凡有功的，可以摘掉帽子，有的还可以奖励。二十三条为什么规定这么一条：工作队的成员不一定要十分干净，有坏人不要怕，有些人政治上不好，但很有才干，改造嘛！改造不了也不要紧，只要把他们引到正路，就很有用，我们不会贪污，不懂贪污，也不懂技术，他们懂得这些，只要我们知道他们，政治挂帅，可以让他们办很多事，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是要调动他们，他们中间可有才能，他发明真空电炉，是高级产品，我们不行，他行。

—

改造要抓紧，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

[1] 本篇一是1965年4月，关于王灿文发明真空冶炼电炉的指示；本篇二是1965年4月，在十四次公安会议期间对劳改工作的指示。

多少钱，要抓改造，让他们寄点钱回家。

第一是思想改造，第二是生产，劳改工作干部不能太弱，要训练。训练两个星期就行了。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 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5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向你們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熱烈的祝賀。

一九四五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的援助下，赶走了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取得了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我们高兴地看到，解放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成就。

中捷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兄弟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深信，中捷两国人民将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为支

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 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1965年5月11日、12日)

—

请徐秘书^[1]用电话告总理，同意发表这个声明。^[2]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半

—

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3]政府派出了三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

[1] 指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1965年5月1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北京明日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我们建议以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现将声明稿全文电告，请予批示。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声明全文见本篇二。

[3] 约翰逊，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目前，爱国的多米尼加人民正在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的战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我深信，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多米尼加的反美爱国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是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这一次，美国政府把什么“睦邻政策”“不干涉原则”等等骗人的鬼话一股脑儿摔在一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这就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强盗的原形。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1]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还打着“反共”的旗号。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做美国奴隶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保卫本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人。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

[1] 刚果（利），即今扎伊尔。

条英机^[1]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2]，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捡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使多米尼加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必须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英勇的多米尼加人民，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亚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非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

[1] 希特勒，德国纳粹首领。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首领。均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侵华事变，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日本陆军大臣和内阁首相，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捕，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2] 指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1890年，1910年改称泛美联盟。1948年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即受到美国的操纵和控制，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联合谴责美国的经济掠夺和贸易歧视政策，美国在该组织中的霸主地位日益衰落。

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必败！

对关于第二次核试验试爆时间的报告 和新闻公报稿的批语^[1]

(1965年5月12日)

退总理^[2]。同意^[3]。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65年5月11日呈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张爱萍、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等关于第二次核试验预定起爆时间的报告以及新闻公报稿的报告的批语。

[2] 这里指周恩来。

[3] 周恩来的转呈报告说：从5月12日到13日大概有20多小时的好天气。经与罗瑞卿、杨成武、刘杰等同志商定，已告前方准备行动。前方来电，已定明日行动。行动后的新闻公报，已经常委各同志审阅，现送上请核。1965年5月14日10时，第二次核试验成功进行。5月15日，新华社正式发表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 四十五周年的电报^[1]

(1965年5月15日、20日)

—

同意。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在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庆祝它诞生四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向光荣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65年5月14日报送的以毛泽东名义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四十五周年的电报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这个电报的全文。

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英雄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旗手，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突击队。

四十五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帝革命的旗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印度尼西亚反帝革命的历史上，在东方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联合其他民主爱国力量，展开了粉碎美、英帝国主义合伙制造的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退出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和在国内打击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果敢行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一贯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最近，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越抗美运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同现代教条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和平等的原则，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迪·努·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善于从本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出

色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独立地制定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指引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斗争不断地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以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样亲密的坚强的战友而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两党的革命团结和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斗争熔炉中，经过了千锤百炼，经受了严重考验，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必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坚定不移地同你们站在一起，并肩前进，共同战斗。

我们坚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将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和扩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力量，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引向新的高潮，引向新的胜利。一个完全独立、民主、繁荣、先进的印度尼西亚必将屹立在世界上。

光荣的、伟大的、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 七十五寿辰的电报

(1965年5月18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在你七十五寿辰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亲爱的主席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你是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久经考验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老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几十年来，你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革命的旗帜，领导越南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你对越南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尊敬。

目前，英勇的越南人民正在越南劳动党和你的英明领导下，以决战决胜的英雄气概进行着气壮山河的抗美救国正义斗争。越南人民的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捍卫越南自己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也支援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支援了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也都站在你们一边。伟大的越南人民必胜，万恶的美国侵略者必败。

亲爱的主席同志，我们衷心祝你健康、长寿。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1965年，毛泽东和胡志明在一起。



1965年，毛泽东和胡志明亲切交谈。



1965年，毛泽东在首都各界人民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上。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

(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2]，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1] 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下旬，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游览视察。22日，先后到黄洋界和茨坪。在茨坪居住期间，了解井冈山地区水利、公路建设和人民生活，会见了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群众。25日写了这首词。29日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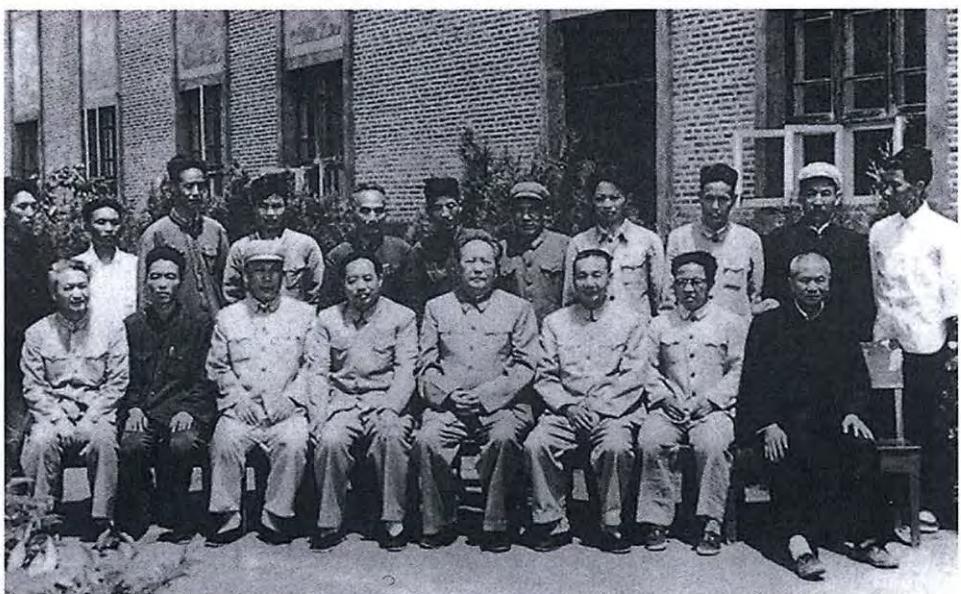
[2] 黄洋界，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另四个是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1]
可上九天揽月^[2]，
可下五洋捉鳖^[3]，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1]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这次重来，已经过去了38年，他却觉得只是弹一下指、挥一下手的短时间。

[2] 九天揽月，九天，天的极高处。《孙子·形》：“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揽月，摘取月亮。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览同揽。

[3] 捉鳖，喻擒拿敌人。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四折：“管教他瓮中捉鳖，手到拿来。”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茶陵时和茶陵县负责同志合影。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和永新县干部亲切谈话。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毛泽东和张平化等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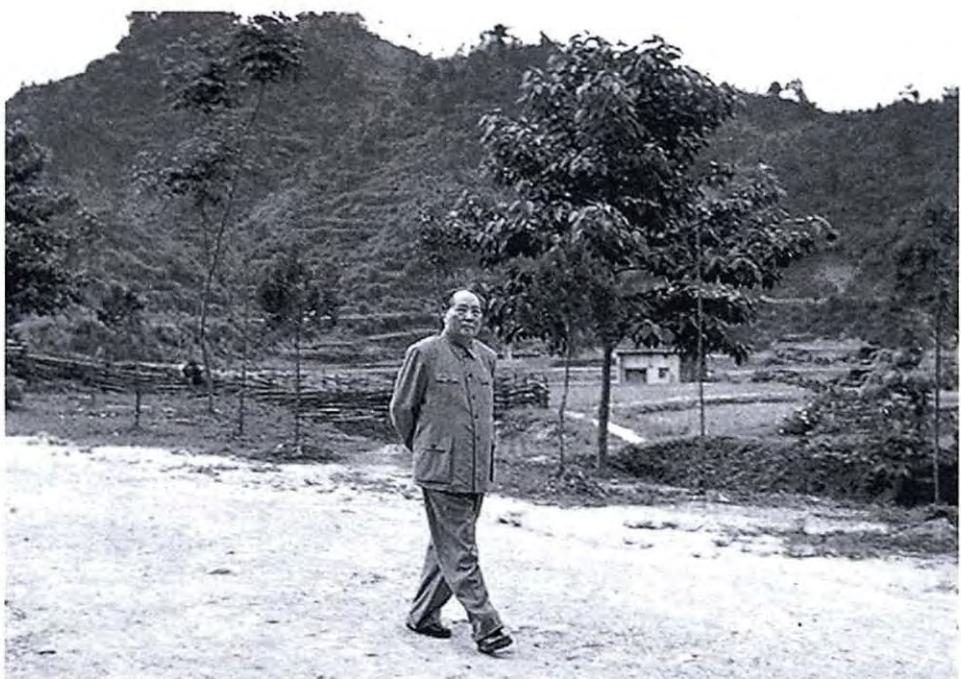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宾馆。



1965年5月，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江西井冈山散步。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漫步。



1965年5月，毛泽东漫步井冈山。



1965年5月，毛泽东和警卫员王宇清在井冈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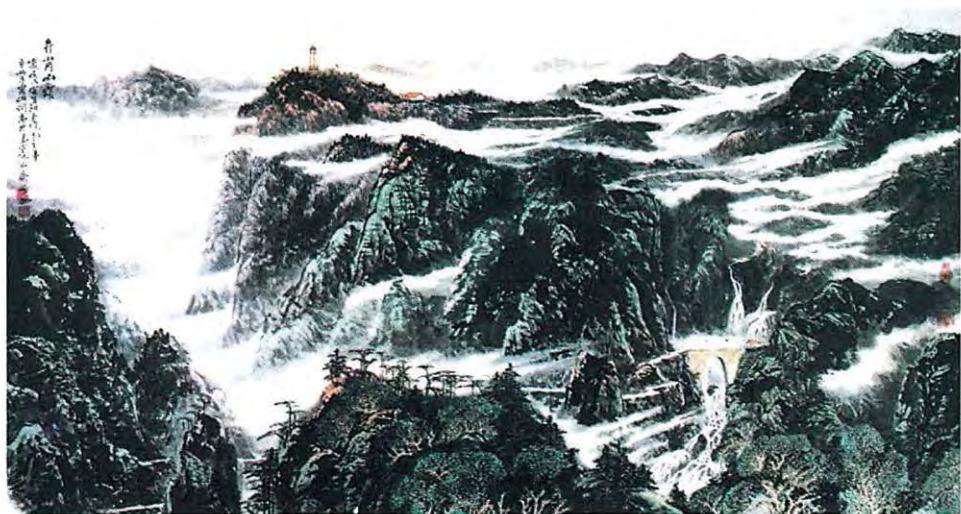
1965年5月，毛泽东会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和干部。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会见当地群众。



《毛主席和井冈山人民在一起》(中国画)



《井冈颂歌》(诗意图)



《重上井冈山》(油画)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油画)



《弹指一挥间》(诗意图)

对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 全体同志时指示纪要的批语

(1965年5月25日)

此件^[1]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2]，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

毛泽东
五月廿五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965年5月21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这次会议是为贯彻执行毛泽东1964年在十三陵谈话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而召开的。纪要说：1965年5月19日，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同志接见了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同志。在听取罗瑞卿和几位小组长汇报时，他们分别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2] 指示纪要提出的主要意见是：一、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二、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对增加兵员，要从全局来考虑，军队搞得太多，就要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三、备战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先从部队抽一点力量去搞工事。四、要从军事思想、物质基础和军队的政治工作三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念奴娇·井冈山

(1965年5月)

参天万木，
千百里，
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
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1]前，
黄洋界上，
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
古代曾云海绿。^[2]

弹指三十八年，
人间变了，
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

[1] 五井碑，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总称五井。明清以来立有五井碑，现已毁。

[2] 古代曾云海绿，有人说，这里古代曾经是海。

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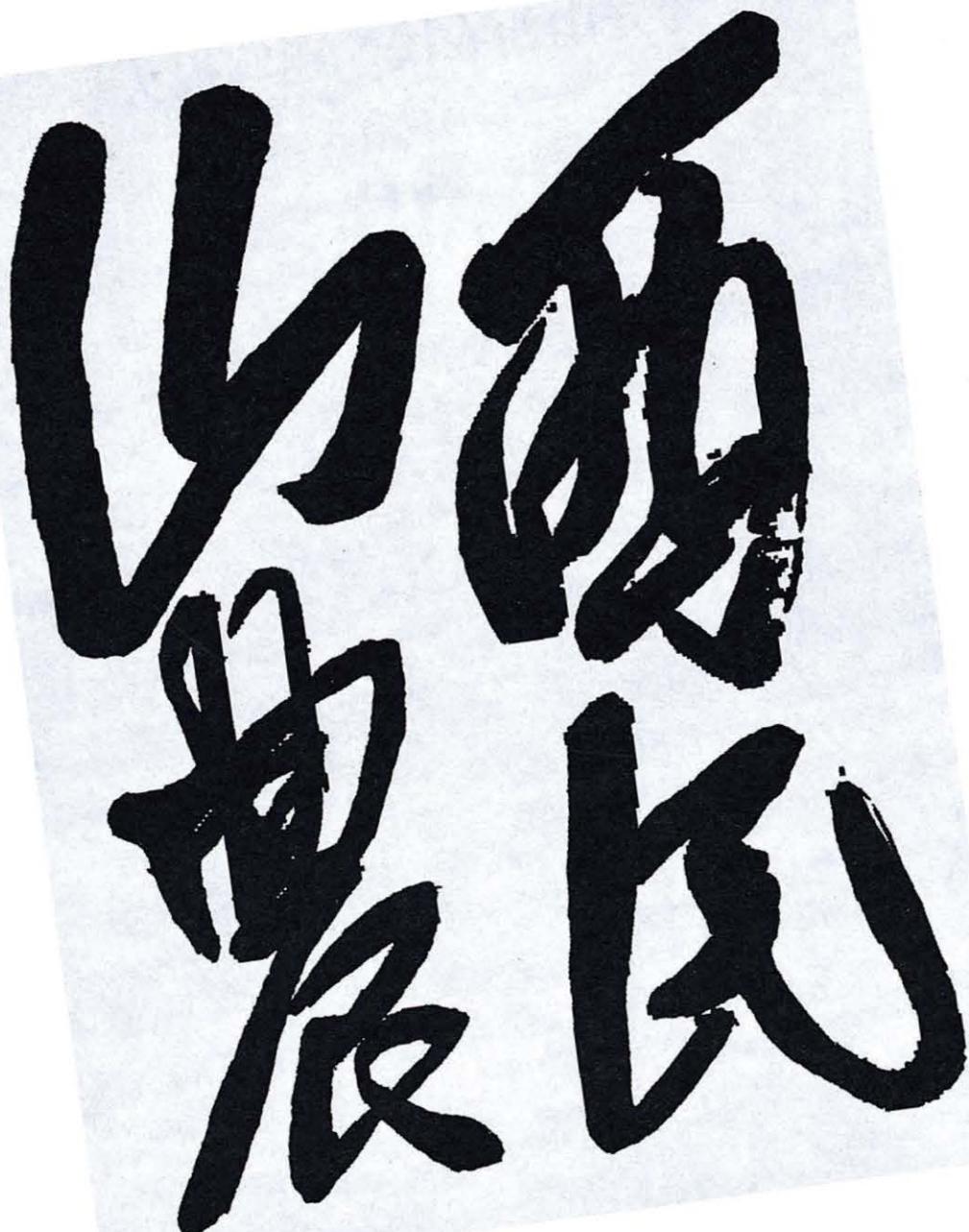
万怪烟消云落。

为《山西农民》题写报头^[1]

(1965年5月)

山西农民

[1] 《山西农民》报是山西省委创办的第二张报纸，也是全国创办最早的农民报之一。毛泽东为其题写报头。



毛泽东为《山西农民》题写的报头。

为郭国群^[1]题词

(1965年5月)

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

[1] 郭国群，当时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友好互助条约 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65年5月3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祝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 内部材料上的批语^[1]

(1965年6月2日)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2]了。

毛泽东

六月二日于杭州

[1] 这个批语写在国际关系研究所1965年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登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上。文章说，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策划的各式各样的和谈阴谋已经一一破产，逐步扩大轰炸北越的战争讹诈一手也未收到预期效果。现在，是否要把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线，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大大地加剧起来。他们的争吵表明，约翰逊政府确确实实是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但这一政策在国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很大压力，因此，约翰逊政府将加强“和谈”攻势，企图以此争取舆论，摆脱困境，为进一步扩大战争创造“政治资本”。同时在“和谈”攻势的掩盖下，继续加紧扩大战争的各种准备。估计美国目前暂时还不会把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线，但对目前轰炸区域空袭的强度将进一步增加。

[2] 指1965年4月1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 材料上的批语^[1]

(1965年6月7日)

江青阅。共四件^[2]，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六月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七三期登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材料说，去冬到今春，山西省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贫农、下中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性，发现和培养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分子和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在各县比较普遍地举办了农民讲习所。现在看来，举办这种讲习所效果很好。省内先后举办这种讲习所的县（市），有97个。截至今年3月底，共训练了92901名学员，每期学习时间为20天左右。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九评”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个条件等12篇文章为基本教材。在春节以后，还普遍增加了“二十三条”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是从学员的思想实际和当前阶级斗争实际出发，搞思想运动。整个思想运动分5个步骤：第一，报告当前国内外形势，明确学习目的，解除思想顾虑，调动学习积极性；第二，结合学习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

的文件，发动学员回忆诉苦、讲三史（家史、村史、社史），议三史，明确阶级观点，调动阶级感情；第三，结合学习有关社会主义性质和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文件，揭发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及其危害，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明确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第四，结合学习有关思想革命化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文件，照镜子，找差距，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提高争当革命接班人的自觉性、积极性；第五，总结学习收获，进行小组鉴定，巩固与扩大学习成果。学员主要是贫农、下中农，其他中农出身的学员约占2%。这种讲习所，在县里一般有一名县委常委领导，他们抓的关键，一是抓挑选学员，二是抓办学人员革命化。经过学习，学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性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中90%以上已成为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2] 除上述一件外，另三件不详。

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1]

(1965年6月9日)

我过去也当过记者，办过报纸，做过小学教员，就是不会打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谁教会我打仗的？蒋介石用杀人的办法强迫我们拿起枪来同他们打仗，我也就学会打仗了。人们说我是“好战分子”，一点也不错，我打了二十二年仗。我现在还想打仗，不过不是想出去打，而是要敌人打进来。

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这点在人民中间要进行宣传。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不然军火商发不了财。他们以为是会打胜的，实际上打起来对我们有利，他们一定会失败，这一点他们没有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打出个印度尼西亚和几十个民族主义国家。如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没有了。世界上总是没有武器的人打败有武器的人，没有武器的人在打仗中间会建立起独立的陆、海、空军。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把反对赫鲁晓夫^[1]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的批语^[2]

(1965年6月11日)

康生、冷西同志：

此文^[3]已经看过，写得很好，照此发表。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14日和15日，他的这两个职务被先后解除。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1965年6月9日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给毛泽东的信上。

[3] 指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写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在196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5年第七期发表。

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

(1965年6月16日)

—

我看你们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提的要求高了，你们定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在你们的汇报提纲里边讲，“打起仗来，你打你的，我建我的”，实际上真正打起来，劳动力、粮食、运输都要转过来。你打你的，我建我的，只能是你打你的，我建我可能建的那些部分。我们过去有经验，抗战期间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能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三。一百个人只能养两三个人，多了就不行，就没有饭吃了。要精兵简政。打起仗来，部队也不要搞那么多，特别是后方部队还要搞些生产。

—

华东开会，许世友^[2]讲，要把敌人完全顶住，不准它进来，在沿海打光。我说，你不给它点好处，不使它感觉到有点味道，这不成，那样它就不来了。要使它感觉到有一点味道。请问，一个国家

[1] 本篇一至六是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2] 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打仗，这么大国家，纵不是像日本人那样长驱直入，也要给它一些味道，才会给我们机会打大胜仗。我看，就是怕它不进来，它只在边沿上搞一下，那就实行许世友的建议，在边沿上把它整下去。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第五次反“围剿”，不诱敌深入，敌人只好筑堡垒。让敌人筑，你筑你的堡垒，我不放一枪，到后面找个地方休息去，把你的堡垒置于无用。比如筑到会昌，何不让他筑，我们统统撤退，到后方去练兵，让他筑到瑞金，他后边守的人就少了。然后到别的地方，到那些没有堡垒的地方去打，或者到有堡垒但守的人少的地方去打。姜太公钓鱼钓不到，就是因为不给鱼东西吃。你钓鱼不给些东西不行。你拿破仑不到莫斯科，怎么会打败仗？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诱敌深入，它进来之后，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包围得太多了，太多就歼灭不了。三个师五个师歼灭它一个师，那样才能吃掉它。

斯大林格勒之战也算是诱敌深入，但我看他不是自觉地诱敌深入，而是被迫的。斯大林格勒之所以能守住，一是敌人不能救援；二是敌人后方沿线要兵守；三是集中力量吃它一坨，不到处去吃。再加上气候太冷，冬天又有大雪。

三

城市防空，过去有，后来取消了，不对。不能认为城市防空这套是从苏联来的，就全面否定。我看国家一个钱也不出，你修就修，不修就拉倒。今天挖一点，明天挖一点，就成了。当然，也要搞个计划，搞点简单图纸，帮助解决点工具。挖出的土方如何处理，也得有

个办法。一家挖个洞可以，几家联合挖个洞也可以，有什么了不得？（插话：先在北京试验一下。）不！各个大城市都开始搞。

四

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起来，一个是搞不起来。搞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抗日战争时期打日本，后来打蒋介石，一直到抗美援朝，我们不是也打胜了吗？美国人比蒋介石厉害，也厉害不了多少。我们没有准备好，他们来了怎么办？也还不过是蒋桂八九个王牌师。我看，能顶得住就顶，顶不住，那就请吧！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五

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六

打起仗来，工厂也要搞点农业，这是工农关系问题。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否则他就不同你一起打仗了。大军南下时，我们有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老百姓高兴了，后方巩固了，加强纪律性听话了，不胜才怪呢！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

给章士钊^[1]的信

(1965年6月26日)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2]。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3]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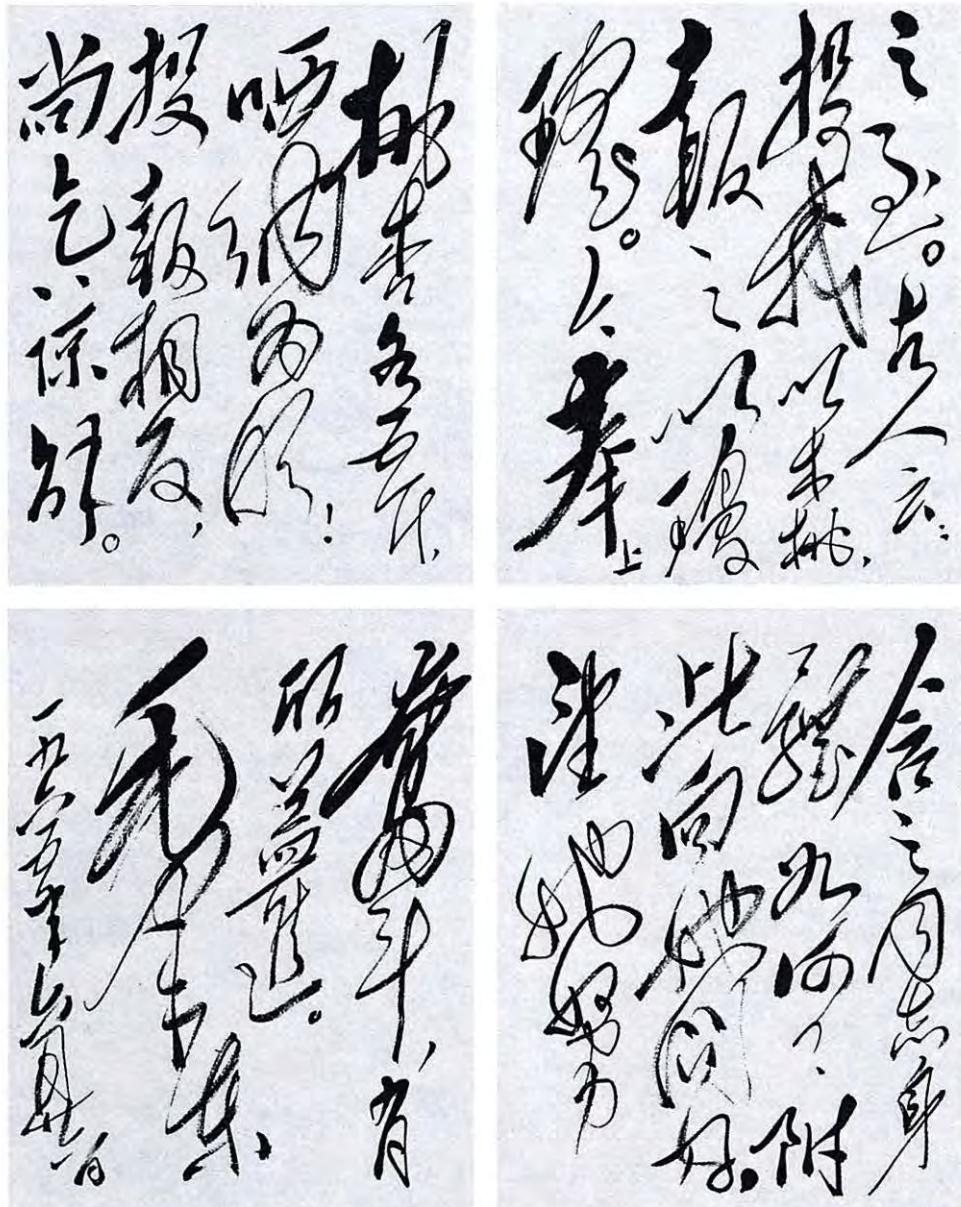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参见《诗·卫风·木瓜》。

[3] 含之，即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

(1965年6月26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2]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3]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

[1] 这是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和医务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2] 华陀，东汉时期著名医学家，医术精湛，成为后世神医的代名词。

[3] 李时珍（约1518—1593），字东壁，晚年自号濒湖山人，蕲州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之一，其所著《本草纲目》是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对后世医学和博物学研究影响深远。

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对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 两个文件^[1]的批语和修改^[2]

(1965年6月29日、7月10日)

—

谢部长：

此两件^[3]都已看过，照此办理。会议如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

毛泽东

六月廿九日

—

改了几句^[4]。

—

少数改造好、对生产建设有特殊贡献的犯人或刑满留场人员，
像锦州电机厂搞出真空冶炼和电子轰击炉的工程师王灿文（留场人

员)这种人，可以减刑、提前释放或摘帽子，还可以给以工程师待遇或者其他适当的经济待遇。

四

主席讲，天下太平，很好。天下大乱，也不见得是坏事。乱(指战争)有乱的极大好处，例如我党经历过二十五年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不算在内)，还不是都打胜了。

[1] 指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65年6月11日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和公安部党组1965年7月9日关于第十四次公安会议的报告。谢富治的讲话就下列四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要上交问题；二、公安工作备战问题；三、教会和反动会道门问题；四、公安队伍的“四清”和政治工作问题。公安部党组的报告提出了需要中央正式批准的几个具体问题：一、关于捕人、拘留和劳动教养的控制问题；二、加强改造工作问题；三、关于民警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谢富治1965年6月28日为送审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谢富治1965年7月10日为送审中央转发第十四次公安会议两个文件的通知代拟稿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公安部党组报告第二个问题“加强改造工作”中的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四是毛泽东对谢富治讲话记录稿第二个问题“备战”中的一段话的修改。

[3] 一件指谢富治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另一件指中央防空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的南宁、个旧、湛江三市动员群众挖防空洞、壕效果很好的材料。

[4] 参见本篇三、四。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1]

(1965年7月3日)

陆定一^[2]同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共青团中央办公厅1965年6月25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十八期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文章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们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 四十四周年的电报^[1]

(1965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致以熱烈的祝賀。

中蒙兩國人民之間存在着深厚的友誼。中國人民今后仍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同蒙古人民一起，為加強中蒙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團結、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政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的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策、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祝兄弟的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稿^[1]的批语

(1965年7月11日)

康生、冷西^[2]同志：

此件已阅，写得很好。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1] 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7月10日的这份复信稿，据理驳斥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4月17日来信中对中方不同意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所进行的攻击和诬蔑，指出：我们细心地观察了你们几个月来在越南问题上所进行的种种活动，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实行军事上的控制，把我们套在你们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你们4月3日提出的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就是贯彻你们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复信稿还对苏方提出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指出：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对李宗仁^[1]回国问题的报告的 批语和修改^[2]

(1965年7月12日、15日)

总理^[3]:

[1] 李宗仁，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7月9日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上写的批语。调查部意见说，程思远于6月28日抵达瑞士，向李宗仁转达了在京所谈各节。国内建议，为了李的安全，回国前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可在回国后再考虑。李同意这个意见，并表示将在7月20日偕其妻郭德洁同程思远一起经巴基斯坦回国。但程思远建议，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爱国立场。我们意见，对此可考虑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李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第二个方案，同意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本篇二、三是毛泽东1965年7月15日对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给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的电报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其中本篇三写在电报稿下面一段话之后：“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拟定告国内。如李认为需要抵沪商量后才好拟稿，也请李决定。”

[3] 总理，指周恩来。

似以第二方案^[1]为较好，稿子^[2]事前商好，并无坏处。请再酌。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二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3]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
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毛泽东

十五日早

三

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

[1] 指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7月9日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提出的第二个方案。

[2] 指李宗仁的书面声明稿。李宗仁1965年7月20日抵达北京时在首都机场发表声明。这个声明在196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

[3] 李，指李宗仁。

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 去锻炼的指示

(1965年7月15日)

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1965年7月16日，毛泽东会见应邀访问中国的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毛泽东等接见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1]

(1965年7月18日)

—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2]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 Model^[3]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

齐白石、陈半丁^[4]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5]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6]。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1965年5月12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

泽东在这封信最后一页上写的批语。信中说，关于使用模特问题，我们从油画专业出发，提出几点意见：一、资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必须彻底批判。模特写生是资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中技术训练体系的核心。因此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废除模特制的基本革命精神是可以理解的。二、在党的文艺教育方针指导下，必须逐渐完备无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建立一套新的和它相适应的技术训练体系。模特写生作为解决美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三、美术创作是以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表现人物为主的。对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它不只解决描写人物的写生能力，而且也可以有助于解决一般的写生规律。在新的技术训练体系中，不宜排斥人物写生，不宜排斥课堂作业，不宜排斥少量的人体写生。男女人体都应该在技术训练中占少量的比例。四、从废除模特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据我们所知，美术学院不少教员和学生也都为此而担心。因此，我们建议在美术学院“四清”运动第四阶段中，用毛泽东思想、用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用和旧传统决裂的精神，发动群众对使用模特问题进行民主讨论，以求得妥善的解决，把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步地建立和完备起来。

[2]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恩来，即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3] Model，英语单词，汉语一译“模特儿”。

[4] 齐白石，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陈半丁，画家，当时任中国画院副院长。

[5] 徐悲鸿，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6] 刘海粟，画家，当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给郭沫若^[1]的信

(1965年7月18日)

郭老：

章行严^[2]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3]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力群^[4]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1] 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2] 章行严，即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 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4] 力群，即于立群，郭沫若的夫人。



毛泽东致郭沫若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郭沫若信的手稿。

给章士钊^[1]的信

(1965年7月18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1]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 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敬爱先生：
久信及嘱
不复，不以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部分）。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部分）。



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名^[1]

(1965年7月18日)

西藏自治区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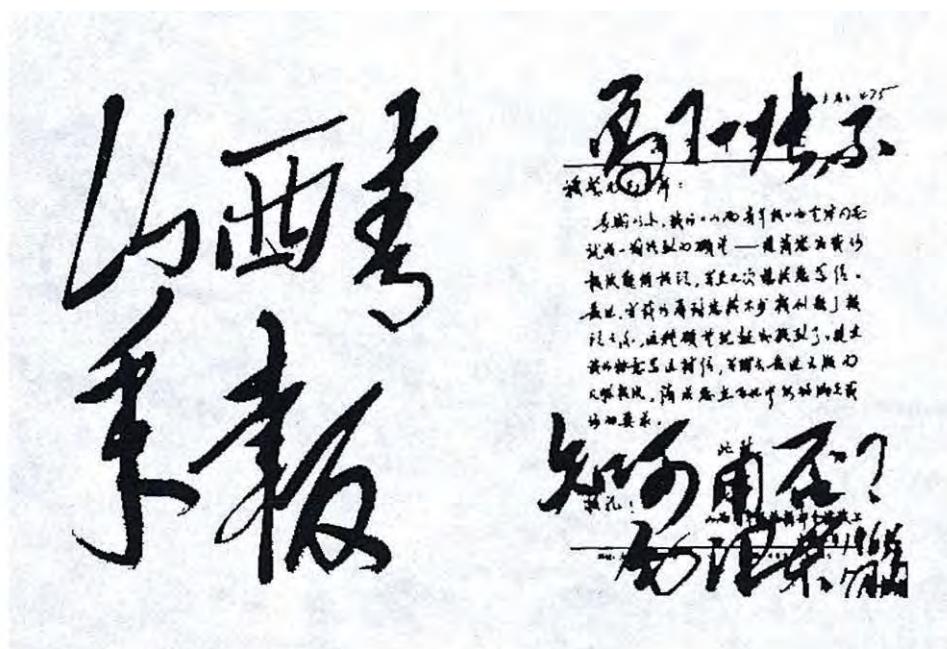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写的书名。

[1] 《西藏自治区画集》，专为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出版。毛泽东为本书题写书名。

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1]

(1965年7月18日)

山西青年报



毛泽东为《山西青年报》题写的报头。

[1] 《山西青年报》1949年创刊，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为《山西青年报》题写了报头。

对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北九个材料^[1]的报告的批语^[2]

(1965年7月19日)

少奇同志：

九件材料及你所写指示^[3]，都已看过，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1] 指湖北省孝感县县直社教分团、卧龙区区直工作队和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工作组1965年5月至7月分别总结整理的九个材料：一、《湖北孝感县组织县委工作队的情况和作法》；二、《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配备半脱产干部的情况和作法》；三、《湖北孝感县卧龙区区、社干部实行轮流值班、轮流蹲点的情况和作法》；四、《湖北孝感县卧龙区直精简机构的初步方案》；五、《湖北孝感县卧龙区清理区、社干部带家属住机关的情况和作法》；六、《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情况和作法》；七、《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建立贫下中农核心小组的情况》；八、《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财务公开的情况和作法》；九、《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

[2]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1965年7月11日关于转发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王任重从孝感寄来九个材料，每个材料都不长。我看都很重要，对“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

如何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作法。是否可以转发各地参考，以便各地党委都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附在后面，请主席批示。

[3] 指刘少奇为转发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减少脱产人员，是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切实地加以解决。王任重同志从孝感县寄来的这九个材料，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作法，现将这九个材料发给各地参考，望各地党委都来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为了改进领导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现在联系实际来学习那篇文章，会有更深刻的体会。”1965年7月20日，这个指示同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一起以中发〔65〕447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党印发。



1965年7月，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

和医务人员的谈话

(1965年7月19日)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得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毛：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毛：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

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人。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过了。他找他们谈过。

给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高殿英的题词^[1]

(1965年7月20日)

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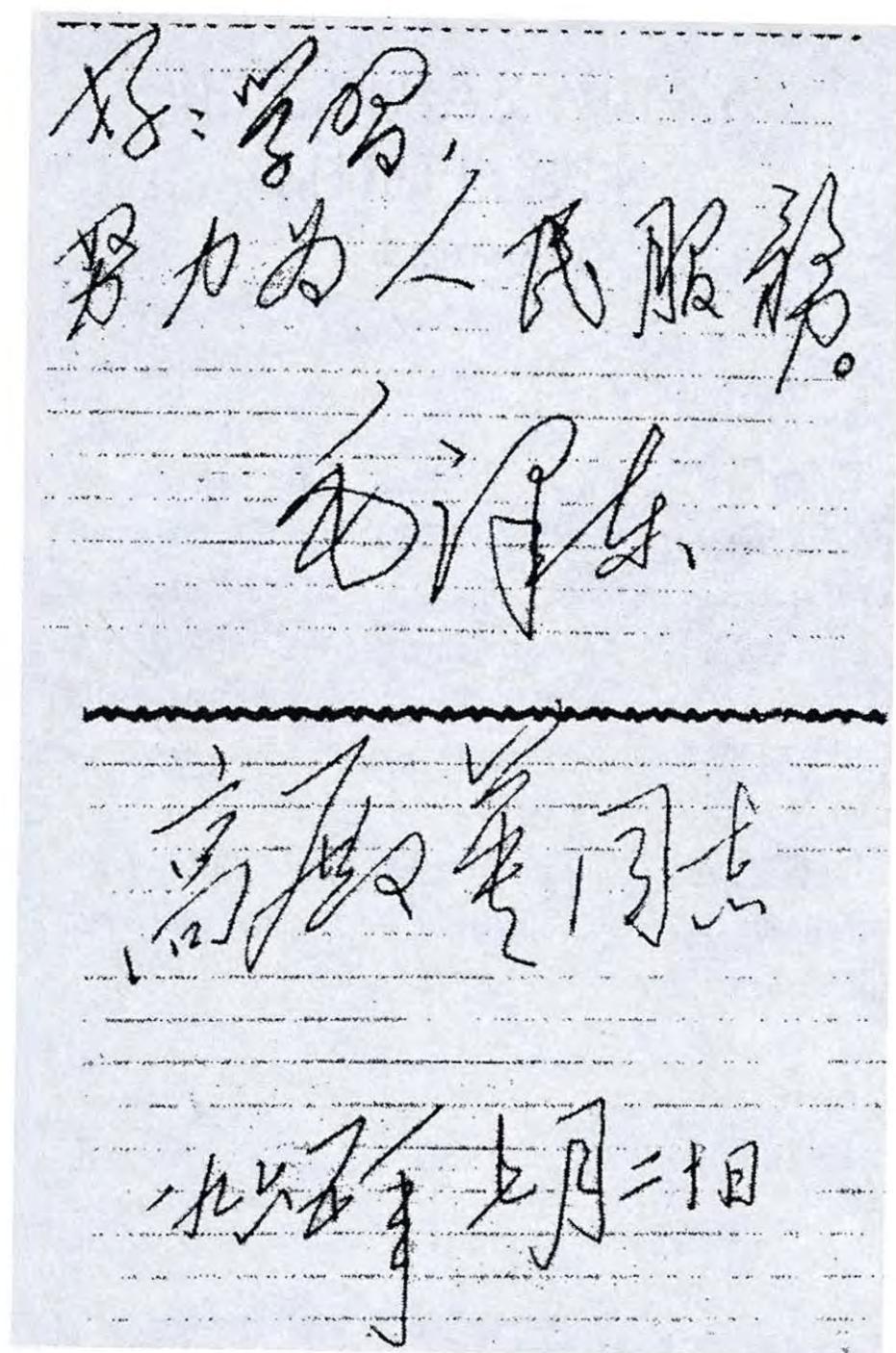
高殿英同志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在高殿英学习雷锋的笔记本上写的题词。

给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的题词



毛泽东为高殿英的题词。

在全国公交系统四清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5年7月20日)

社会的渣滓，也是不可少的，社会上没有这些渣滓才怪呢！我看一万年也会有的，不然就没有正确的了，真理是对谬误而言，唯物论是对唯心论而言，辩证法是对形而上学而言。一万年以后，形而上学，唯心论还是有的，不然社会上就没有矛盾了，斯大林晚年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只是强调苏联社会各阶级人民的一致性，而否认了不一致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了，这是指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实际上隐藏了深刻的矛盾。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果事物走向了反面，肯定变成了否定。当然，否定又变成了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说，苏联人民不可能长期被修正主义统治下去。

给陈毅^[1]的信

(1965年7月21日)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2]善七律，董老^[3]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1]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的诗词作品集有《陈毅诗词选集》。

[2] 剑英，即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他的诗词作品集有《远望集》和《叶剑英诗词选集》。

[3] 董老，指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的诗词作品集有《董必武诗选》。

西行^[1]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2]翼展，哪得鸟途^[3]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4]
风雷驱大地^[5]，是处有亲朋^[6]。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7]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

[1] 1965年春，陈毅所作的诗《六国行》组诗七首寄呈毛泽东，同年夏陈毅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谈到了诗歌的一系列问题，并为其修改了第一首，即《西行》。西行，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联、缅甸等亚非六国。

[2] 因：因为，由于。鹏，传说中的大鸟。这里喻指飞机。

[3] 得，能。鸟途，意思是说路途险阻，只有鸟能飞过。

[4] 钟，古代的一种圆形的酒壶。千钟，极言其多。仞，古代的长度单位，历代说法不同。万仞，极言其高。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意思是说从飞机上俯瞰大地，大海仿佛酿造的千钟美酒，高山如同栽种在菜畦上的高大的青葱。

[5] 风雷，风与雷；喻指全世界蓬勃兴起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驱，行进。大地，指世界。驱大地，即驱于大地。

[6] 是处，所有地方，也就是处处的意思。亲朋，亲戚朋友。指同情、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各国人民。

[7]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属河南），唐代诗人。

直言之也”^[1]，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2]，“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3]。韩愈^[4]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5]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6]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1] 参见宋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2] 参见宋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3] 参见宋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4] 韩愈，唐代文学家、诗人。

[5]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生于碎叶（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唐代诗人。

[6]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属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

陈毅同志：

你叫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几乎没有过研究，也没有熟读过五言律。你的大作，太长，破碎。只是学而用，感觉於律诗稍有体会。用律诗要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诗。我对你此诗，因我解，还未入门。我渴求写古风七律，这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律诗稍稍懂一点。怎样写七律，董老五律，你去学律诗，向他们请教。

毛泽东致陈毅信的手稿。

蝶行
千里西行急，
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展翅，
那得鸟通。 钟
海雨集于斯，
山裁系以葱。
风霜遍大地，
冬夏各销融。
只待你改一省，
已极不滿意，其餘不說。

又诗善用形象思维，不善如苏东坡而
样真说，所以此诗而该是不善不用古
赋也。如用古诗之比兴，行得，剪除此
而直言之，恐其非所比兴。此诗以被喻
之物也？兴也，先言他物以引出被喻
之物也？神似以白为底，有些诗人说
他完全不想和诗，只求免太直，如山西
徐陵，少时五州皆功名之族，可是可
以嘲笑此而以为知为诗之不易。宋人说
不懂诗是善用形象思维，一反唐初相傳
所以味同嚼蜡。以上是借读李都

是一些古典而通俗诗，多善用形象
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活斗争，古
典诗中有的是有一些好的描写，
如苏轼《赤壁赋》中写了曹操
的军队，声震天地，又李白《蜀道难》
的“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开
门”。又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诗李贺除有很少七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
也不写。李贺诗惟有一首，不知你知否

很好！
毛泽东
九月，七日

毛泽东致陈毅信的手稿。

给华罗庚^[1]的信

(1965年7月21日)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2]，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1] 华罗庚，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2] 《平话》，指华罗庚所著《统筹方法平话》。



毛泽东致华罗庚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 二十周年的电报^[1]

(1965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奥哈布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
向你们和波兰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关怀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下为建设
社会主义和维护和平所进行的斗争，对于波兰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
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把你们的成就看作是自己
的成就。

我们两国人民一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保持着不断的发展。我们希望，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两国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奥哈布、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的电报。祝贺波兰国庆二十周年。

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愿借此机会重申，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波兰人民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祝波兰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 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5年7月25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人民庆祝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兄弟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十二年前古巴人民发动的七月二十六日武装起义，开辟了古巴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坚持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政策，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和革命的果实，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巴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两个哈瓦那宣言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志和信心。现在，拉丁美洲人民反美帝、反独裁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涨。

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是经得住考验的。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

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古巴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前进。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对首批援越高炮部队开赴越南问题 请示信的批语^[1]

(1965年7月25日)

瑞卿同志：

此信^[2]看过，照办。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1965年7月25日请示信的批语。

[2] 指罗瑞卿1965年7月25日的请示信。信中说：援越部队两个高炮师拟应越方要求，于8月1日由两个方向向越南境内开进。另为增强越南北方北线铁路的防空力量和锻炼部队，在北线加了一个五七高炮团。

给于立群^[1]的信

(1965年7月26日)

立群同志：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

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2]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1] 于立群，书法家，郭沫若的夫人。

[2] 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立群同志
你得把时间
多用在工作上
少用在生活上

毛泽东致于立群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于立群信的手稿。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应邀访问中国的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奈温。

和李宗仁^[1]及其夫人的谈话

(1965年7月27日)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接见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

毛主席同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热烈握手。

毛主席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说：我们回来后都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先生对毛主席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先生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1] 李宗仁，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他偕夫人郭德洁1965年7月从海外归来，20日到达北京。



1965年7月，毛泽东会见回归祖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1965年，毛泽东会见李宗仁夫妇。

关于毛泽民出生年月的批语^[1]

(1965年7月27日)

质忠同志：

你想错了。毛泽民是我的二弟，少我两岁。

毛泽东

七月廿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1965年7月2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我在新疆看了烈士陵园，其中毛泽民同志出生年月是1895年6月。在我的记忆中泽民同志比主席大一点。是否有误，请主席指示。

对中央转发谷牧^[1]关于设计革命运动 报告的通知的批语^[2]

(1965年7月29日)

退彭真^[3]。

[1] 谷牧，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1965年6月14日批转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通知上。通知说，全国各设计单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半年多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设计革命运动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领导带头检查，主动承担责任，启发设计人员自觉革命；并且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同时组织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联系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促进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最后把思想革命落实到设计工作的改革上去。中央认为，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采用这种办法来进行“四清”运动，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功的经验。这种做法可供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参用。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党委，必须加强对设计革命运动的领导，经常督促检查，认真总结经验，注意防止偏差，保证运动更健康更深入地发展，争取新的更大的成就”。这个通知和谷牧的报告，中共中央以中发〔65〕375号文件发至省军级党委。按照毛泽东的批语，中央1965年10月3日以中发〔65〕604号文件发出关于扩大印发中央批转谷牧同志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将6月14日中央通知和谷牧报告“印发给所属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大城市区委，各大中工厂党委和各大小设计院学习和研究执行”。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已经看过，此件^⑩很好。但似应发到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以及重要工厂党委。各大小设计院都要印发。

请酌定。

毛泽东

七月廿九日

[1] 指谷牧1965年3月16日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讲了四个方面：一、当前设计革命运动的情况。1964年11月1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这是我国设计工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毛主席的号召，调动了全国20多万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很快就在全国各设计单位形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设计工作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1）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2）正在形成一种革命化的新作风。（3）开始进行规章制度的改革。（4）设计革命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二、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贪大求全；（2）许多建筑设计不符合勤俭建国的方针；（3）因循保守，不重视采用新技术；（4）缺乏战争观念；（5）设计方法繁琐，效率低，周期长，影响了建设进度。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苏联的“框框”问题，有资产阶级设计思想的“框框”问题，有设计队伍的作风问题，也有我们领导上的问题。从领导工作的角度看，有以下几条经验教训：（1）我们过去对设计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2）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设计工作阵地的深刻意义，使设计工作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3）没有认真总结设计工作的经验教训，至今还没有开创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设计工作的道路。（4）设计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于这一特点认识不足，领导工作一般化。（5）对各设计院的具体领导也很不够。三、这次设计革命运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政治挂帅问题，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问题。（2）设计工作的作风问题，也就是树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革命化的作风问题。（3）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4）整顿设计队伍问题。（5）健全领导班子问题。四、设计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关系以及运动下一步的做法。

对一篇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 材料的批语^[1]

(1965年7月)

此人谈得不错，海人〈外〉许多人都想回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调查通报》第八七二号登载的台湾一位人士认为“李宗仁回国是毛主席爱国不分先后号召的胜利”的材料上。材料中说：这位人士曾就李宗仁回国事，私下与人长谈。他说，李宗仁回国，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胜利，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这个动人号召的胜利，影响无疑是很大而又深远的。李宗仁这个抉择，聪明而正确。他的勇气是应该佩服的。从个人出处说，“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做给蒋介石看，也可以泄一下多年的积恨。从大处看，中共政权坚如磐石，回去还有什么不安全？就是个人的身后历史，最后还可以得到弃暗投明的褒扬。老实说，我是同情李宗仁的，他下此决心并不容易。据我观察，李宗仁这次回去，是他多年苦闷、徘徊、观望、等待的结果。香港、台湾都有许多不得意于蒋家王朝的人，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李宗仁，他们看到李的行动及北京的反应，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不过条件未熟，时机未至，不能有所表示而已。这些不得意的人，因李回去引起不同程度的动摇，“李能为之，我亦能为之”。不过，台湾人士不易有所行动，非待蒋死后不可。香港则不同，他们动摇之后，就会有新的想法。下次章士钊来港时，可做的文章就多了。李回去影响大且深远，其意义即在此。

对《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的批语^[1]

(1965年8月1日)

少奇同志阅后，寄福建省委叶飞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是如何部署的，盼告刘少奇同志和我。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5年7月28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五十一期上。这一期登载的《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运动时间拖得太长。福建南安县一个队员反映，他们那里的运动已有9个多月，经过运动，该县面貌已根本改观，生产形势很好，新的领导核心也建立起来了。但是省委有些领导人还说，搞运动不要受时间限制，似乎时间拉得越长，运动就越彻底，使工作队员感到遥遥无期。二、工作队员体质普遍下降。福建南安县一些工作队员反映，由于长期生活比较艰苦，最近两个月来，工作队病号突增，约占总人数的30%以上。许多人已躺倒不能工作了。大部分是水肿、肝病、胃病，营养极度缺乏。三、农忙季节不宜搞“四清”。浙江省委工作团一队员反映，目前已到夏季大忙季节，可是这里的“四清”运动还在进行。群众不止一次地向工作组反映：“农忙时间，生产这么紧张，夜晚哪里熬得了！”“最好农忙季节不要搞，到农闲再搞。”工作队员也很疲劳，入夏以来，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来信建议，农忙时期不要搞“四清”运动，要关心工作队员的劳逸结合，准许体弱有病的同志回去调换。

关于查找杜牧^[1]全集的便条

(1965年8月1日)

找唐人杜牧之全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一日

[1] 杜牧，字牧之，唐朝文学家，著有《樊川文集》。

对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 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

(1965年8月2日)

请书记处处理。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卫生部党委1965年8月1日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今年6月26日，主席对卫生部提出了严格的批评。目前，我们正在根据主席的批评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指示，检查我们的错误，并研究制定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措施。现先就北京医院的进一步改革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请审核批示，以便立即着手执行。一、彻底改变北京医院的性质，取消北京医院的名称，改称东单医院。取消该医院专门承担高级干部及高级干部家属医疗的任务。今后，该院和市内其他医院一样，完全向群众开放，并负责划区公费医疗任务。二、集中在原北京医院的高干及高干家属医疗任务，今后根据划区原则，分别由包括东单医院在内的各个划区医院负担。今后，还拟加强和增设市区门诊部，负责群众和干部的医疗工作。中共中央8月14日以中发〔65〕495号文件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并告总政治部，要求各地区对于类似北京医院的这种老爷医院，必须同样进行改革，纠正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

在接见汇报卫生工作同志时的谈话

(1965年8月2日)

(八月二日，钱信忠和张凯^[1]向毛泽东汇报了卫生工作的相关情况)

钱信忠、张凯（以下简称钱、张）：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和批评很中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根据主席指示作了检查，请主席再给我们一些指示。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要讲的都已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钱、张：近来我们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讨论，打算组织城市卫生人员下去做几件事情。第一件，除给农民治病外，就是为农村生产队培训不脱产卫生员。

毛：训练多长时间？

钱、张：半个月左右。

毛：半个月太短了吧？

钱、张：他们主要学会些针灸，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训练后还要带他们做。

毛：带很重要，带多长时间？

[1] 钱信忠（1911—2009），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张凯（1912—199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钱、张：城市医疗队下去可一直带，共带三四个月。

毛：这还可以，带三四个月，学会治十几种病。

(当汇报到搞一些半农半读训练班时)

钱、张：我们还在农村搞了一些半农半读训练班。

毛：半农半读怎么搞的？

钱、张：采取农忙不学，农闲多学的方式。

毛：多长时间？

钱、张：二年，三年。

毛：二年就是读一年书，三年就是读一年半书，这个办法好。

(当汇报到根据中央、主席指示作了检查时)

毛：现在有多少卫生技术人员？

钱、张：共有一百四十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其中公社和医生联合集体办的六十万，拿国家工资的八十多万人。

毛：这个队伍不小！

钱、张：主席批评我们只为城市人口服务，很对，现在高级医务人员百分之八十在城市，其中百分之七十在大城市，百分之二十在县城，只有百分之十在农村。经费，包括县在内农村占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用在城市。

毛：你们用了这么多人力，这么多钱，为那么少的人服务。

钱、张：主席指示后我们才清醒了。

毛：你们研究过神医没有？

钱、张：我们没有研究过。

毛：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的安慰，病也就好了。

钱、张：许多病不治也可以好。

毛：比骗人的医生要好。

钱、张：通过四清和医疗队下乡，了解到农村卫生队伍很复杂。

毛：怎么复杂？

钱、张：有许多人过去不是医生，看些医书就加入医务人员队伍里来了。

毛：看些什么书？

钱、张：看些中医书，看些药方。农村医务队伍中，政治情况复杂、技术水平低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毛：坏人不多吧！？

钱、张：真正坏人占百分之五左右，但政治技术水平低的较多，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个队伍如果没有新生的力量，取消他们还不容易。

钱、张：现在正在召开医学教育会议，讨论主席、总理指示，要办三年制卫生学校，为农村培养医生。

毛：高等教育要学五年，读那么长时间书，值得研究。

钱、张：现在想两条腿走路，办三年制，多在农村办，在农村招生。

毛：招什么生？

钱、张：大部分招高中生。

毛：初中还不行吗？

钱、张：目前农村高中生还不少。

毛：招中学生还不行吗？你们不在城市招了吗？

钱、张：城市也招一些，主要在农村招。我们体会，主席认为读五年书时间太长，至于招生不一定强调高中生。

钱、张：医生的政治思想重要，只有技术没有政治不行。

毛：这一点很重要。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招些政治好的中学生就可以了。

（钱忠信、张凯又汇报了城市问题）

毛：你们对城市是不是服务得好？

钱、张：也没有服务好，要求愈来愈高。

毛：怎么愈来愈高？

钱、张：以北京来讲，五十多万干部公费医疗，八十多万人劳保，还有家属。

毛：工人不是“老爷”，工人还是要为他们服务的。

钱、张：工厂医务工作没有搞好，工人也都到医院去看病。

毛：你们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

钱、张：非正式医生开不了假条，要请假还要到医院去，经医生开证明才行。

毛：这涉及劳保问题，要好好考虑。

钱、张：城市医院压力大，公费医疗包下来，一个钱不出，到处看病。

毛：看了病，拿了药，还不吃。

钱、张：刘主席、总理指示城市要组织医务人员下农村的问题，每年下去三分之一。

毛：怎么下去？多久？

钱、张：轮流下去。下去后城市医疗卫生工作仍较重。我们打算高等医学院校学生三年后就一边工作一边上课。护士也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毛：光会念书是不行的。

毛：你们对打仗考虑了没有？

答：中央指示后考虑了。

毛：怎么考虑的？

钱、张：组织了几十个医疗队，随时准备赴前线服务。现在的医院对战争没有训练。组织医疗队训练，有的地方已开始了。

毛：打仗了还能都到北京医院看病？要考虑到打仗。你们分科那么细，打起仗来怎么办？打起仗来还不是什么都要看，只会内科不会外科怎么行！

钱、张：过去部队青年人多，疑难病可能不多，有的也许不认识，但医学科学是发展的，要有一小部分力量搞尖端。

毛：搞科研的人看不看病？

钱、张：一部分人看病，一部分人不看病。

毛：什么人不看病？

钱、张：搞基础学科的，如搞生理、药理、生化的，研究理论不看病。

毛：理论还是要结合实际啊！

钱、张：定一同志说百分之五搞尖端就可以了，现在共有科研队伍一万人，其中技术队伍五千人。

毛：科学尖端还是要搞的。

（当谈到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时）

毛：这话很对，党委是集体领导，什么都要管。卫生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要抓，党委也要研究卫生工作。

（钱忠信、张凯又请示农村卫生员工分问题。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补贴工分不超过百分之二。卫生员的补贴工分社员同意给，但

六十条没有规定。)

毛：给群众办好事，没有问题，农民会同意的。现在干部参加了劳动，百分之二已用不了，有的地方只用百分之一，工分不成问题，农民会同意的。

(钱忠信、张凯又请示主席，建议中央今年召开一次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中央召开，可以找省、市领导同志参加)

毛：可以。

(当谈到药品问题时)

毛：药品应当降价。

毛：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最后，钱忠信、张凯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没有什么了，就按你们讲的办吧。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

(1965年8月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马尔罗（以下简称马）：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毛：喔，你到了延安。

马：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旁边，感到很激动。

毛：你说得太好了。

马：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艰苦的环境，人们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蒋介石住宅的照片，对比了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毛：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强者的。

马：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领导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们比。

毛：我听说你打过游击。

马：我是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领导农民军队反对德国。

毛：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当时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不是强的，而是弱的。

马：这很有意思，农民都没有打过仗，不知如何打，但他们能当很好的战士。拿破仑手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果不打贏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败仗，多打一点胜仗。

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农民习惯于打败仗，打胜仗的不多。

毛：我们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甚至整个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跑到北方来。

马：尽管如此，但人民对红军的怀念仍然存在。

毛：以后在北方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发展了军队，发展了党，发展了群众组织，北方人民得了土地。我们解放了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城市，队伍逐渐扩大到几百万，由北方向南方打。要讲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人。我们在一个时期甚至跟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

马：为什么蒋介石要进攻你们呢？

毛：他想把我们吞掉，他认为他可以。

马：他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弱？

毛：我们有许多根据地，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军队有一百万左右。蒋介石却不同，他有四百多万军队，有美国的援助，我们的根据地很大，但根据地是分散的，也没有外部的援助。

马：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即蒋介石只相信城市的力量？

毛：他有城市，有外国援助，同时他在农村的人口比我们多。

马：我曾去过俄国，曾同高尔基谈过这个问题，同他谈了毛泽东，那时您还不是主席，高尔基说，中国共产党最大困难是没有大城市。当时我问他，没有大城市是会失败还是成功？

毛：高尔基回答了你没有？（马尔罗摇头）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不能答复你。

马：高尔基常说各地农民都一样，但我认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中国变成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变为中国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

毛：需要时间。

马：我们希望你们有你们需要的充裕时间。

毛：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各种朋友，你们就是朋友的一种，同时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我们同艾地有共同点，同你们也有共同点。

马：这些共同点是不一样的。

毛：有一点是一样的，例如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对于英国的

两面派，你们比英国明朗。

马：实际上反对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只有法国。

陈毅（以下简称陈）：英国人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而你们反对。

马：英国有马来西亚问题。

毛：英美俩要交换。

马：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结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场。每天援助阿尔及利亚几亿法郎，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们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法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真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毛：当然啰，一个是你们的盟国，一个是我们盟国，你们的盟国是美国，对你们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盟国是苏联，对我们也不怀好意。

马：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们的。我认为现在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内容很不同了。

毛：他还进一步说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是的。

马：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你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真相信马克思主义？

马：法国社会党党员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职员，在这方面他们是强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职员们组成的。另外，还有些党员是南方的葡萄种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说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绝对数少，占人口比例也及中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真正无产者中间寻找力量。

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又偏向于苏联。

毛：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马：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党内冲突很严重，法共就像最赖的人一样，两面都想应付，你们可能已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了。

陈：他们并没有应付我们。

毛：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

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为什么有作家？

毛：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的。

佩耶（以下简称佩）：我有一种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毛：你来了多久了？

佩：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许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华中、华南，荣幸地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没有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毛：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没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体，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佩：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毛：一定有矛盾。

马：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毛：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举行党代表大会就要确定一个目标。是不是农业问题？因为我感到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是走上健全道路了。

毛：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

马：我在西安参观了纺织厂。在法国，纺织厂同革命有很大关系，一七八九、一八三〇、一八四〇、一八五一年都是这样，特别是在里昂，因为纺织工人是最穷困的。我在西安看到该地的纺织业已达到解放前上海的水平，大部分机器是中国造的，机器多，工人少。显然中国共产党能在纺织工业执行它要执行的政策。但相反在农业方面，可耕地很少，使中国政府处境困难，现在农业方面是否考虑发动一次超过人民公社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毛：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麼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改变。

马：你考虑可以增加些耕地面积吗？

毛：可以增加一些，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今天就不多谈了，请回去问候你们的总统。

马：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同周总理、陈副总理谈过了，不再向主席重复了。今天谈的是戴高乐总统阁下最关心的基本问题。感谢今天的接见，并转达戴高乐总统阁下的问候。（出门时）

毛：我接见过法国议员。

马：我最不相信议员的话。

毛：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你这样明朗。

马：可能是因为我更负有责任的缘故吧。

给康生的信

(1965年8月5日)

康生同志：

章士钊^[1]先生所著《柳文指要》^[2]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3]抑韩^[4]，翻二王、八司马^[5]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6]而颂阳湖^[7]，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柳文指要》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 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4] 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5] 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6] 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其后，刘大櫆、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7] 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打仗主要靠自己创造经验^[1]

(1965年8月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读过十三年书，读了六年孔夫子，是封建主义的，后来七年是资本主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学到。那时候，马克思、列宁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也教过三年书，是小学，当过小学校长，所以我也有点经验。我是小学教师出身的。

我是信过上帝的。我信的是中国的上帝，不是外国的上帝，是信多神教的。中国到处有神，房子有神，门有神，山上的石头也有神，水也有神，叫龙王。神的组织总是按照人的组织来建立的。人有皇帝，天上也有皇帝；人有文官，天上也有文官；人有武官，是打仗的，天上就有天兵天将，都是按照人的模型做成的。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也看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率领的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〇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现在你们开始到农村去。我认识农村，也经过十年的时间。

艾地（以下简称艾）：是不是可以请毛泽东同志讲讲农村工作是怎样做的？

毛：我的经历和你差不多。我读了十三年书，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可是对马克思、列宁都不知道，因为当时还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马克思、列宁，才读了一些小册子。我也读过考茨基的书，当时考茨基还是革命者。

形势逼我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一九二〇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是湖南省的负责人。一九二一年我们党成立，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十二个人。在这十二个人中间，有一批人牺牲了，有一批人叛变了，现在剩下两个，就是我和董必武^[1]同志。那时候所谓革命是糊里糊涂的，只晓得要革命，但如何搞法不懂，对中国、世界的情况不清楚，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清楚，糊里糊涂。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很。

党成立后，闹了几年，后来又搞了国共合作，我们帮助国民党打天下，进行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杀人了。那时候我们的农民协会有一千多万会员，工会有一百多万会员，还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陈独秀^[2]领导下，我们（包括我自己）没有精神准备。当然，我们有一点准备，但没有充分的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准备。在几个月之内，所有的工会、农会和纠察队都被一扫而光。我这个人不能逞英雄，没有资格，因为我没有准备去打仗，就是蒋介石请我去打仗。他们杀人，我们也杀人。

蒋介石、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好教员，他们的教学方法是杀人。当时我们研究了一下，为什么他们能够杀我们呢？无非是他们有两只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他们手里有枪。我们共产党人也有两只手，所缺乏的就是枪支。怎么办？能不能夺取敌人的枪呢？那就这么办，夺取敌人的枪来打敌人。我们不能只靠外国，迷信“国际路线”是不行的。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同志领导，当时我们有两个半军，实际上不到两个半。

艾：一个军有多少人？

周恩来：一万多人。

毛：不到两万，一万五千人左右。起义以后，他们不把部队拉到靠山的地方，而是带到海边，等待苏联的援助，江西也不要了。敌人一袭击，被消灭了大部分，只剩下八百人。这一段历史，你们也要晓得。不要靠上帝，不要靠外国，要靠自己。

十年内战，我们三十万军队只剩下两万五千人，犯过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而第三次是最严重的。什么邓小平^[1]、刘少奇、毛泽东，都不算数，一点权力都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是“宗派主义者”，是“反党集团”。在十年内，我这个人一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赶出红军。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

[1] 邓小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杀掉。他们要夺取大城市，想很快取得胜利，结果是把南方所有根据地都丢了，白区的地下党也是差不多统统被消灭。后来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全世界都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伟大，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又不相信。那是因为犯错误，不得不跑，跑的结果，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这时我们就得到教训。长征走了一年，剩下的人不多了，但这些人是很宝贵的。

有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著作，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才有可能在日本投降那年的上半年开个团结的代表大会，并使所有犯错误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重新当选。

艾：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安排工作和学习时间的？

毛：我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人睡觉，我也睡觉。昨晚我因为要见你们，考虑要谈什么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睡觉。

我身体很好，你信不信？如果我睡得多了，像那天睡了九小时，那就倒霉得很，身体就不舒服。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邓小平同志是总书记，周恩来同志是总理，他们工作得比我好。我有一点“官僚主义”，那是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反而是不好的。

艾：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有什么好处？

毛：这是习惯。打仗时，晚上来很多电报，电报答复完了才能

睡觉。别人说我同美国人不一致，我是不同意的。他们起床，我也起床，他们睡觉，我也睡觉。这一点美国人还不知道就是了。

对美国不能妥协，他要打，我们就打，我们已有了准备。一旦战争发生，一个原子弹就可以把这个大会堂毁掉，这样我们就解放了，可以回到过去的生活，但不能请客了。

我们这些同志大多数也是军人。打仗并不是很困难，一打就会。敌人就是我们的教员。

艾：我们的同志由于处理工会问题和其他问题，所以往往把开会讨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的时间挤掉了。一旦发生战争，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毛：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下狠心把它丢掉，认真打仗。过去中国有个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林彪^[1]同志、罗瑞卿^[2]同志、徐向前^[3]同志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在我们党内，读过军事学院的人很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没有进过军官学校的。不要迷信军事科学。只要去打仗，一点也不难学会。

艾：毛泽东同志在参加打仗之前，是否看过有关军事的书？

毛：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了，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包括恩格斯写的书，也包括我自己写的书。主要是靠自己创造经验。蒋介石的军官多数进过学校，我们的军人百分之九十五没有进过学校。当然，没有百分之五

[1] 林彪，1925年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2] 罗瑞卿，1926年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该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校。

[3] 徐向前，1924年4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的知识分子也不行。但不一定要先学军事，然后再去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艾：虽然如此，我们还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

毛：到了打仗时，要把它撇在一边，要自己创造经验。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 总检察长时的谈话^[1]

(1965年8月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是从几内亚来的？

贡代·塞杜（几内亚教育部部长，以下简称塞杜）：是的。我们之中有些人来了十天。我们是几内亚政府和党派出的两个代表团，来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接触。我们来了以后，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想尽一切办法孤立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孤立不了的。我们把中国的胜利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胜利，我们要加强同中国友好的甚至兄弟般的关系。

毛：我们都是友好的国家，有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怕了。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两国是走在一个方向的。你们都是头一次到中国吗？

法迪亚拉（几内亚总检察长，以下简称法）：我已经来过一次，享受过中国好客的接待。

毛：你来过一次了！

法：我是在一九六〇年来的，当时我参加了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访问过中国，当时受到了主席的接

[1] 这是毛泽东接见以教育部部长贡代·塞杜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的谈话。

见，我还保存着接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很好的纪念。

毛：你是跟总统一起来的吗？

法：我是在总统进行国事访问离开中国几天后参加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随后我又和韩幽桐同志和她的爱人一起参加了索非亚国际法律工作者会议。一九六〇年访问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又获得了大跃进。

毛：没有大跃进，小小的进步。

法：还是大跃进。

毛：（分别问贡代·塞杜和法迪亚拉）你先到，还是你先到的呢？

法：贡代·塞杜部长先到。上一次，我访问中国，呆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索非亚。这一次，我计划在中国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外地参观，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毛：到处走走好。

法：谢谢，我已经跟我的朋友们说过，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主席的邀请。

毛：邀请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来看，我们都邀请。不过你们要注意，中国的经验不都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

法：主席很谦虚。

毛：不是谦虚，这是实际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一块地方，哪一个国家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没有哪一个人不犯点错误，也许只有上帝不犯错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法院、检察工作也是一样，

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毛泽东问韩幽桐：现在搞了没有？韩回答：正在搞。）大概还要十五年。

法：在我看来，规定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有了精神，办法就有了。规定不过是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明确下来，规定是次要的。

毛：你这个讲得对。现在正在做些工作，譬如改造反革命分子，改造刑事犯，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不只十五年，过去根据地也有些经验。

法：在这一方面，一九六〇年我和中国检察长、政法学会会长谈过这个问题，中国重视战犯的改造问题。我们几内亚也有同样的情况。把战犯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需要动员人民，把司法机关和人民结合起来，我们两国的问题是相同的，当然其结果是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我们现在还在试验阶段。你们无论在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你们把最后一个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使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工作。主席先生，你信任人民，认为改造人是可能的，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两国的社会条件有所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毛：（面向贡代·塞杜）你是搞教育的。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的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

塞杜：非常正确。

毛：要相信这一点，如果有些人不相信，可以试点。（毛泽东对

韩幽桐说：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要把犯罪的人当做人，对他们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譬如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不能以生产为第一，就要以政治改造为第一。要做人的工作，要在政治上启发人的觉悟，发挥他的积极性，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会办得更好。不仅犯人自己能够自给，而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现在我们的劳改工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干部不太强，有些地方的方针不对。

法：我看他们还是很强的。这个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充满着希望。因为改变一个机构比较容易，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比较困难。

毛：这个问题不决定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

法：这点同意。在我们那里有同样的问题，做一件事首先要教育干部才能收到效果。

毛：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塞杜：这很正确。

毛：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塞杜：这是正确的，我们很同意。

毛：整个来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大使是哪一年来的？

卡马拉·马马迪（以下简称卡马拉）：一九六三年来的，来了两

年半了。我刚来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陪一个代表团去上海，在上海受到了主席的接见。

毛：（微笑）你这次穿的是白衣服，我不认得你了！

卡马拉：是的。上次在上海我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

毛：是不是谈到这里。我也没有什么道理跟你们讲。你们回去后，请向你们的领导人杜尔总统问候。

关于找韩昌黎^[1]全集的便条

(1965年8月10日)

韩昌黎全集找来一阅。

毛泽东
八月十日

[1] 韩昌黎，即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后人编有《昌黎先生集》。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 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5年8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朝鮮人民，致以最熱烈的、兄弟般的祝賀。

二十年前，英雄的朝鮮人民，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終於摧毀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獲得了民族解放。二十年來，朝鮮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繼承光榮的革命傳統，在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保卫祖國獨立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高舉千里馬運動的旗幟，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人民對於兄弟的朝鮮人民所取得的每一個成就感到無比的高興。

中朝兩國人民的伟大團結和戰鬥友誼，是在長期革命的共同鬥爭中用鮮血凝成的。這種團結和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

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久经考验、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斗争，携手前进。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

给李先念^[1]的信

(1965年8月15日)

先念同志：

“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2]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1] 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65年8月2日在给毛泽东等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纠正当时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意见。他提出，“初步打算今后几年内把粮食征购任务稳定下来”，粮食征购“畸轻畸重的，要进行调整，做到公平合理”，并说：“要达到公平合理的要求，还须要下一番苦功夫”。

对击沉国民党军“剑门”“章江”两舰 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65年8月15日)

已阅^[2]。退林彪^[3]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南海舰队政治委员方正平1965年8月9日关于击沉国民党军“剑门”“章江”两舰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

[2] 李作鹏、吴瑞林、方正平的报告说：这次战斗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军委、总参和广州军区首长正确的指挥，决心果断，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援、民兵的密切配合。参战部队充分发挥了人的因素，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思想。这次战斗的胜利也证明了小艇不仅能够打大舰，而且也能够击沉敌舰。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这次战斗的有功单位、有功人员代表。毛泽东说：“你们打得
好。”“蚂蚁啃骨头，我们向来就是用这种方法消灭敌人的。”

[3]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批语^[1]

(1965年8月17日)

少奇^[2]同志阅后，退还罗瑞卿^[3]同志。

请军委讨论一下：（一）此件可否发到全军参考；（二）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像郭化若^[4]那样的病人，也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大有好处，他给了我一个报告，总结了十条经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1965年7月22日关于学员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罗瑞卿并报总政治部、国防科委、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上。报告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学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指示，我院组织应届毕业学员和干部1072人，于去年11月下旬至今年6月底，参加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阿城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大家坚持“三同”“四清”，认真完成各项任务，经受了实际锻炼和考验，绝大多数同志表现很好，无论在自我思想改造还是在开展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运动，学员们不仅增强了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阶级感情上有了鲜明的变化，而且在思想方法、政策水平、群众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上也都得到了提高。

[2] 少奇，即刘少奇。

[3]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4] 郭化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验^[1]，现送给你们一阅。我看也可以转发一下，以供老同志们参考。这位同志的思想，几十年来同我总是有些格格不入。现在我看他是通了），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以上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决定。

请用电话告林彪^[2]同志。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

[1] 指郭化若1965年7月31日关于在浙江省萧山县靖江公社黎明大队参加5个月社教运动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的10点体会，主要内容是：①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主席号召下乡就下乡，改正过去不大听话的错误。②看看十五年来农村新面貌，向接近实际迈出第一步。③接近贫下中农群众，复热了阶级感情，稍减些脱离群众的危险。④走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前线，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有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同贫下中农一起在农田里愉快地劳动，亲切地交谈，群众把我们看成自己人了。从中真正理解到劳动不但是愉快的，也是生活所必需。⑥可以学到生产斗争的经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处处向贫下中农请教，可以学到许多生产知识。⑦得到一次实习机会，参加人民公社五年建设规划的草拟工作，这里面有许多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不到的问题。⑧可实地向地方同志学习，这次学到地方工作同志许多优良作风，也初步了解一点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况。⑨对干部好作交代，取得了发言权，不是“空口讲白话”。由各单位调来编写战役学的同志听到我下乡蹲点都很关心，说：“他能下乡蹲点，我们更应该去。”蹲了点回去，对部队社会主义教育也将有帮助。⑩好向子女交代，以身作则，对他们也有了发言权。学了一点阶级斗争，好在家庭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补学校教育不足之处。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八六海战有功部队的代表。



《光荣归于毛泽东》(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 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965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
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羅馬尼亞人民、羅馬尼亞共產黨
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致以熱烈的祝賀。

羅馬尼亞人民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和羅馬尼亞政府的領導下，堅
持獨立自主的方針，以高漲的熱情，團結一致，辛勤勞動，在工
業、農業、科學和文化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最近，羅馬尼亞
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進一步繁榮羅馬尼亞的五年計劃和十
年電氣化計劃，展示了羅馬尼亞發展的輝煌前景。我們深信，羅
馬尼亞人民在實現新的宏偉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中，必將取得更大的
成就，從勝利走向勝利。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羅馬尼亞人民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
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持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保衛世界和平的
事業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羅馬尼亞共產黨和羅馬尼亞政府為維

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捍卫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国的关系，是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是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平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深信，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对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的批语

(1965年8月24日)

少奇同志：

此件^⑩有些新鲜办法，可以纠正过去一些缺点（如一个大省的各级社教办公室，竟有一万工作人员），大概各地也有类似情况。请你考虑，是否可以通知一下。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8月2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九九号登载的《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材料说，湖南省第二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要开始了。这一期铺开的面大，工作队员相对地減少了，包括企事业单位的工作队和各级社教办公室在内，平均每个大队只有8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烦琐哲学，使工作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省委农村社教办公室经与各地同志研究后，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取消一切不必要的报表。二、不要抽工作队的人员参加各部门的会议。三、尽量压缩社教简报。四、简化报批、立案手续。五、大力減少社教办公室的人员和事务。今后支援社教地区的粮食、棉布、化肥、农药、款物等一律由各级政府部门办理，日常经济工作应由省、地、县、区、社原有机构去领导。中共中央1965年8月25日以中发〔65〕526号文件将这份材料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重点县社教工作团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军委总政，要求他们参照湖南的办法，纠正各级社教领导机构所存在的一些缺点。



1965年8月26日，毛泽东和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交谈。



1965年8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在北京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和其他日本朋友。



1965年8月26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参加联欢的其他日本朋友。

为钟学坤^[1]题词

(1965年8月30日)

学习白求恩^[2],

学习雷锋^[3],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

[1] 钟学坤，原是庐山疗养院护士，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过保健工作。毛泽东的题词写在她的日记本上。

[2]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医生。1938年来中国帮助抗日战争，1939年11月因给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

[3]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1962年8月不幸因公牺牲。

得道多成器，
德才兼备，
为人师表。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毛泽东给钟学坤的题词。

在中组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 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1]上 加写的话^[2]

(1965年8月)

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

[1] 中共中央组织部1965年8月21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这个报告中说，最近，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南方好多地委和县委书记都还是南下的北方老干部，新生力量提拔得很慢，已经十五六年了，还提拔不起来，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把这些南下的北方老干部分期分批地调整一些到其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或者调一部分回北方。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在最近召开的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上，我们讨论了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各级党委要认真讨论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正确领会主席的指示精神，大力培养、大胆提拔本地干部中的新生力量。要制订培养提拔的具体计划，并且要一个一个地落实到人。（二）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要同“四清”运动，同调整领导班子结合起来。提拔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地、县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县长。首先解决县一级的问题，争取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地专一级时间可放长一些。（三）在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时候，对北方籍的领导干部要作适当调整。（四）对南下的北

在中组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上加写的话

方籍干部中一些年老体弱、长期患病、丧失或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需要予以妥善安排。他们多数应当就地安排，少数必须回北方的，可以回北方妥善安排。（五）各有关地区党委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不要搞突击，不要呼呼拉拉一下换，影响工作，影响团结。

[2] 这段话写在中组部报告中以下一句话之后：“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

为《西藏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8月)

西藏日报



毛泽东为《西藏日报》题写的报头。

[1] 《西藏日报》的前身是中共西藏工委的《新闻简讯》。《西藏日报》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于1956年4月22日创刊。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一张日报。《西藏日报》为汉文版和藏文版两张大报。汉文版报头由毛泽东同志题写，藏文版报头由阿沛·阿旺晋美题写。毛泽东题写的“西藏日报”四个大字刊登在1965年8月31日《西藏日报》第2911期的头版头条。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5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劳动
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年前，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
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越南历
史上没有过的人民自己的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以后，越
南人民高举革命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并在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从兄弟的越南人民的胜利斗争中获
得巨大鼓舞，并为他们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目前，越南人民正在抗击着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
国主义的侵略，英勇地进行着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不
仅是为了保卫越南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

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民坚强地屹立在反美斗争的最前线，狠狠地打击、削弱和牵制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从而也就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保卫和平的革命斗争。

现在，在越南战场上，英勇善战的越南人民越战越强；美帝国主义不断遭到失败。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已经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进一步戳穿。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衷心赞扬和钦佩。全世界人民都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坚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能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越南人民的斗争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决心同越南人民一道，为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并肩斗争到底。

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争取祖国统一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对胡乔木^[1]二十七首诗词稿的批语^[2]

(1965年9月5日、15日)

—

康生^[3]同志转乔木同志：

这些词^[4]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胡乔木送阅的二十七首词稿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在胡乔木9月10日为送阅诗词二十六首给康生的信上写的批语。信中说，词二十七首本多仓卒之作。经主席修改后，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并拟删去其中的《定风波·读报》四首（平淡而又过时，改不好）和《生查子·家书》六首中的后两首（有些酸气）。另外，最近写了律诗五首，想补在后面，虽也有些晦涩，但在时间上较新鲜些，不知可用否？请一并阅正，并代转主席为荷。三是毛泽东1965年9月5日在《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两首词左侧写的批语。四是毛泽东1965年9月15日在《小重山·赠海岛战士》一词下方写的批语。五是毛泽东同日在《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左侧写的批语。六是毛泽东同日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右侧写的批语。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指胡乔木写的二十七首词。

略为改了几个字^[1]，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2]，请康生商伯达、冷西^[3]办理。

毛泽东
九月五日

[1] 毛泽东这次所作的修改有：将《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一词其二中的“南针仰”“兔死狐藏”“万国舞霓裳”分别改为“方针讲”“兔死狐伤”“万国换新装”；将《梅花引·夺印》中的“不竖红旗定是不回还？”改为“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一中的“为保金瓯风景美，鞋踏破”改为“为保金瓯颠不破，鞋踏烂”；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二中的“练兵塞上美风光”“猎猎军旗意气共飞扬”“多少英姿年少尽戎行”改为“练兵塞上好风光”“猎猎军旗天际看飞扬”“多少英姿年少事戎行”；将《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其四中的“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时代洪流腾巨浪”改为“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时代洪流翻巨浪”；将《采桑子·反“愁”》一词其二中的“怎见人间多壮观”改为“怎见人间是壮观”；将《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二中的“流水不长流，毒菌纷传种”“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改为“化为百炼钢，只有投群众”“流水片时停，毒菌争传种”；将《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三中的“不耐雨和风，纵美何堪数”改为“如此嫩和娇，纵美何足数”；将《七律四首·七一抒情》其二中的“滚滚长江万里长”改为“滚滚江流万里长”；将《七律四首·七一抒情》其三中的“勇士乘槎薄太空”改为“勇士乘风薄太空”。

[2] 作者后来将二十七首词中的六首删去，另外加上律诗五首，定名为《诗词二十六首》，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十一期和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

康生同志转乔木同志：

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1]，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2]。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一句须改^[3]。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上午三时

[1] 毛泽东这次所作的修改有：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二中的“胜天堂”改为“胜家乡”；将《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中的“休向健儿夸核弹，欣欣犹是比基尼”改为“休向英雄夸核弹，欣荣试看比基尼”。

[2] 指胡乔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二和其四中三处文字：对其二中“春玉碎”三字，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宜改。”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春汛怒”三字。对其二最后一句“沧海云天长浩荡”，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此句宜改。因承上句，不解所谓。”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一入沧溟喜浩茫”。对其四中的“装饰造”三字，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三字酌，又不明朗，宜改。”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兄弟难”三字。

[3] 毛泽东将《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一词其二中的“南针仰”改为“方针讲”，并在旁边写了批语：“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

三

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1]，中学生读不懂。

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2]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

四

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3]

[1] 指胡乔木词中以下两处：（一）《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二“斗争如海洋，早晚云霞涌。流水不长流，毒菌纷传种。青春只一回，转眼能抛送。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中后两句，毛泽东看后将它改为：“化为百炼钢，只有投群众。”并写了批语：“这几句好。但下二句较晦，故改之。”（二）《生查子·家书》一词其四中“刮骨去脓疮，剁脚争良玉。风险为人民”三句，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此三句宜改，方免晦涩。”作者将它改为“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毛泽东1965年9月15日再阅改后的这三句时，写了批语：“好。”

[2] 每，疑为“某”字。

[3] 胡乔木在《江城子·赠边防战士》和《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词中分别用了“胜天堂”和“万国舞霓裳”，毛泽东看后写了这个批语。

五

改得好。^[1]

六

好句^[2]。

[1] 作者将《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其一中的“堪恨利锁名缰，蝇营狗苟，也混英雄汉。天下尚多奴隶血，何日乐园同建？不锈螺钉，投身伟业，有限成无限”改为“君试共我高翔，人间尽看，何往非前线？四海尚多奴隶血，小我何堪迷恋？身是螺钉，心怀天下，有限成无限。”毛泽东看后写了这个批语。对这首词其四的“如君红透，羞杀营营辈。花落结为千粒子，一代红巾争继”几句，毛泽东看后写批语说：“好。”

[2] 指胡乔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中的“头颅不向寇仇低。自由合洒血成碧，胜利从来竿作旗”。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5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兄弟的朝鮮人民、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朝鮮歷史的新紀元。十七年來，英雄的朝鮮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在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今天，朝鮮人民一手拿鐮刀、錘子，一手拿武器，繼續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千里馬的豪邁步伐，為實現七年計劃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同時，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堅強地保衛着革命果實。朝鮮人民的鬥爭和勝利，對於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人民像對待自己的成就一樣，為朝鮮人民所取得的每一個勝利和成就感到歡欣鼓舞。

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军霸占南朝鲜、实现祖国统一和粉碎“韩日条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近，南朝鲜人民，再次掀起了反美爱国斗争的怒潮，有力地冲击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美帝国主义终有一天要被赶出南朝鲜，朝鲜三千里锦绣河山一定能够统一。

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日益发展。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团结和兄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团结和友谊必将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支援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965年9月8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特莱科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的時候，我們向你們，向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深厚的基础。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为加强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而继续努力。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出席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 谈话（摘录）

（1965年9月14日）

事情总是有麻烦，不能怕麻烦。革命也可以叫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搞经济建设也是麻烦。怕麻烦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烦什么事情也可以搞成。……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跟人民的大多数结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烦，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烦得很！这些人听话，那些人又不听话，就有这些麻烦。不能怕这些麻烦，无非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跟群众站在一道，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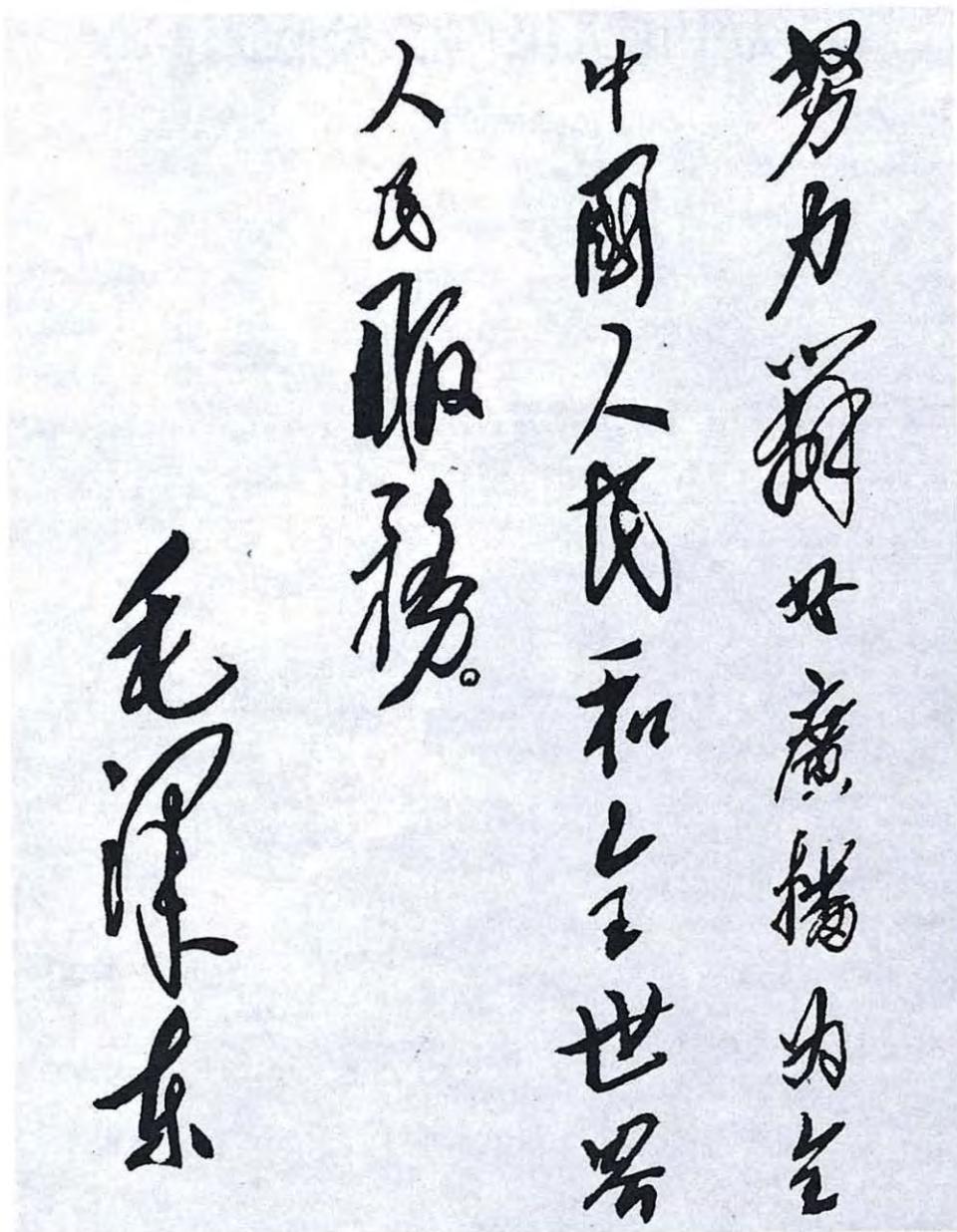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 二十周年题词

(1965年9月15日)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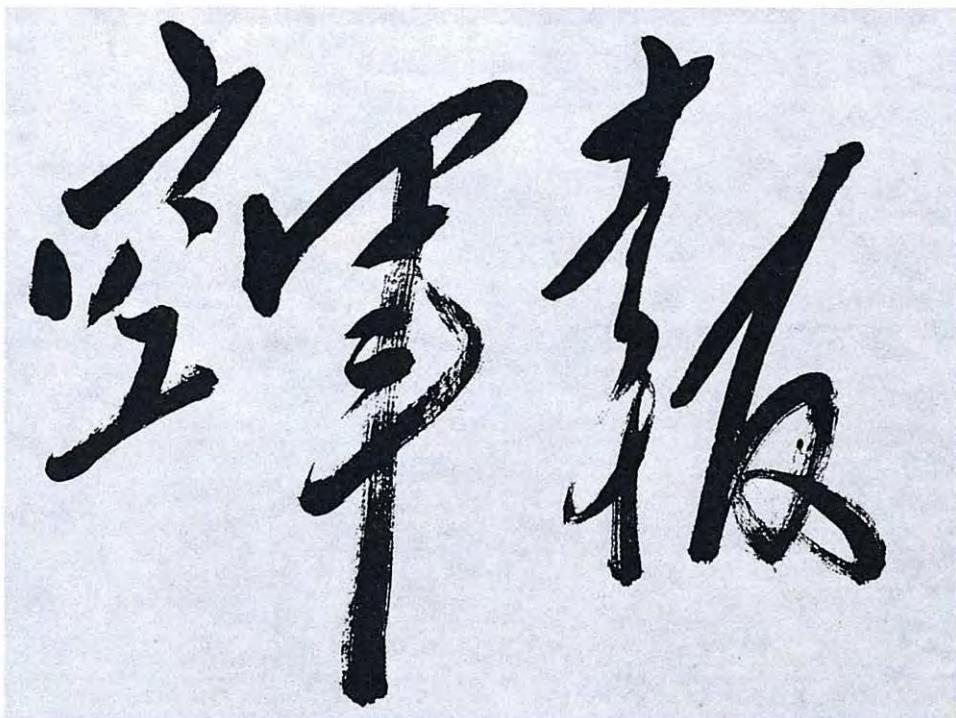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的题词。

为《空军报》题写报头

(1965年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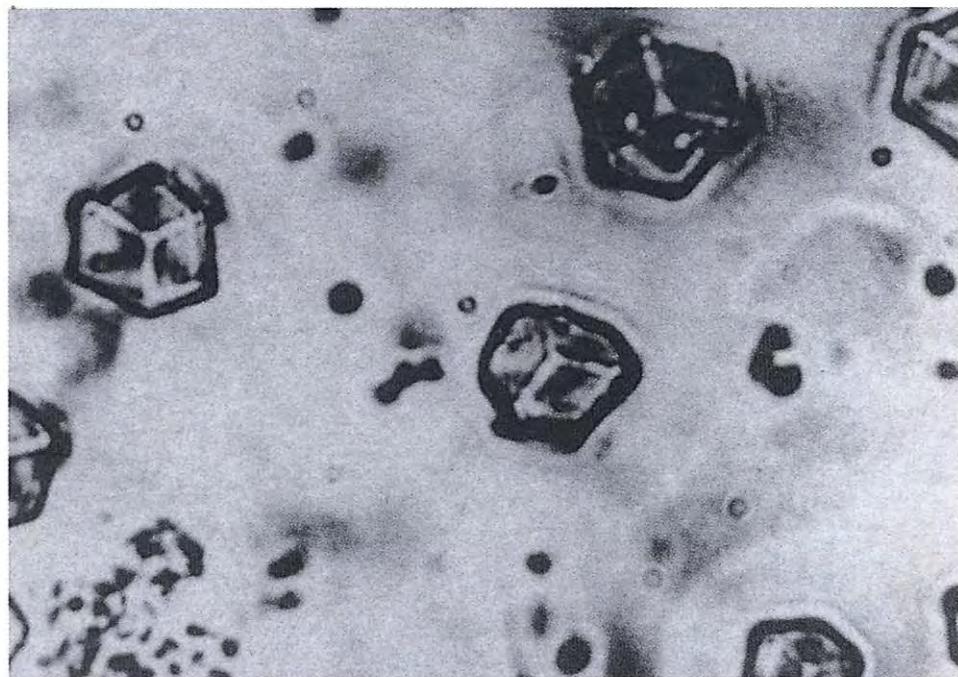
空军报



毛泽东为《空军报》题写的报头。



1965年9月17日，中国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



中国首次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 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5年9月18日)

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错误的，比如劳动改造工作，就还有缺点，主要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干部的政治水平不高，劳改农场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过去很多地方把它翻过来了，把搞业务放在第一，思想工作放在第二，甚至思想斗争很薄弱，如果把对反革命分子、刑事罪犯的思想改造得很适当，这样的话，业务（工业、农业）不要去催促，也是会搞得很好，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在外交部给印度政府的 复照稿^[1]上的批语

(1965年9月19日)

总理^[2]:

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实上印度方面办不到，也难得到各国和印度人民同情。改为限两天内拆（拆）掉如何？或者改为在三天内，即二十一日午夜^[3]。这样可能获取各国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请酌定。

毛泽东

十九日四时半

[1] 印度政府外交部1965年9月17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发来照会，说印度人员从未越过锡金边界到中国领土进行任何骚扰和袭击。“1962年9月，在中印边界的锡金一侧修建了一些防御工事。自从1962年11月停止敌对行动以来，这些工事并未加以占据。”“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并不反对对锡金——西藏边境上据说印度人员在西藏境内修筑了工事的那些地点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在边界的西藏一侧有任何工事，不会有人反对拆毁它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5年9月19日草拟了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复照稿报中央审批。复照说，

“关于印军在中国、锡金边境越界修筑工事的事实，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充分的证据，足以向全世界证明这一点，印度政府心里也是明白的。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政府来照也承认不排除在中锡边界的中国一侧可能有印方的工事，并且不反对对可能有的这种工事加以拆除。这就实际上表明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和边界线上。中锡边界是确定了的边界。中国边防部队对于印军在哪些地方越界建筑了工事是了如指掌的。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印度政府拆除这些侵略工事。为了给印度政府以这样做的机会，中国政府愿意把9月16日照会规定的期限延至9月22日午夜以前。”复照还强调指出，“中国政府最后重申：印度政府必须在1965年9月22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这个复照在1965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总理，指周恩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5年9月19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复照稿中原来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9月19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后按照毛泽东意见，将限期拆除的时间改为“二十二日午夜”。

对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杨献珍^[1]问题 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2]

(1965年9月24日)

彭真^[3]同志：

都看过了。此件^[4]尾页（16页）上，列举附件四份，去掉侯、孙两份，剩下两份，漏掉杨的“说明”一份，应添上。^[5]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

[1] 杨献珍，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委会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1965年6月9日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送上《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附件四份，还有杨献珍的书面说明一份。从1964年7月到10月，我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发动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一年来，我们同他开过多次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对他进行耐心帮助，希望他认识错误，自觉革命。但他的态度一直很坏，毫无悔改之意。由于他错误严重，至今仍不回头，我们认为他不适宜再继续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会委员职务。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将高级党校校委会的原报告以中发〔65〕592号文件

发至全党。197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作出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认为原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的报告是错误的，建议中央撤销中发〔65〕592号文件，对杨献珍错案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复查报告说，杨献珍在主持高级党校工作期间，虽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和办党校的方针，成绩是显著的。康生等人给他扣上的反动帽子及诬陷他的各种罪名和强加给中央高级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了这个复查报告。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指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1965年3月1日关于杨献珍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叙述了自1964年7月以来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揭发批判杨献珍的情况，列举了杨献珍的十条所谓“主要错误”。

[5] 报告尾页上列举的四个附件是：一、关于杨献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安插同乡亲属的调查材料；二、关于侯维煜同志问题的材料；三、关于孙定国问题的材料；四、杨献珍的书面检讨。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去掉了其中的二、三两个材料，即关于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侯维煜问题的材料和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问题的材料。将原来的附件四改为附件二，另外加上附件三“杨献珍的书面‘说明’”。

给邓颖超^[1]的信

(1965年9月25日)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2]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3]。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1]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

[2] 1965年夏，毛泽东会见外宾后，邓颖超作为陪同人，曾问毛泽东是否作有新的诗词，并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毛泽东以诙谐语言所写的“你压迫我写诗”，说的就是这件事。

[3] 指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1976年在《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时有所修改。

鄧大姐：你信中說要改我的詞，
我前夜未睡，寫了兩首詞。改了幾次，
還未改好，現在這上修改。如有不妥，請予
指教為盼！如再有修改，
毛澤東
水調歌頭
痛改為勝！如再有修改，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早已變新
顏。到處男紅女綠，更有飛流激電，高路入云端。過了黃
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拋出几泥
丸；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湖捉鼈，談笑凱歌還。世上無
難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嬌

一九六五年五月

鶻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民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吓倒蓬間雀。怎
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問你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琼閣。不見前年秋
月白，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添牛
肉。不須放屁，看看充彼鵠腹。

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見鄧大姐時，我作為陪見人，要向主席是否作
有新的詩詞？我說很久來讀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再讀到主席
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他的詞二首的批語中用“在追”二字。

這兩首詞如今斗升式發表，有几處誤字已換改。 鄧颖超謹一九七九年十月

毛泽东致邓颖超信的手稿。

念奴娇·鸟儿问答

(1965年秋)

鲲鹏^[1]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2]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3]。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1] 鲲鹏，这里指大鱼变成的大鸟，作褒义用。

[2] 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往）南冥也。”意思都是说大鹏在向南海飞的时候，凭着旋风的力量，翻动翅膀，飞上九万里高空。扶摇和羊角都是旋风的名称。

[3] 蓬间雀，即《庄子·逍遥游》中的“斥鷃”。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1]。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2]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3]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1] 琼阁，琼楼玉宇，仙人住处。

[2] 订了三家条约，指苏、美、英三国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3]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4年4月曾在一次演说中说“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九六五年五月(乙)

鲲鹏展翅，九万里，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民城郭。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为什么？”我问。(哎呀)
“借问你去何方，雀儿答道，
不覩前軒，订了三條約。遇有
的土豆烧熟了，再烧牛肉。不須恭辰，
请君光我荒腸。

毛泽东手书《念奴娇·鸟儿问答》。

对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 筹委会名单（草案）的批语^[1]

（1965年9月30日）

没有陈云^[2]，似应加入。

毛泽东
九月卅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5年9月23日关于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的有关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提议筹备会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召开，请刘少奇主席讲几句话，讲话稿已由彭真告钓鱼台准备。报告还附有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的名单（草案）。根据毛泽东的批语，陈云列入了筹委会名单。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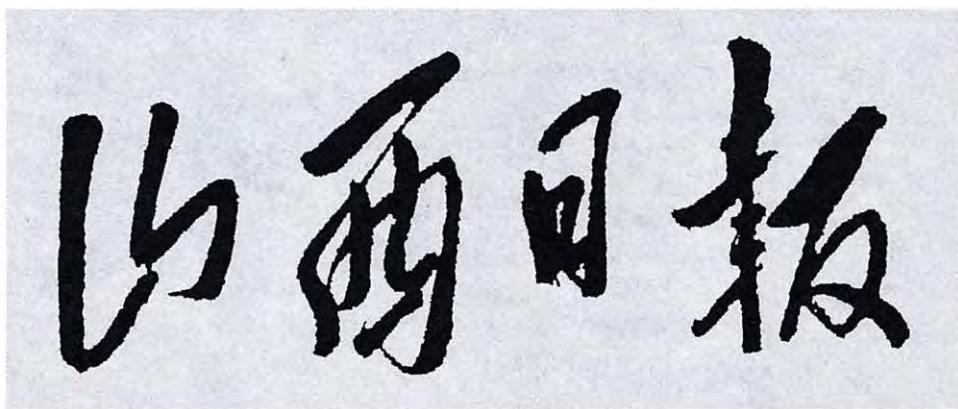
(1965年9月)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9月)

山西日报



毛泽东为《山西日报》题写的报头。

[1] 1965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为《山西日报》第二次题写报头。

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10月1日)

新疆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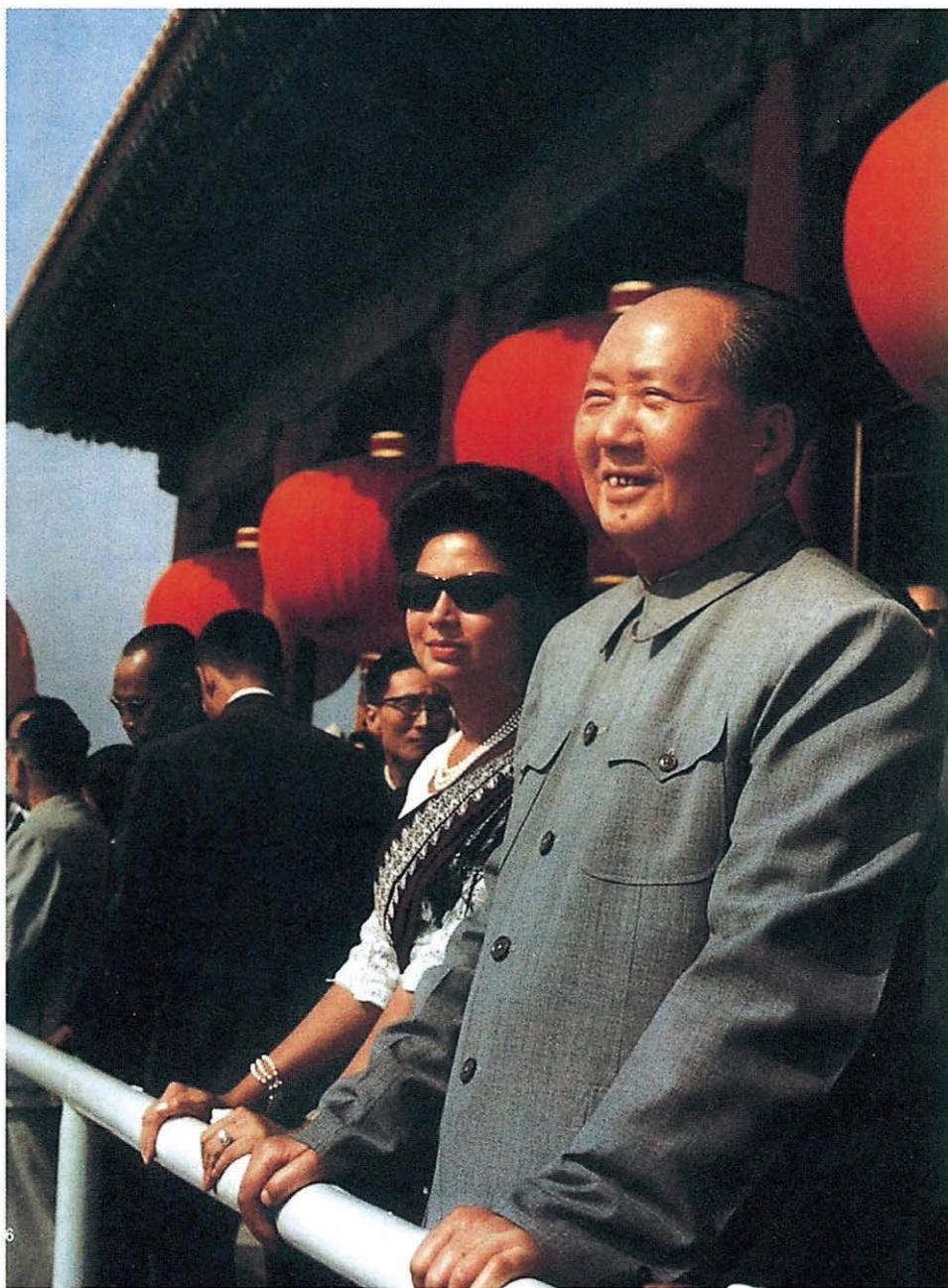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疆日报》题写的报头。

[1] 196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毛泽东为已成为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的《新疆日报》题写了报头。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莫尼克公主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及莫尼克公主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彭真、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人民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南海》（油画）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传画）

对外交部关于陈毅出访五国 概况汇报的批语^[1]

(1965年10月)

江青阅。

可以明了亚非各国当前形势。

[1] 这个批语写在1965年9月30日印发的外交部文件第九三〇号关于陈毅出访五国的概况汇报上。汇报说，陈毅副总理于1965年9月4日应邀访问马里，顺道访问了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四国，于9月18日返国。途中经过喀布尔时，还曾应邀与阿富汗首相作了会谈。所经各国，态度友好，礼遇很高。访问中，除同马里领导人着重研讨了马里经济形势外，主要是就当前国际形势，向这些国家领导人阐明了我们的立场和主张，并同对方交换了意见。现在报告以下几个问题：一、这些国家经济困难，政局不稳是普遍现象。二、他们同情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但对越南人民能否打败美国缺乏信心，均认为以和平解决为上策。三、对召开二次亚非会议一般都不积极，对会议的基调、开法、会址等也是态度各异。四、普遍认为中苏争论削弱了世界反帝力量，不分是非地要求中苏和解。五、在印巴冲突问题上，巴基斯坦要求我给予有力的军事支援，但又怕我支援“过于有力”。其他国家一般都同意克什米尔实行自治自决，但又主张印巴停火，和平解决。六、政治会谈的初步印象是，他们对我采取反帝、反修立场，以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支持并在经济上援助新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钦佩、重视，但又认为我过于革命，不讲究策略，怕引起中美大战，担心于

他们自身不利。七、对马里的经济困难问题，既提出了增产节约、开源节流等治标措施，也着重指出了政治问题是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八、关于今后工作的若干意见：（1）亚非会议以推延召开为好；（2）对亚非特别是非洲工作急需加强，如何在经济、外交、宣传三方面密切配合，灵活运用，尤为当务之急；（3）应大力开展争取非洲知识分子的工作；（4）对亚非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须给予经济援助，但似应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国家作为重点，着重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样板。



1965年10月6日，毛泽东和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亲切握手。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5年10月6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教授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关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并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西德已经变成欧洲新战争的策源地。西德军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千方百计地谋求核武装，妄图孤立和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维

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

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

(1965年10月10日)

你天天说打仗，他不来打怎么办？那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大小三线搞起来就好了。还是延安那一套，“靠山傍水扎大营”。不然，不就要斩马谡了吗？不过不是我们来斩。哪个来斩？还是美国人。

解决要等打起来，要敌人丢了原子弹才能解决问题。美国现在还没有丢原子弹，它一丢原子弹就能搞得更好。美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地方大，打起来总有些地方他到不了。无非是大三线、小三线要搞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总有些地方敌人不能到。抗战时，日本人去不了。内战时，蒋介石去不了。过去内战时期，还不是那么多军队，总有的地方到不了的。随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只有项英^[2]他不听我们的，陈毅^[3]跟他斗争。项英不赞成搞边区，要靠国民党，结果失败了。陈毅同志执行中央方针，到敌人后方去，搞边区，靠打游击，发展了几十万军队。那时我写了《抗日

[1] 这是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项英，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陈毅，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挺进苏北开辟根据地。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所以我提出游击战争是战略问题，改变了战争形式嘛。游击战争问题，洛川会议争论不休，提出山地游击战（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时有好多人想不通，华北军分会就反对，写了文件，吸收平型关战斗的经验，说要打运动游击战。那还不是老一套，集中起来歼灭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是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抗战时我们只有三万人，不能集中力量消灭日本人，只能占地方，发展力量。是分散开来，扩大占领地，搞根据地，还是集中起来打呢？是于我们国家有利，还是不利？有一种说法甚至说如果太原、石家庄失守，就要亡国。为什么这样？他们把过去多少年的阶级斗争都忘了，阶级力量对比看不见了。我在上海、太原失守后写了一篇文章，说要反对两个投降主义。不讲阶级斗争，敌我力量的对比就看不清楚，大的看不到，只看到小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搞大三线、小三线，我看比较主动。小三线小边区，大三线大边区。如果打起来，敌人总不能全部占领，不能占领所有乡村，中小城镇也不可能全部都占嘛。抗战时日本人到不了西安、重庆。最好日本人迟投降一年，可是他们不听我们的。现在敌人听不听话，也不一定，要放在两个可能上。一个可能按我们讲的早打、大打，一个可能它不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不是列宁那个时候了，列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个妥协条约，为的是保存力量。现在是我们要胜利，南越打了一年了，我们搞计划，不能放在不敢打上。余秋里^[1]报告提准备五年，我说要争取三年半或更多一点时间（今年下半年算在内）。为什么要三年半？主要看看美国总统选举时是什么腔调。不要那么怕美国，要作点宣传。

[1] 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范文同^[1]说美国人比法国人好打得多，美国人学会了一条，就是学会缴枪。有伪军时，美国人是先打死伪军然后再缴枪。不然，他们也怕面子不好过。现在有些人怕美国。打美国人还要作点宣传，不宣传怎么行？好像北方人到南方，说蚊子有多大，说蛇有多厉害。为什么有几亿人在南方生活着？其实，有些北方人到南方去了，安了家，立了业，讨南方的老婆，习惯了，现在不愿意回北方了。在座的就只有两个北方人^[2]。我一到南方，到你^[3]广州就感冒，在湖南半个月讲不出话来，嗓子哑，到井冈山开始好转，下了山就好了。去年，我在湖北，也是细菌钻进去了。细菌它才无孔不入呢。

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1] 范文同，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2] 指在座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3] 指在座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国庆观礼的工业和农业劳动模范、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各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的成员。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1]

(1965年10月20日)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

不久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这些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2]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

[1] 这是毛泽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2] 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但也难说，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我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对总政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1]、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的批语

（1965年10月28日）

退林彪同志。此件^[2]已阅，很好。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

[1] 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5年10月14日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主要内容是：（一）今年前9个月全军政治工作的概况。主要是执行林彪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着重抓了十件大事：1. 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印发选读本114万册，语录500万册。学习方法多样化（天天读，经常读，小整风，讲用会，上政治课，干部半日学、集训等）。2. 大抓战备政治工作。3.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 进行院校整风。5. 进行文艺队伍整风。6. 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运动和贯彻民兵工作“三落实”。7. 抓紧培养选拔革命接班人。8. 进行几项制度改革。9. 狠抓基层骨干轮训，进行四好初评。10. 整顿机关作风和克服连队忙乱。（二）对今冬明春全军政治工作的意见。总的要求，仍然是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几件主要工作是：1. 大学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从根本上加强战争准备。2. 抓好部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工作，搞好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 继续狠抓四好运动，搞好四好初评。4. 整顿机关。5. 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

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 简报上的批语^[1]

(1965年10月30日)

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

毛泽东

卅日上午五时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10月30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六五号上。简报说：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第二批开展城市“四清”运动的单位共有16100多个，职工6955000余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0%左右。二、参加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共计282000多人。新老队员的比例，有的地区老队员占40%至50%，有的地区只占20%左右。工作队员与参加运动职工人数的比例，据两个大区的统计，中南为1：20，东北为1：26。简报还附有部分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蹲点名单。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1965年10月）

我看了三篇文章，写得都很好。学哲学就要学这些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一辈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赋人权，哪里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经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经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的不懂历史，学文科的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

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四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5年11月6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你們，向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兄弟的蘇聯人民致以熱烈的祝賀。

四十八年前，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偉大的列寧和光榮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四十八年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蓬勃發展，取得了一個接着一個的勝利。歷史已經證明，並且將繼續證明，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各國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光輝道路勝利前進。

偉大的蘇聯人民從十月革命勝利的第一天起，就經受了種種嚴峻的考驗，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蘇聯人民战胜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叛亂，並且在一個不長

的历史时期内，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保卫了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中国人民一向为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人民衷心地祝愿苏联人民今后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道路，继续前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的。这种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兄弟的苏联人民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为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反对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对林彪^[1]所提五项原则的批语^[2]

(1965年11月20日)

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退林彪同志。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1965年11月16日给毛泽东的电话报告记录上。报告说，“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随电话报告记录还附送了载有林彪提出的五项原则的1965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军委11月25日作出决定：“把这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的方针，望全军遵照执行。”决定正式颁布时对林彪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这五项原则是：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 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1]

(1965年11月25日)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搞了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1] 这是毛泽东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一部分。

大会^[1]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2]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什么细菌武器的秘密，也是日本的教授揭露的。可能那些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

[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12人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 “三矢计划”是1965年2月10日由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在日本众议院揭露的一项秘密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是1963年日本“防卫厅”经过周密策划后秘密制订的。这个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三方军队共同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战。同时在日本国内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制定“战时立法”，以镇压爱国民主力量。

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好一点。我们跟蒋介石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965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二十一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断地把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阿尔巴尼亚人民即将胜利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并且正以更高的热情和信心准备迎接明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预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今后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

国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为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正在与日俱增。

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促进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坚强队伍，赢得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我们深信，这种革命的友谊和团结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祝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 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1]的批语

(1965年11月)

—

江青阅，退毛存。

—

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物资去。
并要大量地送。^[2]

[1] 指外交部办公厅1965年11月6日印发的文件《越南南方领导同志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有三件：一、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长山1965年8月31日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二、越南南方中央局副书记、中部地区书记武至公1965年3月和4月两次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三、武至公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全文（1965年6月整理）。这个谈话全文包括12个问题和2个附件：（一）南方革命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二）人民武装力量情况。最后是记者附注的情况，其中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战斗力和供应情况等。

[2] 这个批语是针对记者附注中所说的以下情况而写的：中部中区山区主力部队供应比较困难，山区地广人稀，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不富裕，很少副食品，不种蔬菜，战士们一般没有副食吃，白饭加盐巴（盐每月每人供应半公斤，从平原运盐进山全靠人力背，很困难），有时吃些野菜（因为人多，野生东西也很快吃光了），营养不足。战士们常年露营森林，雨多潮湿，日夜温差大，没有房屋、吊床、雨布过夜，蚊子特别多，许多战士没有蚊帐。由于营养不良，蚊虫猖獗，战士们发疟疾很多，预防和医治的药品又很少。按规定战士每年供应一套衣服，但有些部队不能保证。这样，使战士们的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1]

(1965年11月)

—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二十亿元不够，三十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存一点，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三七高射炮有没有？其他炮有没有？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其实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敌人登陆要找弱点。青岛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人就登过陆。越是认为他来不了的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登陆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他。先消灭他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山东、安徽、江苏视察时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等谈话的一部分。

一个营，再一个团，再一个师。

二

越南仗打得这么好，我们能不能打好？你们看美国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三个师，现在地方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都依靠中央是靠不上的。地方有一个师就好办了。

三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一个地方师拨给你们了吧？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美国人来不来，要做两手准备。美国人对我们有些怕。越南海岸线很短，美国也只敢占据几个沿海城市，不敢纵深发展，一怕补给线长，二怕被吃掉。中国海岸线有一万多公里，敌人占领了上海，敢不敢占领苏州？

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1]

(1965年11月)

毛泽东：你们有没有钢？

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

主席：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1] 1965年11月，毛泽东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报告时的指示。



1965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

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1]

(1965年11月)

就是这批人出现修正主义。

现在的教育要改革，一个孩子要学习十六七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

……要办抗大式的学校，……

……社教就是大学……

现在学生马、牛、羊、鸡、犬、豕都不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

初中学生一学期劳动一周太少了，小学也可以搞点轻微劳动，看起来还是搞半耕半读好。

课程负担重，为什么学那么多东西？我看要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没有受过锻炼时插话的一部分。

为《郑州晚报》题写报头^[1]

(1965年11月)

郑州晚报



毛泽东为《郑州晚报》题写的报头。

[1] 《郑州日报》是中共郑州市委的机关报。《郑州日报》创刊于1949年7月1日。1963年10月22日，即郑州解放28周年之时，《郑州日报》改名为《郑州晚报》。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报头。

批判罗瑞卿

(1965年12月2日)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给陈伯达^[1]的信

(1965年12月2日)

伯达同志：

乔木^[2]修改的那九篇文章^[3]，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似指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又称为九篇文章。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

(1965年12月2日)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反对折中主义^[1]

(1965年12月2日)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2]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中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中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1] 这是毛泽东对浙江省委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2] 腊肉骨头，我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有过年腌制腊肉的习俗，在腊月把猪肉腌制起来，吃完肉后就剩下骨头，后指“吃起来没肉，丢了可惜”，同“鸡肋”。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中主义的特点。

折中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中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

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中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中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中主义。

折中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中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中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

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中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中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中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中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

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中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中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1965年，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

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1]

(1965年12月2日、7日)

—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2]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3]同志一阅。

二

林彪同志：

将此信^[1]一同印发。

毛

十二月七日

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5年12月2日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写的批语。林彪在这个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林彪12月3日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

[2] 指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9月中下旬，五十五师奉命紧急备战，向中印边境出动，后因情况变化，转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战备和演习中看到，部队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有：一、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特别是今年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部队接受任务后，思想稳定，斗志旺盛，求战心切，纷纷要求打头阵，当尖兵，对阶级敌人表现了高度的阶级仇恨。二、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接受任务后，部队集结快，零散人员收拢快，思想发动、组织调整、物资发放快。三、对部队的活思想抓得

较深较细。抓住有代表性的问题，能较快地弄清事实，耐心说服，加以解决。四、狠抓政策纪律。基本上做到了“部队走到哪里，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把好影响留在哪里”。在备战和演习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一、部分干部坚信突出政治的根子还扎得不牢，在工作多、时间少的情况下，“转向”的苗头时有出现。二、平时战备思想不够落实，战备形势教育有片面性。三、平时对基层新干部的培养工作还抓得不紧，领导指挥能力低，办法少，在这次战备中表现得很突出。四、政治工作本身还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图形式，走过场，乱提口号，乱要统计数字。

[3] 少奇，即刘少奇。恩来，即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指林彪1965年12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12月2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对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1]

(1965年12月14日)

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1] 这是毛泽东1965年12月14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的一部分。这段话后来编入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毛主席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在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中发〔1972〕33号文件《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引用了这段话的第一句。

关于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语^[1]

(1965年12月18日)

送交小平、彭真^[2]同志照少奇^[3]同志意见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此件^[4]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

[1]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1965年12月15日为印发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一文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天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少奇，即刘少奇。

[4] 指当时报送毛泽东审阅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整理稿。中共中央1965年12月27日以中发〔65〕751号文件将这一讲话记录整理稿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1975年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经毛泽东同意，在胡乔木主持下，按照讲话原意对这篇讲话记录稿进一步作了整理，并报毛泽东审阅同意。《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记录整理稿，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lll}中。

[1] 中共中央1965年12月27日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批语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报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1965年12月21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这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

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

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

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

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上面要靠党的领导 下面要靠广大群众^[1]

(1965年12月21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和陈伯达、艾思奇等的谈话。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 and 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电报^[1]

(1965年12月31日)

哈瓦那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解放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古巴人民、古巴共产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古巴人民团结起来、艰苦奋斗、英勇斗争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次可耻的失败。它证明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祝愿，英勇的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捍卫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古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的电报。祝贺古巴解放七周年。

义的原则为基础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古巴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前进。

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 第四期上的批语

(1965年)

—

1965年，《哲学研究》第二期^[1]，赵纪彬^[2]，《论语新探》^[3]。

二

孔门充满矛盾论。^[4]

[1] 这一期登载了赵纪彬《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它是作者《释一二》一书初稿的第二章。《释一二》一书是就《经》《子》中“一”“二”及其孳乳各字的演进史迹，探索先秦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的斗争及发展规律，共分十一章。

[2] 赵纪彬，当时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

[3] 《论语新探》，赵纪彬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4] 这是毛泽东在1965年《哲学研究》第四期第44页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标题上方写的批语。这篇文章讲了六个问题：一、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和”“同”字

义的转化；二、有若、樊迟思想中的“和”“同”新字义；三、从“民不服”看“举贤”“德治”的阶级斗争意义；四、“仁”的矛盾调和原理与“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五、“闻一知十”与“闻一知二”两种矛盾观的对立；六、孔门的支派萌芽及其思想斗争的逻辑前景。这篇文章是作者《释一二》一书初稿的第三章。



1965年，毛泽东和王海容在一起。

关于礼宾工作的指示

(1965年)

一 宴会

我们招待外国人的宴会规格太高，而且不看对象，千篇一律都要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这是西太后和《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那些人吃的。我们请外国人，热菜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宴会的时间不要太长，我们又要同外国人谈话，又要同他们吃饭，我们陪不起。听说外国人的宴会就比较简单。

二 礼品

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其实送礼不在多少，而要送有民族的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自然要大方，但不能没个边，大手大脚，大少爷作风，不能靠多送礼品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外国人送我们的礼品就比较简单，艾地同志来，送我一根“金鸡毛”，好多同志送我一个小孩玩的弹弓，这种礼品就很好，礼品就是来表示意思，也不能靠礼品过日子。

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归个人所有，送给我的礼品要好好处理，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出来，没有展览价值的一些日用品，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来的钱归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尝尝。

三 礼节

外交礼节，不能学洋人那一套，什么黑衣服、薄底皮鞋等等，都是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我们是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是看你的政治，看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看群众的情绪，人家不是来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皮鞋。

重读《长冈乡调查》时写的批注^[1]

(1965年)

—

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工人，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父等，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他们因为不能不为农业服务，出外当红军，脱产做政府工作的也较少。除造纸业有几人至十几人的工厂手工业外，其余都是个体工人，自有工具，有些还是半农半工的人；土地改革中，工人怕失业，分了一些的土地，他们大体相当于贫农，所以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反而觉得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自己有失业、半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只是因为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要在乡村中及在落后的小城镇中（那里只有手工业，没有机器工业），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工农双方都不理解这个大道理，因而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这件事闹了多少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后，

[1] 本篇一是毛泽东重读自己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时，在“此次选举”一节中“选民登记”这段文字后面写的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此次选举”一节旁边写的一段批注。

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了，因为那时的领导路线改变了。（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注）

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1]，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1] 指1931年年初至1934年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

七律·洪都^[1]

(1965年)

到得洪都又一年，
祖生击楫^[2]至今传。
闻鸡^[3]久听南天雨，
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
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

[1] 洪都，旧南昌府的别称。隋、唐、宋三代曾以南昌为洪州治所，又为东南都会，因而得名。这里指江西省南昌市。

[2] 祖生击楫，祖生，即东晋名将祖逖。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在黄河流域建立汉国。中原大乱，祖逖率领亲党数百家来投镇守建邺（今南京市）的晋元帝司马睿。313年祖逖要求率兵北伐，被任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中流击楫，立誓收复中原。击楫，敲打船桨，后用以形容有志报国的抱负和气概。

[3] 闻鸡，这里化用闻鸡起舞的典故。《晋书·祖逖传》：“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祖逖和刘琨年轻时都有大志，互相勉励振作，因此听到鸡鸣就起床舞剑。后以“闻鸡起舞”比喻有志之士奋起行动。

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

吉林日报

[1] 《吉林日报》由中共吉林特别支部创办于1945年10月10日，当时报名为《人民日报》。1950年5月23日，毛泽东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头。1952年正式使用毛泽东题写的《吉林日报》报头。1965年2月2日毛泽东重新题写报头。

吉林日报

毛泽东为《吉林日报》题写的报头。

卜算子·悼艾地^[1]同志

(1965年12月)

疏枝立寒窗^[2]，
笑^[3]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4]。

残固不堪残^[5]，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6]。

[1] 艾地（1923—196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

[2] 疏枝，指梅花。梅花开放时有花无叶，开花后始生叶，故其枝条稀疏。立寒窗，指梅花在冬末早春时开放，天气寒冷，人们常栽于窗前庭院中，以供观赏。

[3] 笑，欢笑。形容花儿绽开，似人显露笑容。

[4] 反，反而。凋，凋谢。残，残缺，毁坏。凋残，花木枯萎，凋谢。

[5] 固，固然，本来。不堪，不能忍受，表示程度之深。残固不堪残，梅花已经凋零得非常厉害了。

[6] 蓄芳待来年，意思是说梅花每年都有开放的时候，现在虽然凋谢了，但是明年还会再开放，比喻只要不断地积聚力量，革命运动终会重新崛起。

在李达^[1]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的批注^[2]

(1965年)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

第三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

关于发展的
两种见解

在认识史上，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由于发展观的不同，各个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根本问题时的论证方法和彻底程度也就不同。发展观是构成一定

[1] 李达，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

[2] 本篇中左侧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写的两个批注。

辩证法的核心是建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数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强弱、发展……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于物之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互相矛盾，所谓矛盾就是辩证对立物。

第三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關於發展的
兩種見解

在哲學史上，同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斗争、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斗争交織在一起的，還有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斗争。辯證法同形而上學是兩種對立的發展觀。

發展觀所直接回答的是世界是否發展、為何發展和如何發展的問題，而不是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發展觀同哲學的根本問題沒有關係。事實上，任何哲學派別在解決哲學根本問題（無論是它的第一方面或第二方面）的時候，無論採取唯物論的立場或唯心論的立場，可知論的立場或不可知論的立場，都不能不涉及發展觀的問題。這個問題的不能迴避，正象哲學根本問題本身的不能迴避一樣。由於發展觀的不同，各個哲學派別在解決哲學根本問題時的論証方法和徹底程度也就不同。發展觀是構

成形式內容等；在核心規律的指導下可以說明。舊哲學傳統的舊有規律並列而

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批注的手迹。

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就

(Anorises) ^[1] 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

哲学体系的必要的有机的成分，是世界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观表述为互相对立的宇宙观（即世界观），就表明这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也是哲学上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论述哲学根本问题之后，必须论述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都把发展观概括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列宁说：“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是：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2]前一种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后一种观点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论述这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的历史根据以及这种对立同哲学根本问题的关系。

[1] 括号中的外文是毛泽东写的。

[2] 这段话引自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

事物的矛盾对立
统一去说明。例
如什么叫本质，
只能说本质是事
物的主要矛盾和
主要矛盾方面。
如等〈此〉类推。

不必抄斯大
林

两种发展观
互相对立的
焦点

观点的对立。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
立，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
问题上。

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



《与但丁讨论神曲》(油画)

1966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6年1月10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阿尔巴尼亞人民、阿尔巴尼亞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亞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亞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尔巴尼亞解放日之后，在阿尔巴尼亞人民生活中又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二十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亞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亞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阿尔巴尼亞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目前，阿尔巴尼亞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今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亞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阿尔巴尼亞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人民革命的事业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一向紧密合作，互相支持，结成了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我们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并将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给章士钊^[1]的信

(1966年1月12日)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2]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3]，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

春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六十万卷。三志原本各自独立，后世将它合为一书。

[3]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曾将这部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阅读。12月5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需要作词句的删改。”《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在197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1]一件，均附上。又及

[1] 指康生1965年12月5日给毛泽东的信。

给周世钊^[1]的信

(1966年1月29日)

东园兄：

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谨复，顺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廿九日

[1] 周世钊，字惇元，又名东园，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对有关《海瑞罢官》^[1]问题 七个材料^[2]的批语

(1966年2月5日)

江青：

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毛泽东
二月五日

[1]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剧，1960年年底完成，1961年初开始上演。1965年年初，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政治批判运动，这一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这一冤案平反。

[2] 这七个材料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1966年1月分几次报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2月1日，彭真转报毛泽东等。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七个材料的目录页上。七个材料分别是：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三、汇报关锋等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五、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为焦裕禄题词*

(1966年2月7日)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 讲话的批语^[1]

(1966年2月6日、12日)

—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

[1] 七千人大会，指中共中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多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曾作为中发〔62〕147号绝密文件印发。1966年2月4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读了一遍。我认为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有迫切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篇一就写在王任重的来信上。本篇二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66年2月11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彭真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这个讲话，中共中央1966年2月12日发至县团级党委，1978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1]是好的。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

—

彭真同志：

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二时四十分

[1] 王任重1966年2月4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毛泽东的讲话稿提出了6条纯属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彭真2月11日送审的这一讲话修改稿中，采纳了王任重的修改意见。

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

(1966年2月8日)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 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和毛远新^[1]的谈话

(1966年2月18日)

在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二三年，然后搞二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时，毛主席说：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才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搞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才，改成陆军大学以后（没有记下读几年），结果出来尽打败仗，做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

[1]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曾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和教员。

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 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

(1966年2月19日)

任重^[1]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

[1] 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66年2月5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其中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革命性的飞跃，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才能获得解决。而农业的大发展，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巩固的基础，它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对于备战、建设、防修，都关系极大，因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我省，实现农业机械化，要走孝感县金星大队的道路，也就是大寨的道路，即是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要发扬大寨精神，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保证增产和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下，采取以集体办机械为主、国家扶助为辅，“以机养机”、分期购进，国家扶助、无息贷款等办法，逐步实现机械化。要做好这一工作，关键在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今年一定要办好十七个公社的试点工作，并作出全面规划。规划不光是指标要求，而且是组织一个革命飞跃的行动纲要。从今年算起，我们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

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⑩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

[1] 刘少奇 1966 年 2 月 23 日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说：“我赞成将湖北省委这个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主席批语也一并转发。此外，中央还可加一个批语。”1966 年 4 月 10 日，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的文件、毛泽东的批语和刘少奇的信，并加了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批语。中央的批语指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他最近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作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争取从今年起，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是同他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紧紧联系着的。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毛泽东同志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动员广大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非常适时，非常重要。机不可失，我们应当立即抓紧这项工作。”“中央认为，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步骤，应当由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直接负责，特别是省一级要有必要的主动权。湖北现场会议以后，各地党委应当按照具体情况，作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的初步草案，内容包括分批分期、分别轻重先后缓急、由点到面、由低到高、土洋并举等措施，并同国家统一计划相结合。这种计划草案经过酝酿，然后提交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

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诱敌深入要做两手准备^[1]

(1966年2月21日、22日)

—

诱敌深入，过去灵，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敌人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

诱敌深入，怕不灵。可以搞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第一线要顶几个月。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完全不让它上岸也不行，我们海岸线那么长，这里不能登陆，那里可以登陆。过去德国人在青岛设了防，日本人就是从龙口登上来，从背后占领青岛的。

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二

诱敌深入有两个深度，差不多了，还要看形势。这是还没有同敌人打仗以前的想法，打起仗来，你晓得敌人怎么搞，现在可以这样设想。反正要在第一线顶几个月、半年的时间，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能一点空子也没有，你设想得很周密，但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钻你的空子上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

三

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起来，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翼侧的设防。战争开始，可以采取这个方针，打几个月，看情况再说。美国搞空降，只能搞近距离的空降，远距离的空降，它没有把握，力量也不行。

四

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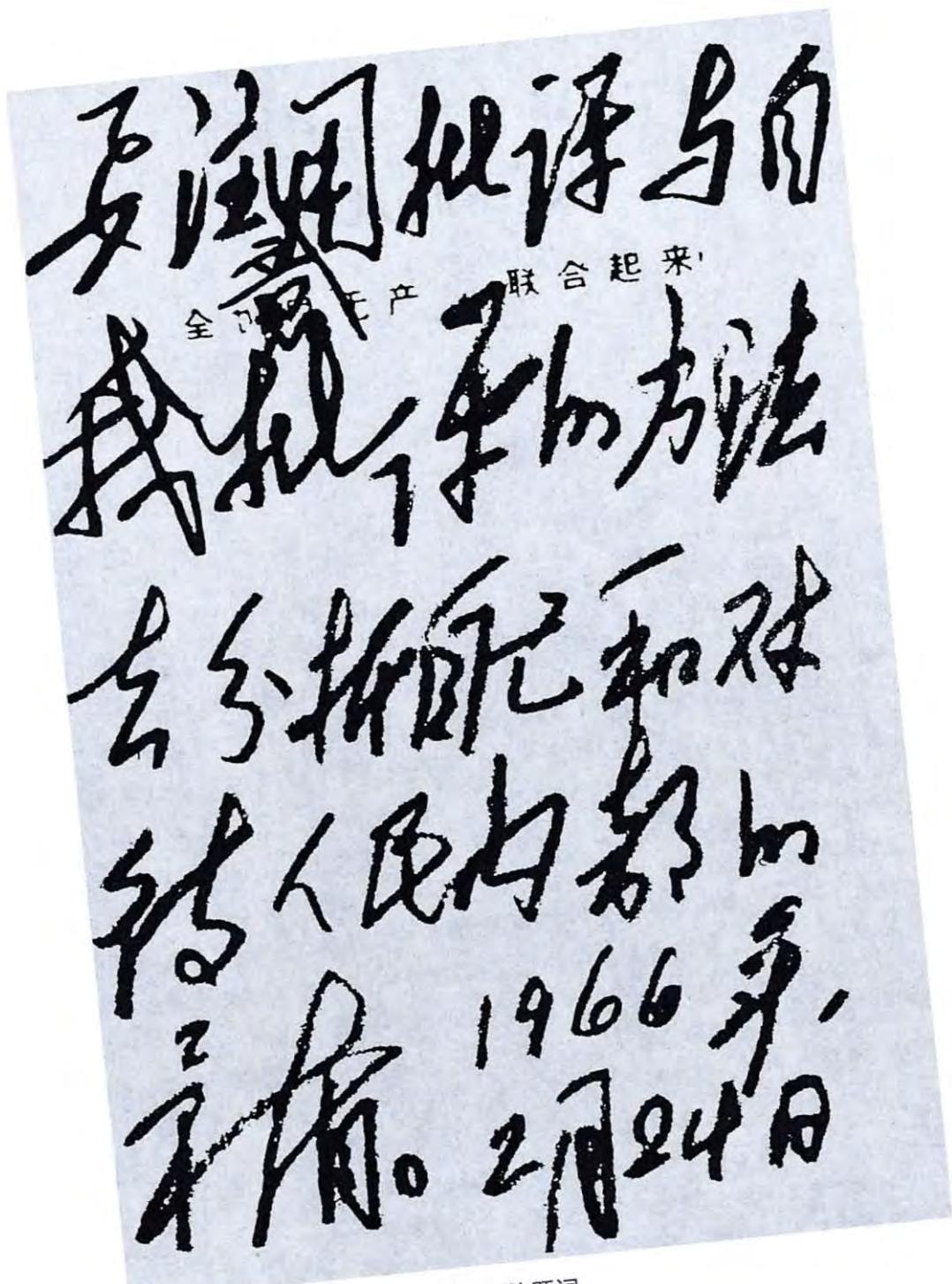
为罗丽华^[1]题词

(1966年2月24日)

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1966年2月24日

[1] 罗丽华，当时是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



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罗丽华的题词。

对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 发言稿的批语^[1]

(1966年2月、4月)

[1]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6年1月24日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泽东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工厂可以把奖金加到工资里去，只要不超过工资总基金就可以。原则有两条，一条是不增加国家开支，另一条是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减少。以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农村的基本办法是搞底分制，按人评底分，反对搞繁琐哲学，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否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本篇一写在王任重这一发言的铅印稿上。4月10日，中共中央加批语转发了王任重的发言稿，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牵涉的方面和问题很多，需要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考虑，通过群众路线，逐步解决。请中央有关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党委找几个工厂、商店、生产队等单位，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在今年试点，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本篇二就写在中共中央这个批语稿上。

—

少奇^[1]同志：

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泽东

二月廿五日

—

同意。

[1] 少奇，即刘少奇。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1966年3月12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年、七年、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

[1] 指刘少奇1966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的批语，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周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

[2] 小计委，是1965年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的同志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

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

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1]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2]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1] 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小计委负责人。林乎加，1916年生，山东长岛人，当时是小计委成员。

[2]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为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等文件加写的批语中指出，为了推动农业机械化工作和交流经验，“中央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商定，于今年4月下旬或5月初在湖北召开现场会议，除各中央局派人参加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同志是管农业的书记一人，计委一人，或者再去一位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志，西藏去一人即可。会前，中央将派小计委的同志到湖北先进行调查研究，同湖北省委一道，着手现场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具体时间，届时另行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可先派一二人到湖北参观，同时各地可以总结本地区若干单位农业机械化的典型经验和一般农机具的生产、供应、修配、管理情况，带到现场会议上交流经验。”

区合办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去农村筹措等
方面，对某些材料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
助，也是由地方出钱购置，否则推延时间。
共而想大家同意。

前一月 起草机械。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
机部 国家管理。

机器、农具、农具、机械，凡地方制造，超出国家制
造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应趁过期，
即行处理。至于留不三成至五成，因地而定。此
时如在山西，八部之多，即用机器者亦必
然不至，这个理由性是讲不起来的。

要为地方重机械建设，一切统一于中央，不能
天下各布旗帜，各党、各人民联系起来，互
相关系，互相帮助。

丝 丁 5
为求吧。提高耕种出稼率得流与人民法是
同时，执行地方法的法，还是百姓足量耕种不足
的老法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根本地实
才脚着仍出垦是否能的
行，我者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解决。苏解②
的垦不量本本和以吗？垦西固至三温的
以上缺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
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
如解中局局
林晚加二周差若为宜。且有经营农事者起
布运资金也所急的，年四月不以少
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是否可行亦请酌
科
此
七人左右去到那里出一个现，好会
七天至十天。

毛泽东三月十一日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手稿（部分）。

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 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1966年3月12日)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血吸虫病的检查与治疗应该免费。过去医务人员就是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说：“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要在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宣传画）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66年3月20日)

(一) 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做。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2]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他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在墨期间筹划“七·二六运动”。卡斯特罗1956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1959年1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1962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1965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贺电？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1]、范老^[1]，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2]

[1] 郭老，即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学、史学界权威。范老，即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两人同为国学名家。

[2] 吴晗，明史专家，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翦伯赞，历史学家，当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1]，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2]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3]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4]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5]、翦伯赞等人。

[1] 《前线》，北京市委刊物。此处的“你”指彭真，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2] 廖沫沙，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于1961年8月31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3] 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当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1966年3月2日转载《红旗》1966年第3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1964年8月。

[4] 赵毅敏，原名刘焜，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1962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

[5] 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1964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1]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

[1] 戚本禹在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戚本禹在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李鸿章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1964年7月24日作了摘要转载，毛泽东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的、学问多的。

朱德：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

[1] 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说，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历史上的“退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护了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而剧中却说成是保护贫雇农，历史上退休内阁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只被判处充军，也不是海瑞判的，而剧中却说海瑞“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做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

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作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要搞机械化。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

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1]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办托拉斯^[2]，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3]。

[1] “虚君共和”，毛泽东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彻底贯彻，建构了中国计划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形成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别于苏联模式。

[2] 托拉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建议试办托拉斯〔垄断企业〕，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托拉斯，4月3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1964年4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获得批准。1964年和1965年全国共试办了16个全国性和区域性托拉斯，但试办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全国或跨地区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托拉斯是和毛泽东的“虚君共和”主张相对立的。

[3] 1964年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1]，这样不行。

周恩来：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

[1] 南粮北调，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江浙、两广、两湖一带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从1968年开始，国务院全面部署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每年以30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文革”中，华北大地上打了近200万眼机井，1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北煤南调，我国煤炭资源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西部，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调的格局。

品带新产品。

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这好像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明年搞个办法。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求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吗？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中央也无权呀！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

[1] 陈正人，当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1965年1月改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1]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列宁也是抄。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

[1] 俞平伯，著名红学家，和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20世纪20年代即已成名，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也堪称一位红学家，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 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1]

(1966年3月)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2]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1]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以中央总书记官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于1966年2月至4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由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起草了联合公报草案。本篇是毛泽东对1966年3月27日送审的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后来这个公报草案未能达成协议。

[2] 1957年宣言，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1960年声明，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的批语和修改^[1]

(1966年3月、4月)

[1] 这篇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审阅后写给江青的两个批语；本篇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66年4月1日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五、九是写在纪要上的两个批注；本篇四、八、十二、十八是在纪要中加写的话；本篇六、七、十、十一、十三至十七是对纪要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名字。对这个纪要，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修改，主要有：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删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等语句。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纪要。1979年5月3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纪要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

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

已阅，同意。

退彭真同志。

四

此件^[1]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五

去掉一句。^[2]

六

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3]

[1] 指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这篇谈话经过整理1979年9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后编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2] 纪要中讲到江青这次“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一句，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四篇著作，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一句，原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

七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八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1]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九

这样较妥。^[2]

[1] 指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2] 纪要中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审阅时，将引号内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写了这个批注。

十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1]

十一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2]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

[1] 这句话原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2] 王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1931年11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11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十二

古人、外国人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十三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十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

十五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

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十六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十七

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八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1]

(1966年3月、4月)

一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的谈话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2]。

《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3]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2]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

[3] 邓拓，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拒绝在北京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二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谈话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1]，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2]？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1] 关于阶级斗争的决定，指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2] 1966年3月11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1]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2]，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1]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1966年2月1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2] 中共中央于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提出要战备。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三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①。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不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四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

[1] 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1961年9月20日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这里的“三家村”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

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1]，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1] 唐朝诗人贾岛在《忆江上吴处士》中有一名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毛泽东在1963年1月9日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中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这里指修正主义者处于萧条凄凉的境地，我们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

（1966年4月14日）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4月12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批语当时没有印发。

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

[1] 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对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 开幕词中一段话的批注

(1966年4月14日)

这一段话^[1]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注

[1] 指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的以下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196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一些指示辑印在一起，准备发给参加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的人员学习。毛泽东审阅时，在这段话后面，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

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6年4月23日)

此件^[1]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1966年4月19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简报说，高教部党委于4月17日召开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会上，北大等学校汇报了前一时期学术批判情况，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得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得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会上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如下部署：(1) 各院校领导必须明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教育战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2) 目前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当前学术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学术批判来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3) 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师生和教职员积极参加这场战斗。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 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6年4月)

—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3]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设立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五人组成。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2] 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3] 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1966年4月12日稿），由周恩来等于1966年4月12日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

恩来、小平^[1]、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

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1] 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三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1]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四

已阅。

退康生办。 ^[2]

五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3]，隶属于政治局常委

[1] 这个批语写在1966年4月12日报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对这个通知稿，毛泽东后来又作过多次修改，见本篇五至十一。

[2] 这是对康生1966年4月18日报送的通知修改稿的批语。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

[3]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之下。

六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1]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

[1]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八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九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一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1]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对《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 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修改和批语^[1]

（1966年4月）

—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入。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66年4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在主席诗词注释本中，有两三处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请示。（一）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根据总政几位同志的建议，参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注释，作了一个题注，不知是否适当？请批示。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题注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二）《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三）《七律·送瘟神》一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在这两条后面，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本篇三写在胡乔木给毛泽东请示信的信封上。

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1]

二

可以。

三

已阅。

退乔木。

[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对这条题注稿作了修订。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又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现在的文字是：“1930年6月，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由福建省汀州（长汀）进军江西省。8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东北同彭德怀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会合，并决定共同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9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克。守敌强而有备，红军不宜攻坚。同年夏由于蒋、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河南等地混战，数月之内江西、湖南一带，除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外，都无强敌。因此，毛泽东说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改变当时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指示的夺取湘鄂赣三省省会的冒险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今新余）等地，占领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准备了条件。这首词写的是红军6月、7月进军中的豪迈心情。”

对林一山关于修建 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1]

(1966年4月)

已阅。

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1]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1966年3月9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三峡水利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极大，但要积极开发，就必须解决建设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也是有人反对近期建设三峡的一项重要根据。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原则是：综合利用，合理安排防洪、发电、航运，充分利用水利资源，除害兴利，在其他防洪工程配合下，逐步达到根治长江的目的。在实现各项水利目标的程序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实现。分期建设可以用较少的投资额、较短的工期，尽早地发挥效益，有利于国家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也有利于工程防护。报告在对三峡工程的防淤、防空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证后提出，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4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将林一山的这个报告及其他两份相关的报告一起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王任重的送审报告上。

对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的指示

(1966年4月)

这方面的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青年批判到哪里，党中央就支持到哪里。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油画)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宣传画）

中国是否会出现修正主义

(1966年4月)

中国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一是出，一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好了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罗等都当过书记处书记，是不断分化，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1966年5月5日）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1] 赫鲁晓夫（1894—1971），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 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1966年5月7日、14日)

—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2]，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1966年5月2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件下，很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1]；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2]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 指1963年至1966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 大跃进时期，1959年9月26日，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当时正值国庆十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十周年的新中国。1960年3月，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大庆油区的发现和开发，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

林彪同志：

此件^[1]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2]，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3]。请你酌办。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1] 即本篇一。因写于1966年5月7日，后来通称为《五·七指示》。

[2] 指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5日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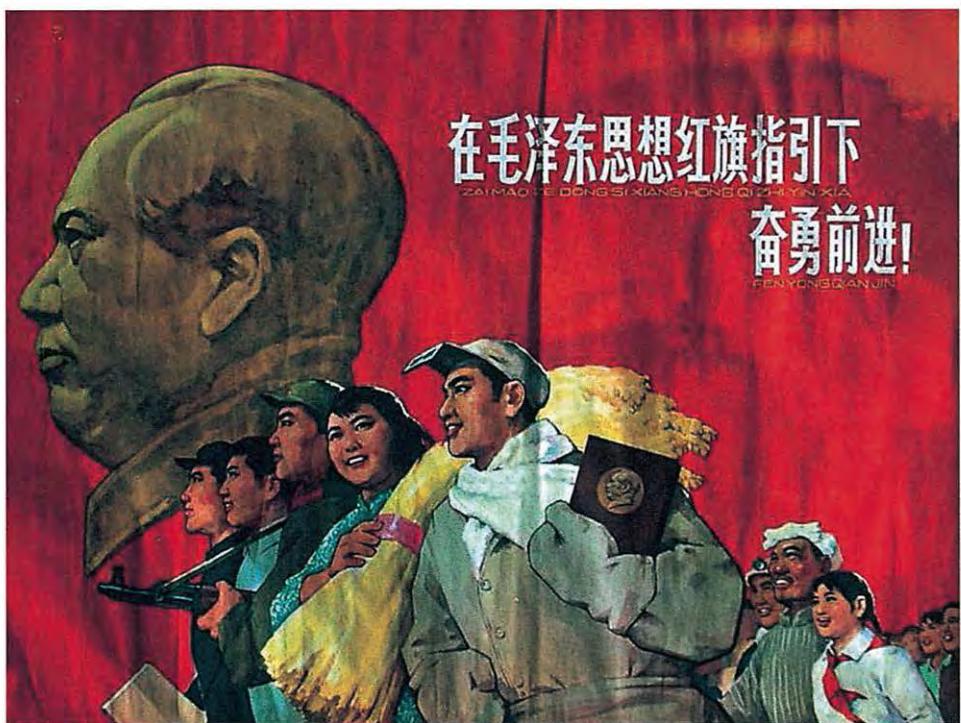
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奋勇前进！

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奋勇前进！（宣传画）



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乘胜前进

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乘胜前进（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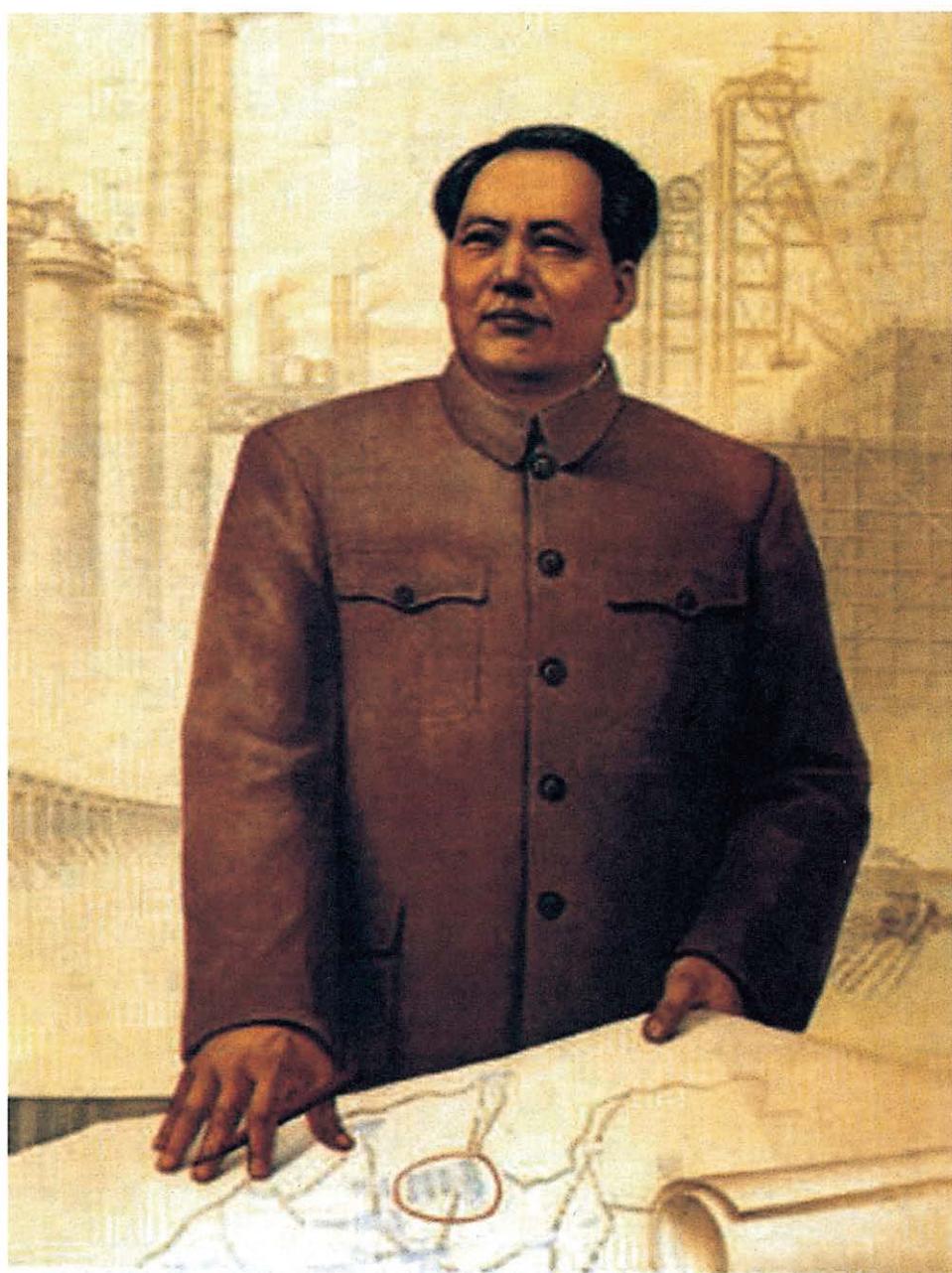


在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奋勇前进! (宣传画)



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宣传画）



毛主席領導我們建設偉大的祖國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伟大的祖国（宣传画）

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 意见^[1]的批语

(1966年5月11日)

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2]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1] 指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1966年5月5日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个材料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看法。毛泽东批示印发时，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2] 少奇，即刘少奇。1966年5月13日，他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这次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京举行。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加写的几段话

(1966年5月16日)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1]，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1964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1966年2月1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 来信^[1]的批语和批注

(1966年5月17日)

—

刘、周、邓阅。送康生^[2]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1] 《柳文指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1965年，章士钊将这部书稿送毛泽东审阅。同年7月18日，毛泽东复信提出意见，并于8月5日将书稿批给康生阅读。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将书稿连同康生的意见和来信一并退给章士钊。5月10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极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

不可能这样快。^[1]

—

此语说得过分。^[2]

四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3]

[1] 这个批注写在章士钊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话旁。

[2] 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3] 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五

何至如此。¹¹¹

[1] 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关于同意派临时工作组 去人民日报社的批语^[1]

(1966年5月30日)

同意这样做。

毛泽东

五月卅日廿三时

[1] 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6年5月30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讨论会，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信末还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大字报的批语^[1]

(1966年6月1日)

康生、伯达^[2]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该期简报登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新华社6月1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6月2日刊载。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后不久，他们均被错误地撤销领导职务。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全中国的儿童热爱毛主席（宣传画）



毛主席 周总理 朱委员长和我们在一起

79年春节期间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宣传画）

在杭州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

（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志明（以下简称胡）：党员共有五千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哪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被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你们说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八十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二十万人而已；其他六十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像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像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让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

史哲学等。

毛：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什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余、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四个原则，叫“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

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佰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不适。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要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

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哪里去的？从中国去的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苏两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苏两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像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十六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

毛：……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

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

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吗？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大革命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被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

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泳，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看，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人情。



1966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杭州。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1966年6月30日)

少奇、小平^[1]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2]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3]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4]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5]，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等讲话。这篇讲话后来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3]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5] 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最初为十二条，曾一度扩展为二十三条，最后确定为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⑩，值得参考。

毛泽东

六月三十日二时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66年6月21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6月3日至6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在运动中，要进一步组织工农兵和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对于只有个别缺点的左派，应加以保护，不要混淆斗争目标。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报上点名公开批判要慎重，要准确。干部的撤职免职以及在报上公开批判的，均应按照干部管理的范围，由上级批准。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各级党委的领导，应当采取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单位的运动，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应当根据情况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报告最后指出，当前各级党委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文化大革命，全面安排工业、农业、财贸、小三线建设等项工作。

七律·有所思

(1966年6月)

正是神都^[1]有事时，
又来南国^[2]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3]
故国^[4]人民有所思。

[1] 神都，古谓京城。这里指首都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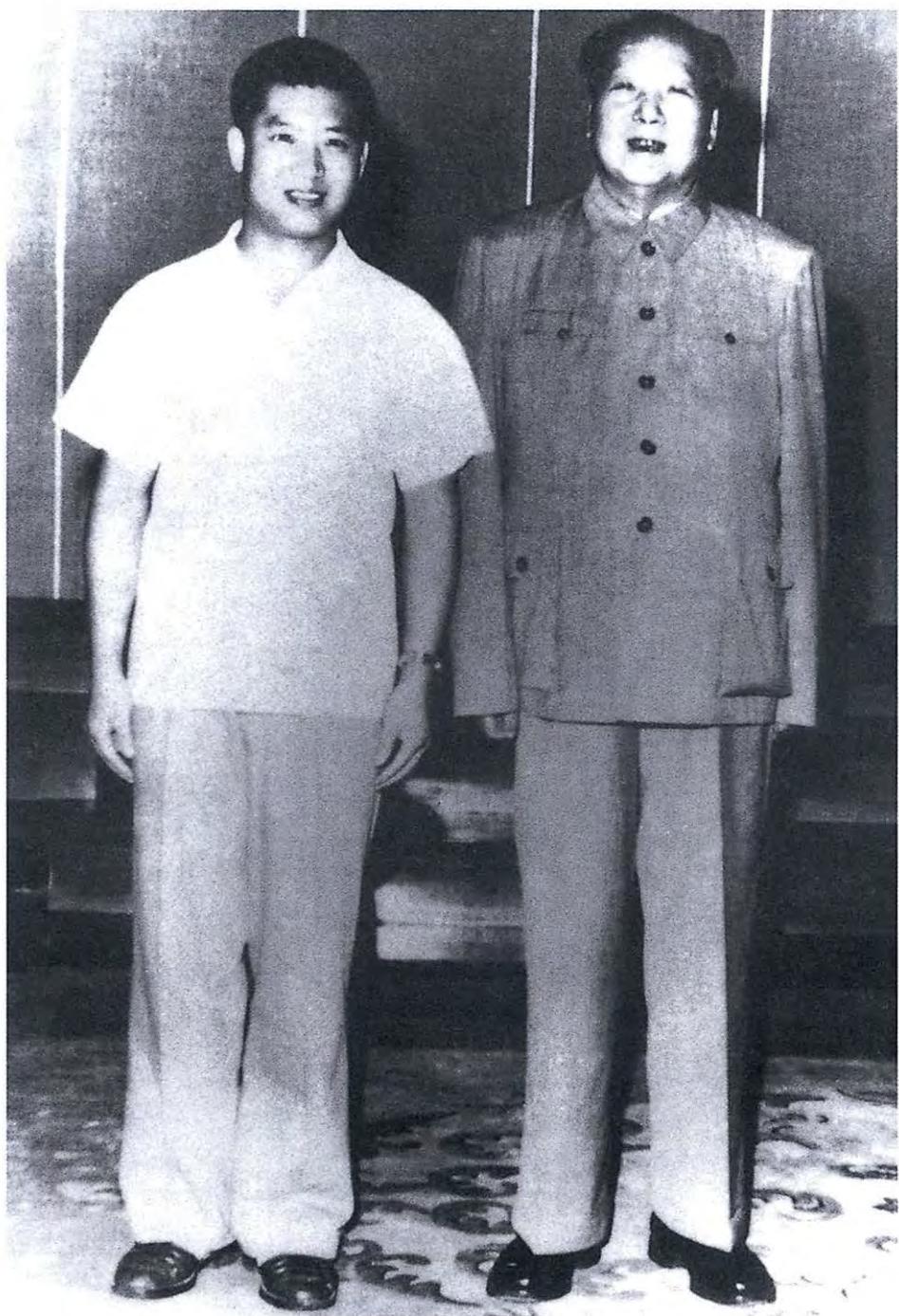
[2] 南国，中国南方的泛称。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在南方巡视。1966年5月15日至6月15日在杭州；途经长沙于17日到韶山滴水洞，在这里住了11天；28日赴武汉。

[3] 凭阑静听潇潇雨，化用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凭阑处潇潇雨歇”句。阑同栏。潇潇，骤急的雨势。

[4] 故国，即祖国。



1966年6月21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和中央警卫局张耀祠、湖南公安厅厅长高文礼、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合影。



1966年7月1日，毛泽东和厨师于存在武昌留影。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和湖南省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合影。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

(1966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1]

[1]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的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后面引用了这句话。《人民日报》7月3日转载了这篇社论。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建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通知稿的批语

(1966年7月2日)

少奇、小平^[1]同志：

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2]，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

七月二日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6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和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

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刘少奇、邓小平送审的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保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1966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给江青^[1]的信

(1966年7月8日)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2]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3]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4]，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5]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6]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8]，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

[1]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上海市。

[4] 1966年7月12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5] 指杭州市。

[6] 指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7] 指武汉市。

[8]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

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2]，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3]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1]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这几句话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2] 指毛泽东1966年4月16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3] 指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1]，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

[1] 1972年5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1]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对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的组织 和工作问题请示信^[1]的批语

(1966年7月10日)

陶铸同志：

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毛泽东
七月十日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1966年7月5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这封请示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彻底改组部的领导。二、新的工作方针。今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三、目前工作的抓法。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并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揭露问题，结合扩大队伍，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抓在9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

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 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话

(1966年7月10日)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的老家去。



1966年，毛泽东和湖北省委领导人及东湖客舍工作人员的合影。

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

(1966年7月12日)

伯达、康生^[1]酌处。

此件^[2]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指北京语言学院7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1966年6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就会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1. 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 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3. 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 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 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三印发。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1]

(1966年7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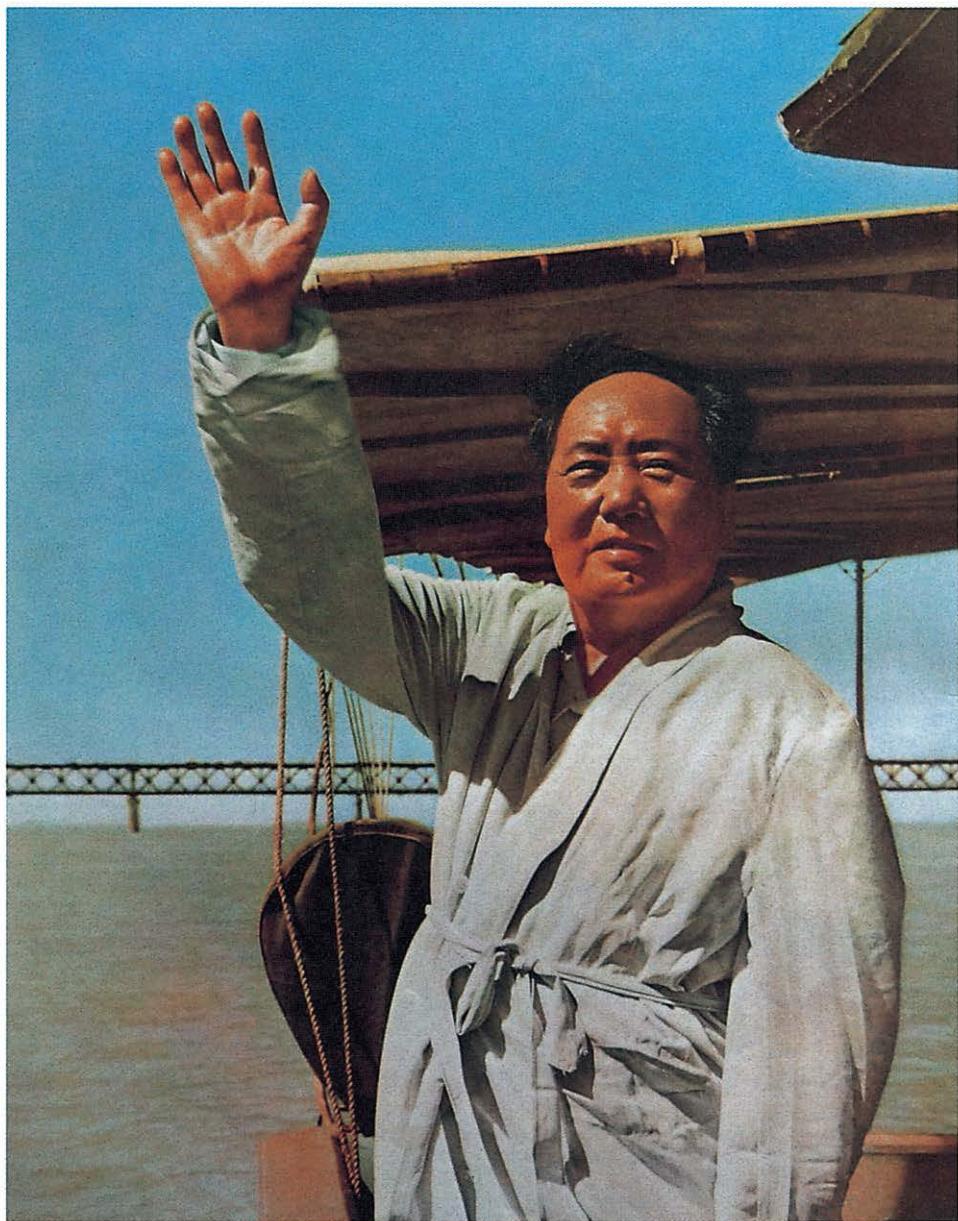
—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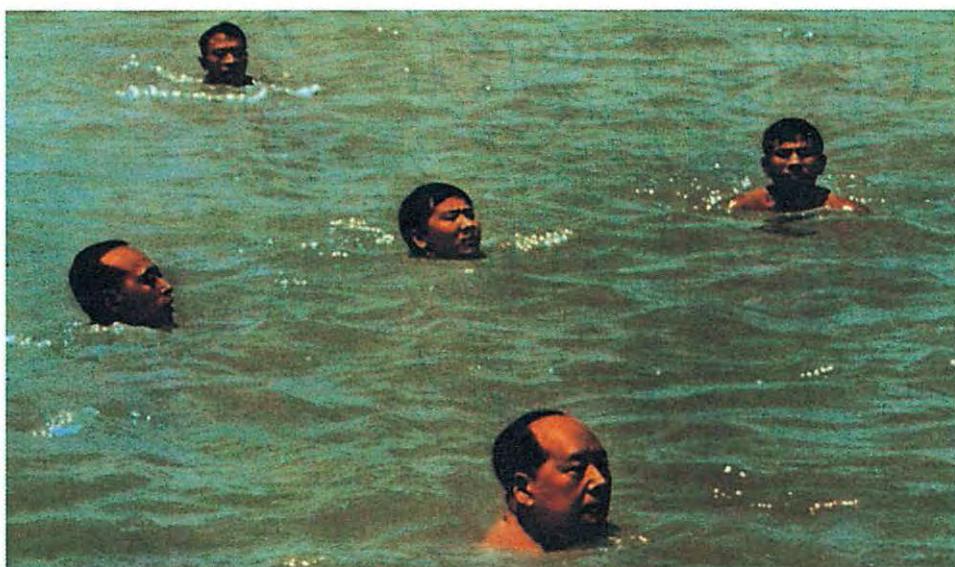
[1]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第五次畅游长江。本篇一、二是他在畅游长江时的谈话，摘自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新闻稿《毛主席畅游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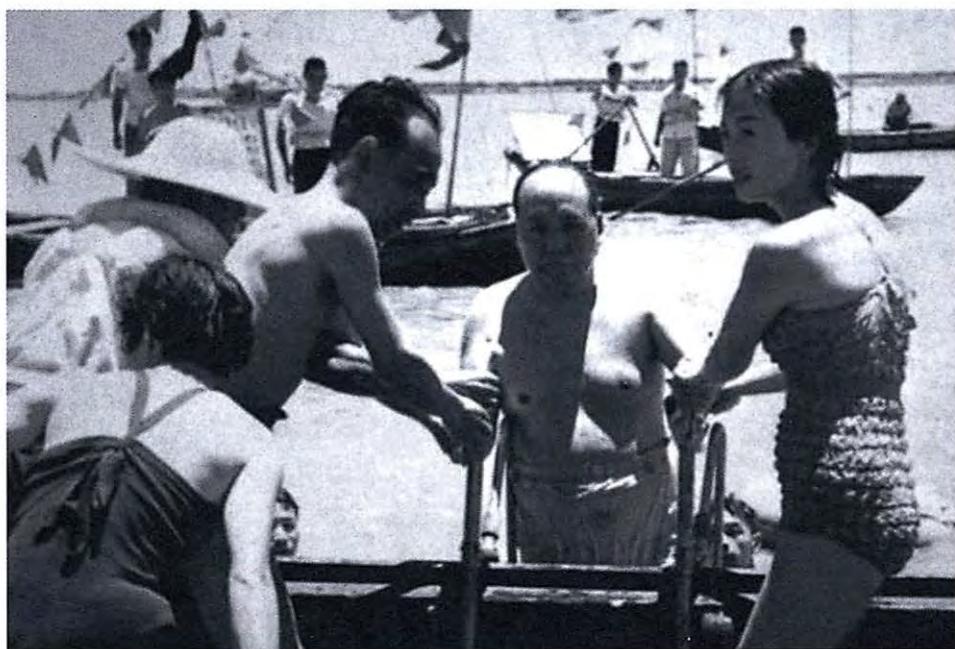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716”舰艇上观看横渡长江的游泳健儿。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1966年，毛泽东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后上船。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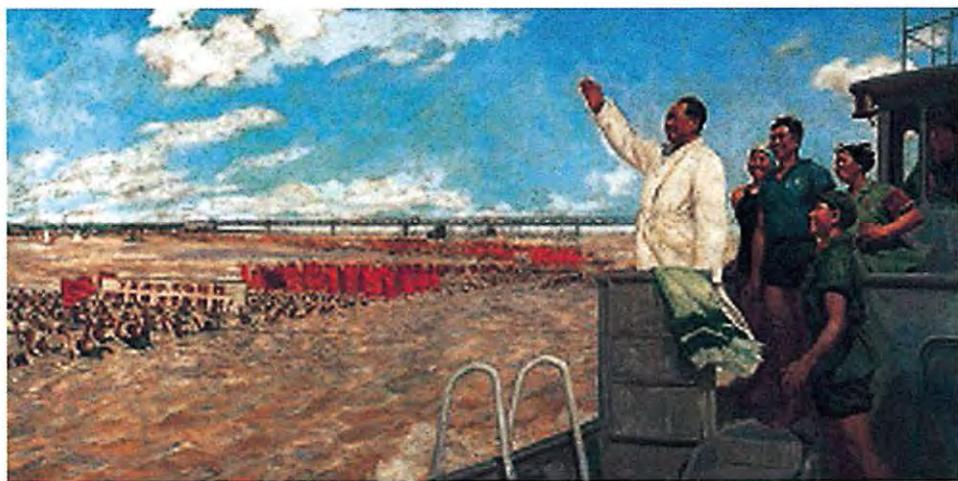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在武汉合影。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宣传画）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宣传画）



毛主席带领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宣传画）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发展起来的。（宣传画）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油画)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油画)



万里长江横渡（宣传画）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和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合影。

工作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1]

(1966年7月21日)

开两个会，一个是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另一个是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行，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六月一日公布大字报^[2]，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3]写了那么多书，你们谁看过，小平看过吗？

邓小平：没有。

哦，没有，知道你也没有。那么你能斗得了他吗？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

陈伯达：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几个理论和方针，他们把放手

[1] 这是毛泽东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的联席会议上的谈话。

[2]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于1966年6月1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3] 翦伯赞，历史学家，当时任北大副校长。

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乱弹琴！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闹事就是革命。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

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1]有多大斗头？李达^[2]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哪个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

康生：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

[1] 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2] 李达，原任武汉大学校长。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大会，后因故脱党，但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1948年年底，李达接毛泽东信函，“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949年，又重新入党，毛泽东是他的历史证明人。

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据说南京《新华日报》被学生包围了，就不得了了，好像闯了多大的祸，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你们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和吴德^[1]来了吧？

李雪峰：我在。

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学生们围上来，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刘少奇：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你搞了一两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嘛，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这一点大多数人都通了，你还不通？

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

[1] 李雪峰，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可能来不及了，要加就加中央社论和通知。

周恩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另外，我提议教科书加上毛主席的著作。

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1]那样可搞个训练班，当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李雪峰：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邓小平：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究竟是谁掌握呀？我看还不如有些学校呢！你们没想想，学校的学生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就要闹事嘛，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是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正在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吗？我看文件上要

[1] 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编校、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影响深远。

写明只有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就斗他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

在会见大区书记 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

(1966年7月22日)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子。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批、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像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搞成联络员？搞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

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感性知识，那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上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1]是否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的话。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有写，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向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

[1] 匡亚明（1906—1996），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行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些部门改成科，没有办）。是呀，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局长、处长，不管事的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争论“六·一八”事件是不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有的说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1]

(1966年7月)

“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1]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暴力斗争，60多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罚跪和殴打等。后来，北大工作组制止了这些斗争。

对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稿的批语^[1]

(1966年7月、8月)

[1] 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月间曾作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是写在7月16日草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7月26日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写在陈伯达8月3日晚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对陈伯达8月7日送审稿的批语。这一决定的7月16日草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内容共23条。后来几经修改，在7月29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改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内容压缩为16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决定中有几段话收入了经毛泽东审定、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这几段话是：“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此外，1967年6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在“毛主席指出”后面，登载了决定中的以下一段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
伯达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1]。

毛泽东

七月廿一日

[1] 1966年7月16日印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共19页。在第18页，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在第19页，将“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二

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1]。
供讨论用。

三

伯达同志：

改得很好，可即印发。^[2]

毛泽东

八月三日下午九时

[1] 指陈伯达1966年7月26日晨报送的决定修改稿。毛泽东在这次修改稿第7页“各单位党的领导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党的领导要同群众一起”两句中的“党的领导”后面，分别加上了“和革命群众中的骨干分子”11个字。此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2] 这是对陈伯达1966年8月3日送审的决定修正稿的批语。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请审阅批示！”

四

伯达同志：

《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二时

五

即送伯达同志：

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⑩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十时

[1] 陈伯达1966年8月7日送审的决定修正稿第10页写道：“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一句，并将“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改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将“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改为“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 千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 一类词语的批语

(1966年7月25日、8月4日)

—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1]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1] 指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将此稿第5页“他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这篇电讯稿发表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

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⑩

毛泽东

八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 1966 年 7 月 29 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7 月 28 日上午，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 7 月 25 日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道，但不要用在标题上。三、“反党黑帮”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指示。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亦请中央考虑决定。8 月 4 日，中共中央将陶铸的报告发至省军级。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1966年7月31日、8月1日)

—

各同志^[1]:

请考虑此件^[2]及附件^[3]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1] 指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15人。

[2] 即本篇二。这封信没有发出。

[3] 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6月24日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7月28日，他们将这两张大字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载于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人民日报》8月24日予以转载。

二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

(1966年7月)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毛泽东叫陈伯达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2]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2] 指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

(1966年7月)

有人讲团中央“三糊”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暑期物理讨论会的33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代表。

关于打人问题

(1966年8月1日)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同学间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不许镇压学生运动^[1]

(1966年8月4日)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2]。这与陆平、蒋南翔^[3]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1966年6月初到7月底的50多天中，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历来的官办政治运动的方式搞文革运动，方法包括：派工作组、给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把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们的黑材料等等，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和党委镇压学生的普遍现象。仅清华大学就有800多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3] 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原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两人都镇压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对“六·一八”的批语^[1]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2]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

[1] 1966年6月18日，上午9点到11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40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并规定今后“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参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20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加批语后转发各地：“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2] 雪峰，即李雪峰，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贴出来后，李雪峰当晚赶到北大，随后召开会议指出：“北大出现了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并把讲话稿上报中央。

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炮打司令部^[1]

——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1]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1]，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1]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1] 毛泽东这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司令部”，实际上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这件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当时对党内

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在1968年9月向中央报送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于10月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这次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1969年10月，刘少奇在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11月12日被迫害含冤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复查结果，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议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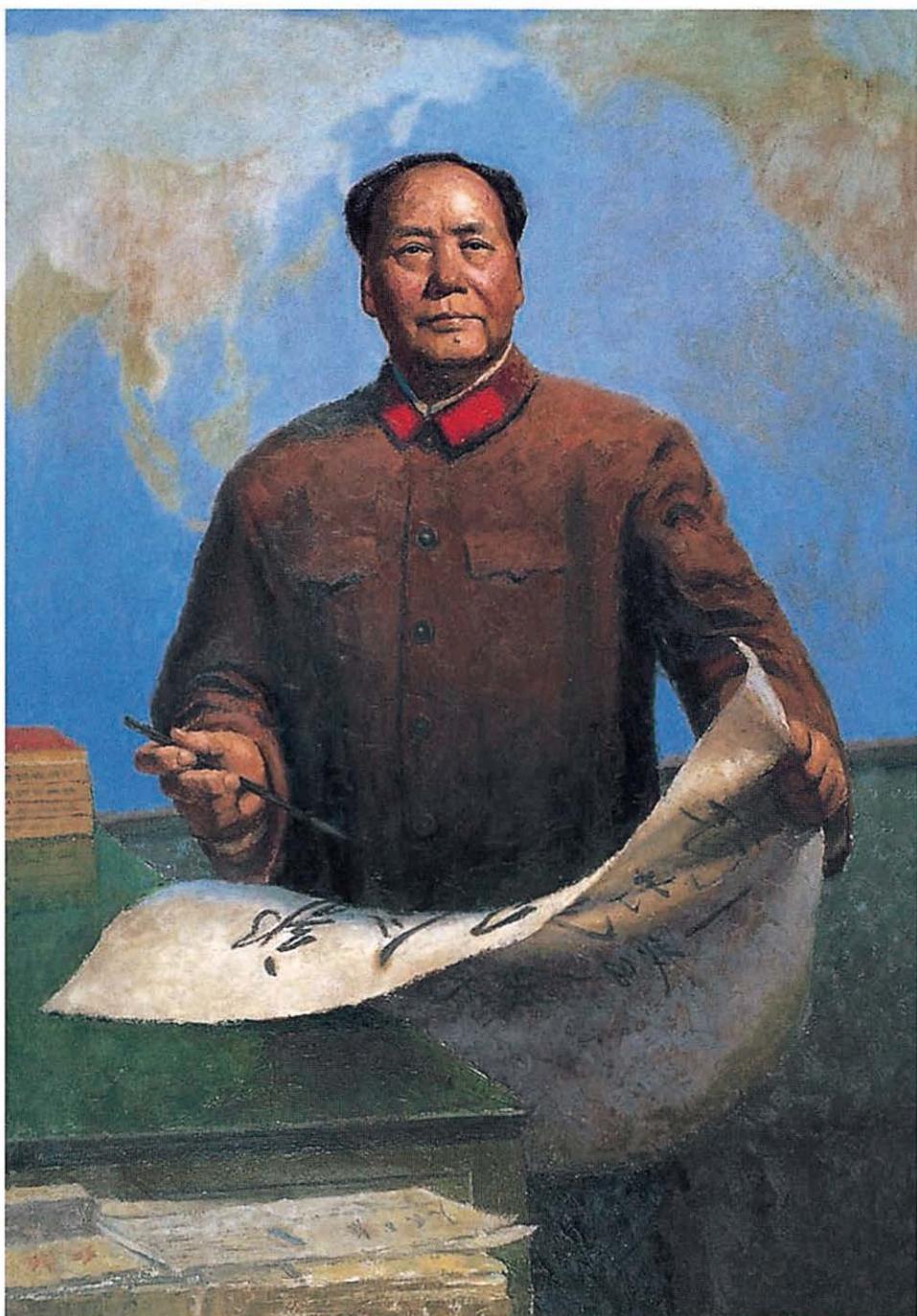
[2]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3] 指《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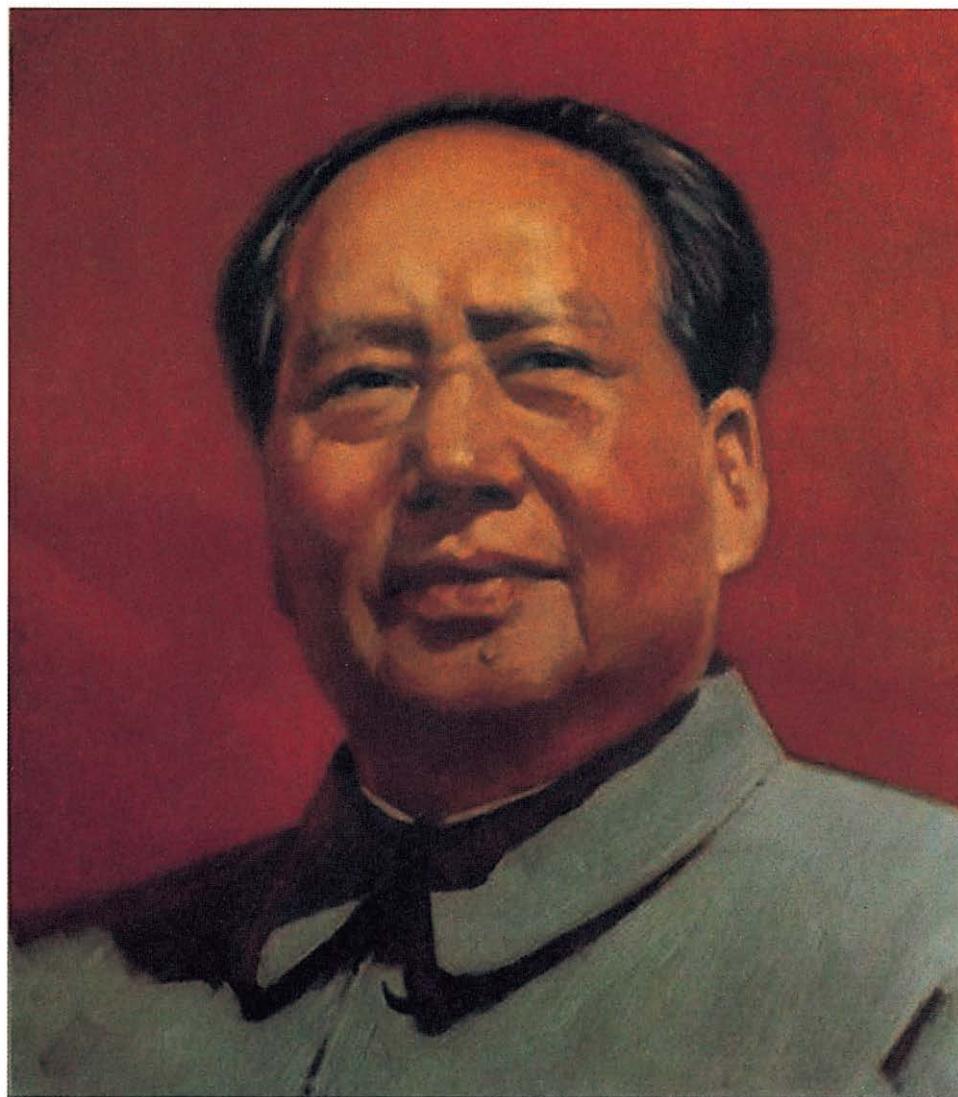
[4] 本篇原写在一份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这一天的《北京日报》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毛泽东后来作过两次修改，并加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炮打司令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66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国画)



《炮打司令部》(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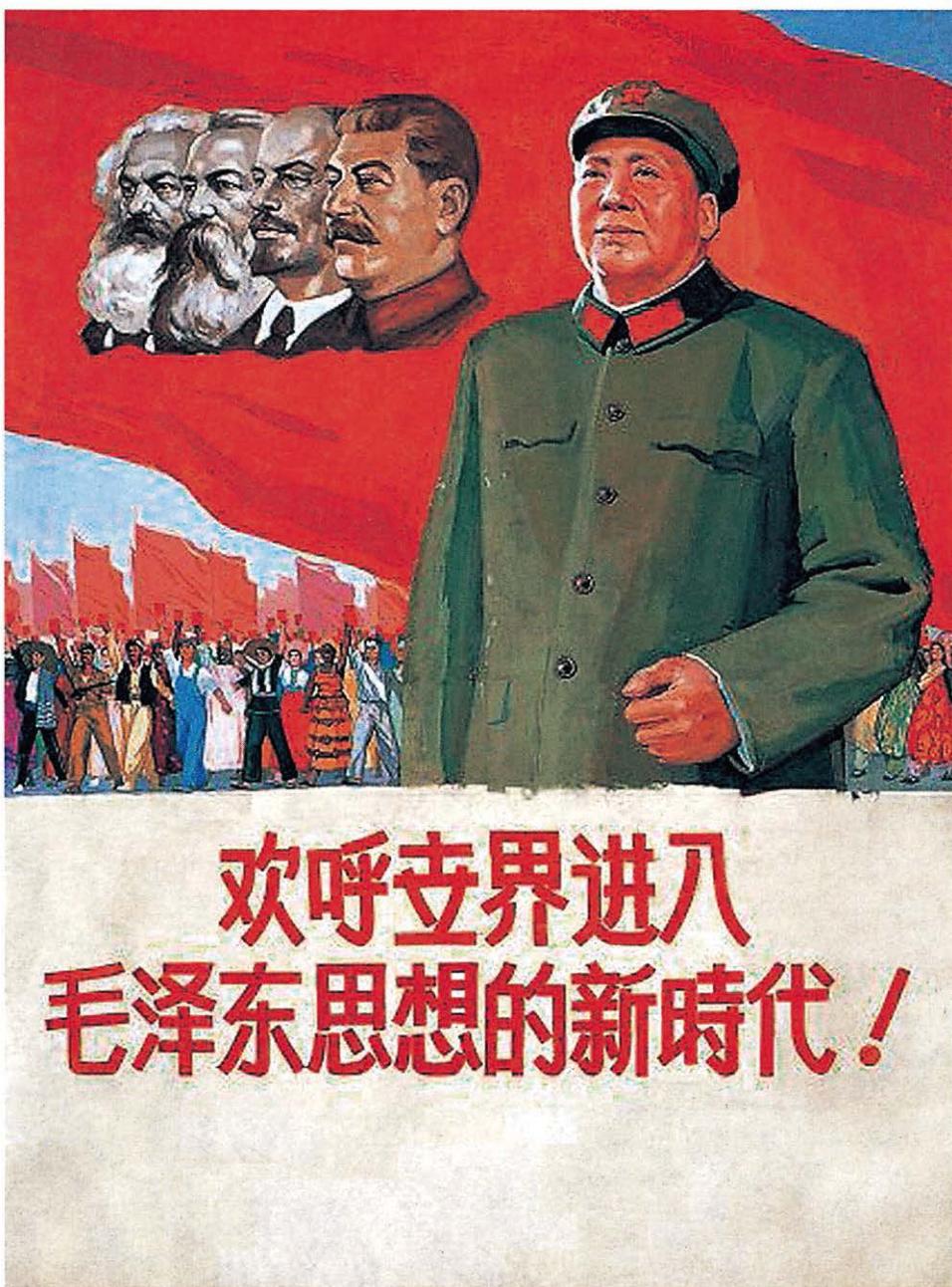
《炮打司令部》(油画)



《世界革命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油画)



炮打司令部（宣传画）



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宣传画)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传画）



炮打司令部（宣传画）



千钧霹雳开新宇——炮打司令部（宣传画）



毛泽东晚年搬进中南海游泳池居住。他经常在这里游泳。

在《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 一文中加写的批注^[1]

(1966年8月5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注。

[1] 《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是《人民日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而写的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这篇文章及毛泽东的批注后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

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6年8月5日、9日、11日)

—

康生同志：

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2]。

毛泽东

八月五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1966年8月5日送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上；本篇二写在康生8月9日送审稿上；本篇三写在康生8月11日送审稿上；本篇四是在8月9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五是对8月9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六是对8月5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五、六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于8月12日经全会通过，发表在8月14日《人民日报》。

[2] 毛泽东在康生1966年8月5日送审的公报稿第五页去掉的一句话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其中所说的声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6年7月22日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声明。

二

康生同志：

有些修改^[1]，请酌定。其他都同意。

毛泽东

八月九日下午



1966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台上。

[1] 毛泽东对康生1966年8月9日送审的公报稿的修改，除本篇四、五外，还将“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一句中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

三

康生同志：

可照此印发。

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

四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五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六

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对李达来信的批语^[1]

(1966年8月10日)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毛泽东

八月十日

[1] 李达，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当时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1966年7月1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解救他。毛泽东见信后即写了这个批语。8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批语后，立即批示：“即送任重同志。”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8月24日，李达受迫害致死。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在中央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

(1966年8月10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1] 据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11日电讯稿报道，毛泽东于10日下午7时15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群众，向大家说了这句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闭幕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12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2]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3]，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文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

[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2] 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3]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1966年8月，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对陈伯达、康生^[1]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 北京市委书记请示报告^[2]的批语

(1966年8月15日)

林、周、陶、刘、邓^[3]、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4]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廿二时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陈伯达、康生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3] 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陶，指陶铸。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4]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市长。

给刘少奇的信

(1966年8月15日)

少奇同志：

给续范亭信^[1]及我在信上建议改写的话，印象都不深了，如找到，请再给一阅，阅后送还，可否请酌。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1] 指刘少奇1943年6月28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的信。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批注了自己的意见，并于当年12月17日给刘少奇写信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1966年8月15日，刘少奇将他给续范亭的信及毛泽东的批注一起送毛泽东。

对林彪^[1]三篇讲话稿的批语

(1966年8月16日)

林彪同志：

这三件^[2]都看了，都赞成。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下午七时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指林彪1966年8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稿、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和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

为北京大学校刊题名

(1966年8月16日)

新北大



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校刊题写的刊名。

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 同林彪的谈话^[1]

(1966年8月18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1]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本篇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庆祝游行队伍时同林彪的谈话。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首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首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林彪等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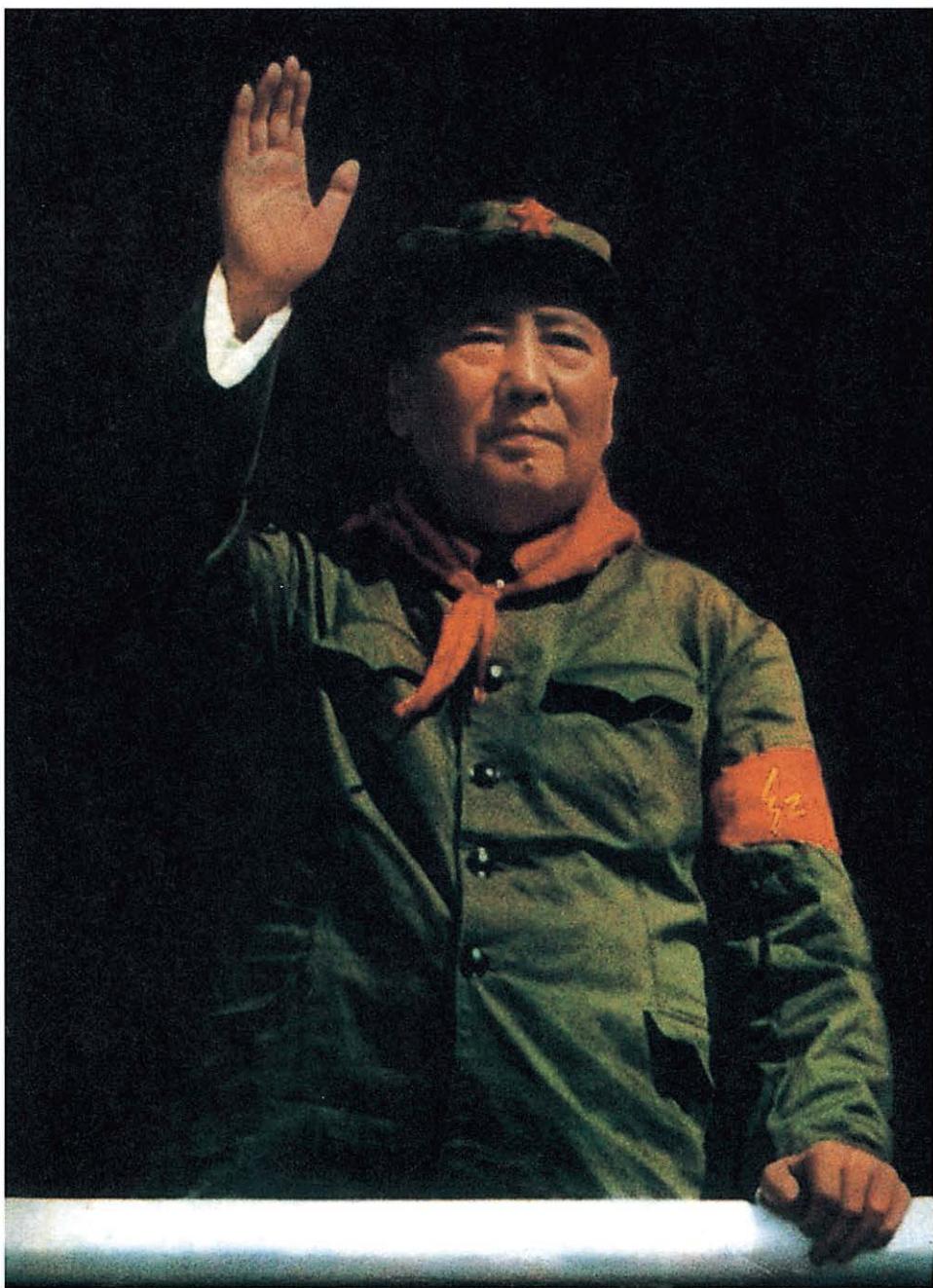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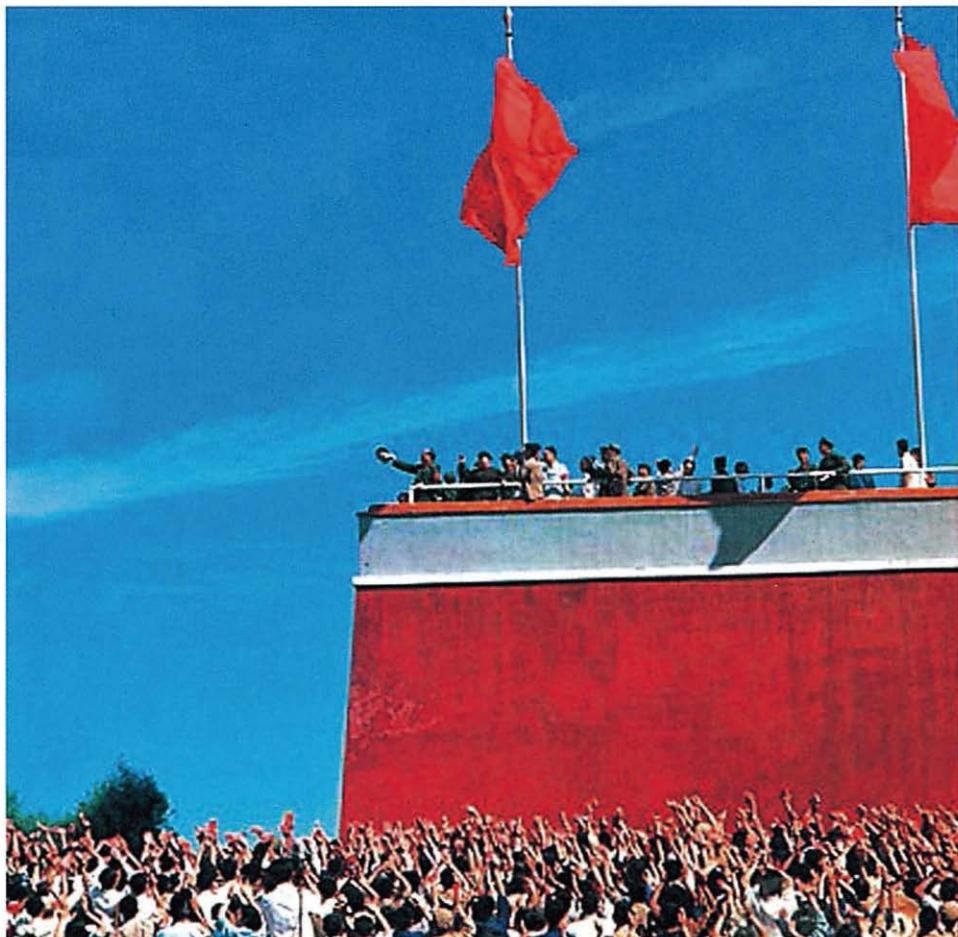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革命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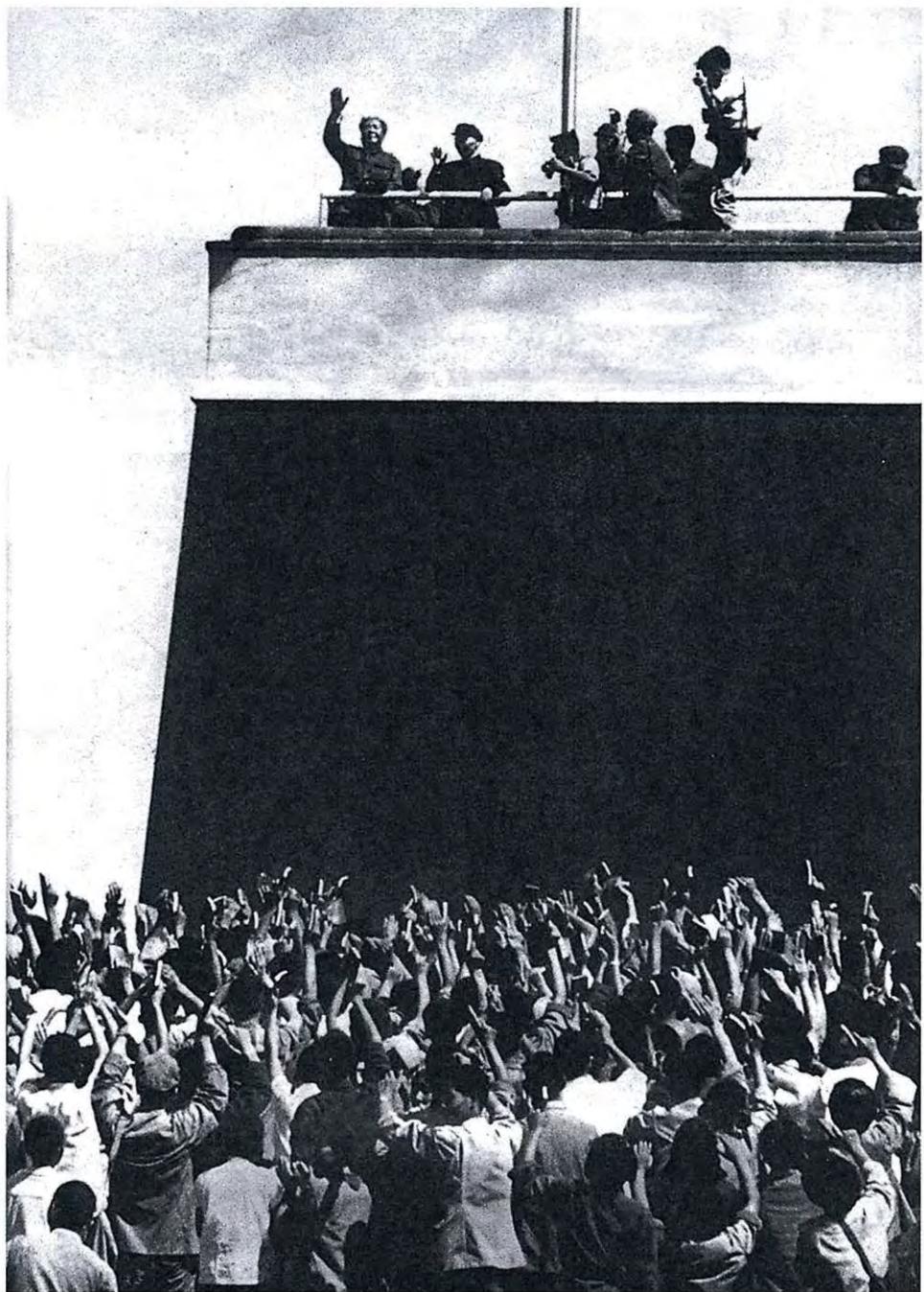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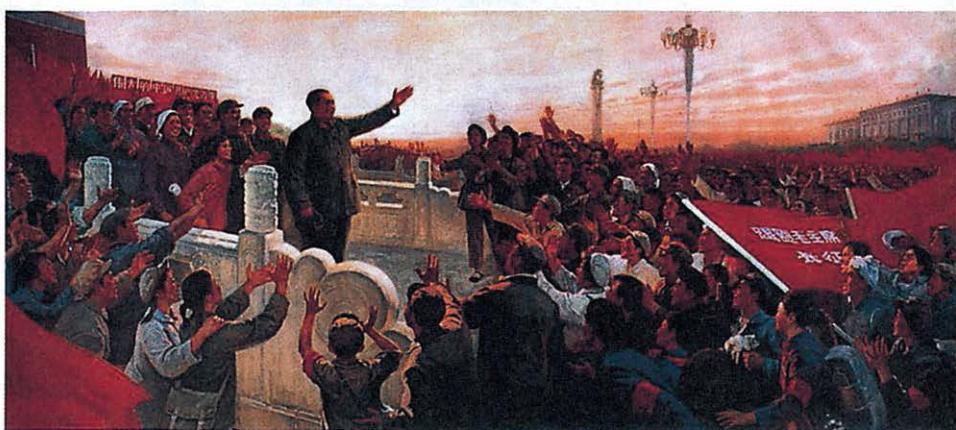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代表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要把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宣传画）



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红卫兵

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宣传画）



不到长城非好汉（宣传画）

在天安门城楼上 和北大附中红卫兵谈话纪要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陆平现在干什么?

□□□: 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 陆平只能扫地, 就像我一样, 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 别的干不来, 我是你们的勤务员。

毛: 张承先也是个坏人, 把你们红旗拆散了, 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多少人啦?

□□□: 又发展了。

毛: 这就对头了。

(□□□问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 我身体很好, 我去长江里游泳, 有个青年同志肝疼了, 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问主席下一步应怎么办?)

毛: 你们一斗二批三改, 按十六条办事。

(毛问□□□是否会游泳)

□□□: 才学会, 游得不好, 只会游十几米。

毛: 那不叫游泳, 那叫闲庭信步。(毛做了闲庭信步的动作) 你要能这样, 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 马克

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革命嘛！

革命要靠自己

(1966年)

革命要靠自己。¹¹

[1] 这是周恩来1966年8月18日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话。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上。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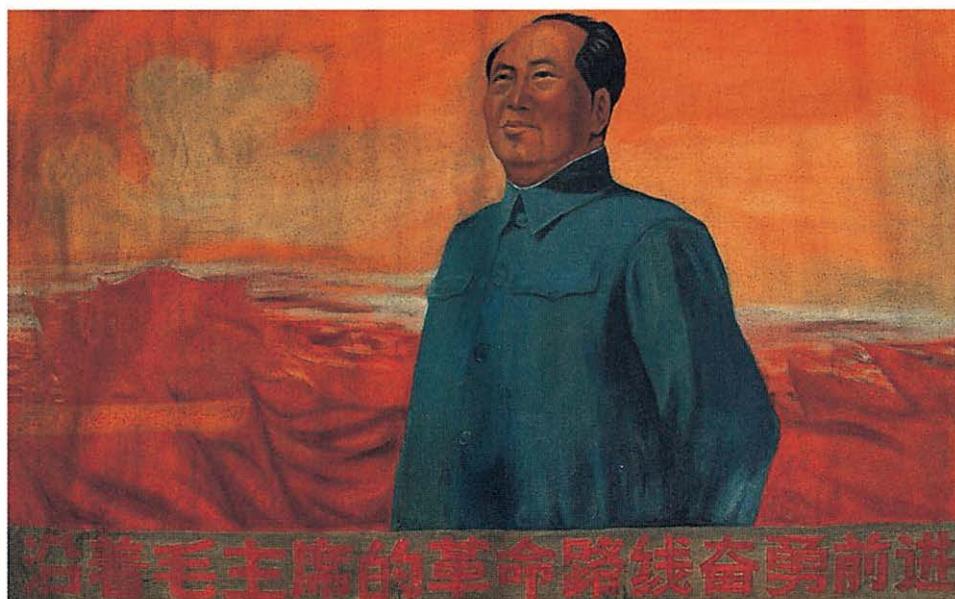
众志成城（宣传画）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宣传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宣传画)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宣传画）



对伟大导师毛主席心怀一个“忠”字，对伟大毛泽东思想狠抓一个“用”字。（宣传画）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

(1966年8月20日)

中国妇女
送交李畅同志。

毛泽东
八月二十日



毛泽东第二次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

中国妇女
送文部中央局。毛泽东
一八月二日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

对薄一波^[1]来信的批语^[2]

(1966年8月21日)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一日夜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使他得到了平反昭雪。

[2] 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1966年8月21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8月18日天安门上主席跟我握手并亲切勉励要我好好革命时，我深受感动。”“最近主席如果有时间，希望找我谈一次。我想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工交各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情况；同时检查我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一个请求。（二）我对改革工业体制的一个设想。”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3日)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对谢富治关于公安部 机关精简设想^[1]的批语

(1966年8月26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研究。我看这个设想是好的，应在下一次会议上谈一下。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1] 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66年8月25日关于公安部机关的精简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今年4月主席在杭州关于公安部应砍掉2/3的指示精神，我们在5月间发动处以上干部就精简问题进行了鸣放辩论。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精简问题已完全成熟了。目前公安部有行政编制1400多人，机构庞大。根据公安工作主要是依靠党、依靠群众的根本路线和上虚下实的原则，我们设想，把现在的12个局合并为6个，90个处合并为30多个，行政编制由1400多人减到400多人。企、事业单位现有7000多人，分别交给有关单位。我们还设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彻底革命，力争把行政编制减到二三百人。

关于传阅文件问题的批语

(1966年8月26日)

陶铸^[1]同志：

传阅文件，应注明退何人存档。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下午二时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在李富春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 文化大革命问题报告^[1]上的批语

(1966年8月28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泽东

八月廿八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1966年8月21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报告，汇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两个多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在8月2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发表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

对关锋、戚本禹反映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6年8月28日)

此件^[1]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2]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关锋、戚本禹1966年8月26日给副组长江青的报告。报告中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8月18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报告提出了新北京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等四点建议。8月27日，江青将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个报告上。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陶鲁笳，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66年，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爱·弗·希尔。



1966年8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书记格里巴。

在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 来信上的批语^[1]

(1966年8月30日)

送总理酌处^[2]。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
八月卅日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1966年8月30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8月29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最要紧在不发生重复搜索”。毛泽东阅信后即在上面写了这个批语。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记载，9月1日，毛泽东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件和批语后，当即办理，并于8月30日下午2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8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